

鳳凰週刊

OCT 2015 | 第30期 | 总第559期

籠中病人 大陸精神病人回家困境

中共布局「大統戰」 | 足球改革：大陸體育改革新樣本 | 為美國戰俘奔走16年的日本主婦



中國內地 RMB 15.00元 港澳地區 HKD 25.00元

本刊獲特許在中國內地發售

Independent Thinking for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www.ifengweekly.com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比坐拥财富更重要的 是为社会创造财富

奥迪A8L W12尊贵再进化



扫码了解更多详情

奥迪A8L W12萃集精湛工艺,尊享定制,以强悍磅礴之势,开创领袖新格局。

有一种成功者,不以财富凌人,不以成就炫耀。他们深知,人生的意义取决于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而非赢得多少财富。他们从未停滞不前,永远以不懈地进取,推动整个时代的前进。这是历史赋予成功者的责任与荣耀。真正的尊贵,不是个人富足,而是造福于社会。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官方网站。

www.audi.cn



《凤凰周刊》上期封面



凤凰周刊官方网站



凤凰周刊亚马逊电子刊



凤凰周刊微博



凤凰周刊微信



世界遗产地理官方微博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咨询服务热线

深圳0755-25934567/北京010-65281005/
香港00852-22008790 传真0755-25934579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董事长/出品人 刘长乐
行政总裁 崔强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王纪言 杨家强 周军
编委会顾问 余秋雨
编委(姓氏笔划为序) 王酉年 王多多 邓飞 刘庆东 刘爽 何新京 吴晓镭
钟大年 段敏 郭志成 唐建 袁路 喻凌霄
编委会秘书长 孙谦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社长/总编辑 孙谦
副社长 丁晓曙
副总编辑 蓝艺
主编 师永刚 周宇
总编室主任 段宇宏 总编室副主任 黄楠
编辑部主任 崔世海 编辑部副主任 王毕强 路琰
记者部主任 段文
主笔 叶润洋 魏恭 袁凌
主任编辑 晓波 漆菲
主任记者 钟坚 李光 张弛
记者 温彦辉 徐佳 陈祥 王琰 孙杨 曾鼎 李克难 吴如加
马军 徐伟 刘荣 邱锐 郭天力 赵福帅 曹蓓 闵云霄
特派记者 李想(华盛顿特区) 蔡源(墨尔本) 田晶(巴黎)
特约主笔 曹景行 杨锦麟 南方朔 谢国忠 阮次山 何亮亮 石齐平
美术总监 小米 图片总监 丁大伟 美编 黄静 虎妹
多媒体发展部主任 吴穷 广告总监 李泽红
多媒体发展部编辑 马茹均 莫文辉

香港凤凰周刊副总经理 崔博

海外事务总经理 夏婷婷 / 社长办公室主任 赵海燕
大区业务总经理 齐崇轩 柳楚光 傅张伟 高卉 周卫 李莉 / 出版事务部主任 李迪 / 副主任 张云
驻地代表 北京 贾楠 / 上海 金龄 / 广州 陈卫东 / 南京 任浩

法律顾问 王霖 财经顾问 沈铭

编辑出版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编辑部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 电话00852-22008790
社址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凤凰卫视总部 电话00852-22008888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号楼6楼 邮编518026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嘉景大厦9楼 邮编518001
电话86-755-25934567(订约热线)/25934558/25580179/25934597
Email:weekly@phoenixtv.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11室 邮编100005
电话86-10-65281005/65281006(订约热线)/65211745(办事处)
Email:cuibo@phoenixtv.com.cn

北京凤凰雨翔广告有限公司 汽车、外航行业总代理 IT、房地产行业代理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 电话010-84467053/84467054
浙江金色凤凰影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内凤凰科技楼7号楼6层 电话0571-87175087

上海新泽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广告总代理
上海市余姚路288号1号楼7楼 邮编:200042 电话021-63511838

深圳市派动广告有限公司 华南区钟表、金融、洋酒、红酒、地产行业总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南方日报大厦7楼 0755-83226011 0755-83225602

凤凰周刊理事单位 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进口/发行总代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工体东路16号 电话86-10-65063082
承印人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169号宏利保险中心20楼

中国大陆广告总代理 神州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77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927室 电话021-52925188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55号峨山饭店商务楼2705室 电话028-8558871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建设大道700号香格里拉饭店432号 电话027-85781338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319号索菲特人民大厦东楼2层 电话029-87928666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A座2103室 电话024-22814065
凤凰卫视广告综合业务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010-65207833
广东一代传媒 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67-69号金德大厦28楼 电话020-83226130

广告委托代理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嘉景大厦9楼(邮编518001)
广告热线 0755-25580179 传真0755-25580169
广告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580179/25934597 传真0755-25580169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作品经著作人授权本刊,未经许可,不得摘编。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作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本刊字体由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官员不作为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 周兼明

10月9日,大陆审计署公布的8月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政策措施贯彻落实跟踪审计结果”显示,部分重大项目建设推进缓慢,涉及铁路、水利等领域193个项目、近3000亿元投资,不少项目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低于10%,有5个铁路项目和6个省份的水利项目完成率甚至为零,导致大量财政资金闲置。结合8月底,国务院大督查第一批问题处置结果中,已对7个省59名干部进行问责;9月底,第二批针对资金沉淀、项目拖延、土地闲置、棚改迟缓等不作为问题进行问责,又致使24个省份的24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等新闻,让“官员不作为”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官员不作为的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一是出于对做错事的惧怕。十八大后的强力反腐让很多人胆寒——不仅仅是怕多做事多得罪人,还怕做错了事会丢官,更怕连带着把之前并不见得都能见光的旧账也一并扯出来清算,因而很多人宁可选择不做事。二是十八大后政府工作标准趋向多元,随着简政放权的推进和考核目标不再唯GDP至上、环保条件硬性约束、权力清单开列等,都让一向位高独大的官员茫然不适,不知道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三是官员大多是30年经济改革浪潮的受益者,不仅深谙官商结合共同发展之道,还形成了对二元社会体制的高度依赖,尤其在医疗、社保、住房、养老等方面,他们害怕也不愿意失去既得利益,因此,对继续深化改革本能地排斥和抗拒。四是对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信息化时代,中年以上的官员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知,社会治理的方法与经验积累往往严重滞后于民智的开启速度,一旦官民之间发生认识和利益冲突时,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不知道如何平衡和

处理维稳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宁可什么事不干也不冒风险。

官员不作为会带来很多不良后果,最坏的就是影响经济发展,继而影响社会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在发达国家,政府权力受制于法律、民主制度和党派制衡,加之市场经济成熟,社会自治力强大,政府及官员对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影响极其有限。而中国则不同。中共是一党长期执政,沿用的是精英治国政治,政府及官员对社会和经济运转的影响极大,而社会自治力尚不成熟,市场经济的独立性也有限,这种体系下,一旦不作为蔓延整个政府、官员体系,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譬如遍及多地的地方政府欠企业债不还以致拖垮企业的情况,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经济后发展地区,很多地方政府都是一有“难处”就找当地活力最强的企业赊物、借款,有时为了完成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的业绩考核,还把“各种任务”直接转嫁给企业代办,过后又赖账不还,导致企业额外支出大增,日渐凋敝。这种情况在土地财政被限制后,尤其普遍。放到全球经济遇冷、经济放缓已成常态的大背景下,来回看政府欠债对企业的影响,就会发现,那不只是简单的“还钱”问题,还是地方经济后续发展动力不足、解决就业数量和维系社会稳定的能力强不强等一系列挑战性问题。这还仅仅是说不作为者通过“转嫁任务”对企业造成的影响,还没有算审批、审查、检查、督查、监管、服务等方方面面不作为的账。

从根子上说,中国当前最严峻最迫切的任务依然是保经济、促发展。经济不出大乱子,不犯颠覆性错误,则社会稳定的局面就能维系,继续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方略才有可能推进。化解不作为难题,至少有三个方面是不能忽略的。

首先是完善法制建设,要把改革纳入法律框架,这样才能杜绝人治,使重大项目能够得到连贯执行,不因一把手的更换而半途而废。

其次是放开媒体监督。固然反腐证明了中共依然具有相当强大的自我纠错、自我诊治的能力,但仍然需要舆论监督这面镜子。从最近“青岛大虾事件”前后政府整治市场的力度和效果就可以看出,媒体监督对及时反馈民意、促进政府作为方面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再次是消除官员的精神顾虑。邓小平改革的一个重大亮点就是团结一切向前看,反腐要进行,但也要把握好度。同时合理调配官员收入,高薪才能吸引和留住一批有作为、有能力、有远见的高素质人才。尤其对于中央集权制的各级政府来说,高素质官员不仅必须,也十分必要。

总之,作为中枢神经系统,各级政府应保持高度敏感,保证每一个神经元都紧张、高效地投入工作。10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改革开放小组第17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可以被视为一种信号,说明中共高层已经看到问题要害,并开始着手消除官员怕做事、怕做错的精神负担了。

既要加大、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力度和速度,又不得不对这个“疑惑之师”不时调整作战计划,以使之跟上大脑的调度——对执政党来说,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



扫二维码
看往期精选



18 笼中病人

COVER
STORY

精神疾病患者被如何对待，他们能否获得良好的医疗，足够的尊重，权益受到保护并避免污名化，是衡量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尺之一。

红云红河集团
HONGYUNHONGHE GROUP
赠阅部分嘉宾

卷首语 Editorial

3 官员不作为的影响力不可低估

现在时讯 Trending

6【瞬间/封面/台港澳/中国观察/环境&科技/阅读/军事】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18 笼中病人
28 有家难归：大陆精神病人回家困境
35 精神病人社区康复的中国实践
38 香港经验：官民合力推动社会融入

大陆时事 Mainland Politics

42 中共布局“大统战”
46 足球改革：大陆体育改革新样本

宋晓梧：就业应作为“十三五”首要目标

所谓GDP增长8%或7%才能保就业的“共识”，根本没有经济理论的支撑，也得不到经济史的验证，那只不过是中国经济前阶段粗放式增长模式的弊端。

82▼



国际 World

48 “草台班子”何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52 日本主妇德留绢枝：为美国战俘奔走16年
56 难民危机中默克尔的“造越位”战术

军情 Defense

58 朝鲜大阅兵深度解析

特别报道 Feature

60 真实的“降落伞少年”
62 一个“降落伞少年”的美利坚生活
70 “降落伞少年”的迷思与反思

专题 Feature Story

72 银川：向国际化城市迈进

我的中国心 China Elite

76 屠呦呦：我与青蒿素有不解之缘

财经线 Business

82 宋晓梧：就业应作为“十三五”首要目标

84 受制传统银行 民营银行发展遇阻

87 财经资讯

图谋天下 Galleries

90 “他们的政治，我们的岛”

文化 Arts & Culture

100 现代性危机的东方救赎

三地书 Books

103 隐秘的美国“总统俱乐部”

资讯前线 Advertorial

88 衢州：让南孔文化重重落地
以文化产业试验区激活儒学经脉

96 “找一个平台，承载创新梦想”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全力打造“东部人才港”

42

中共布局“大统战”

统战部“双副国级”配备，统战工作会议由“全国”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条例颁布，一系列动作释放出中共要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的信号。

60▼

真实的“降落伞少年”

美国的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守法教育，学校管理非常严格，“校规特别详细，有一本新华字典那么厚”。



难民危机中默克尔的“造越位”战术

56▲

政治上的“造越位”战术虽能带来效果，但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即很可能失去自己阵营的支持，最后祸起萧墙而产生灾难性政治后果。



朝鲜大阅兵深度解析

在此次阅兵式上，金正恩在讲话中批判美国的地方明显减少，这似乎流露出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信号。

58▲

P80

南京·再生长

——南京系列报道

南京市委宣传部联合《凤凰周刊》，将用15期的系列报道，揭秘后青奥时代的南京在城市空间、文化、经济等领域的改变，向读者展现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潜力无限的当代城市。

广告目录

奥迪 / 第一跨页 周刊征订 / 封三 《世界遗产地理》 / 封底
《凤凰周刊·生活》 / 13 阿联酋航空 / 17 多媒体 / 45
将本刊作为指定读物的航空公司和酒店 / 51



MOMENT

瞬间

湖南 2015 / 10 / 04

“十一”小长假的第四天，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水车镇紫鹊界稻田，游客在欣赏造型稻草人。左为梅山文化中传说的“狩猎之神”张五郎，右为神农。





中国富裕阶层人数 呈2位数增长

据法国调查公司凯捷咨询 (Capgemini) 和加拿大RBC 财富管理 (RBC Wealth Management) 发布的《2015亚太财富报告》估算



469万 +8.5%

截至2014年底，亚太地区富裕阶层人数达469万人，同比增加8.5%。

富裕阶层定义是，除去居住房产和耐用消费品等，拥有100万美元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群。

日本

2014年，在亚太地区的富裕阶层人数最多，但增加率只有5%。

中、印、泰、印尼

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地的富裕阶层人数均呈2位数增长。到2015年底，亚太富裕阶层的持有资产总额将很有可能超过北美。

资料来源：法广网，10月8日



增加11%

15.8

万亿美元
亚太富裕阶层的
持有资产总额



16.2

万亿美元
北美富裕阶层的
持有资产总额

1

《华尔街日报》

2015/10/13

中国央行将扩大非常规宽松规模

中国央行将扩大一个非常规宽松项目的规模以提振银行放贷。这是央行为应对经济放缓而采取的最新货币刺激举措，但同时也会承担更多风险。中国央行将允许更多商业银行使用贷款作为抵押从央行借入低成本资金。这是分析师所称的一系列类似西方国家量化宽松的最新一项行动。在获得上述低成本资金后，商业银行应该会向被认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发放贷款。新宽松举措凸显出领导层对经济持续放缓的担忧，同时也说明中国央行无法像过去一样依靠大规模的资本流入来维持货币供应。

2

彭博社

2015/10/12

2015年全球企业并购金额或创新高

2015年的全球企业并购 (M&A) 正以创历史新高速度加速推进。受全球最大啤酒酿造商百威英博提出收购英国南非米勒的推动，全球2015年1月至10月上旬的并购总金额超过了此前全年规模创新高的2007年的同一时期。另一方面，由于大型并购日趋增加，对于并购热潮走向过热的警惕感也开始扩大。据金融调查公司汤森路透的统计，2015年1月至最近的全球企业并购总额接近3.4万亿美元。推高并购金额的因素之一是大型并购的增加。在众多行业，大型企业之间的重组不断推进。

抓住时机，根除传染病

•《经济学人》/2015.10.10

→ 故意消灭一个活的物种似乎是一种非同寻常的罪恶，但如果这个物种是恶性疟原虫，那么罪孽可赎。这种寄生生物是最致命的一种疟疾的根源，它连同四种同族病毒一起，每年造成大约45万人死亡，另有数百万人被疟疾夺去性命的人身体受到严重损伤。美国慈善机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估计，到2040年根除疟疾会给世界带来大约2万亿美元的经济收益。

人们认为，现在追踪研究一种疾病的最后一些病例不值得。如果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疫苗接种运动能够将麻疹、腮腺炎、风疹等疾病在贫穷国家的发病率降至接近在发达国家的发病率的水平，那就够好了。其实不然。疾病有可能卷土重来。

如今，三个方面的重大改进有力支持了要更加广泛地根除疾病的论点。一是更先进的通讯。随着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道路网的扩展，定位和跟踪监控贫穷国家病例的技术在过去20年里大大改善了。二是更好的医疗技术。譬如，丝虫病之所以被列入“可能”被根除的疾病名单，是因为科学家发明了伊维菌素。发明伊维菌素这种药的科学家和发明青蒿素的中国女科学家共同捧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还有更好的技术仍在研发中。譬如针对疟疾和登革热这样的蚊媒疾病，基因工程有望找出办法使蚊虫抗拒它们传播给人类的病原体，或使蚊虫大幅减少，甚至是用基因改良过的真菌和细菌攻击蚊虫和病原体等。

寻求根除疾病的第三个理由是政治态度的转变。尤其艾滋病的出现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去年西非暴发埃博拉疫情进一步强化了这方面的重视。新的医疗机构网络建立起来，并配备了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有史以来，人类和疾病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殊死斗争。如今，疾病夺去的主要是世界上贫穷的人的生命。不过，根除一些最致命疾病的战斗终于胜利在望，抓住时机吧。



随着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以及道路网的扩展，定位和跟踪监控贫穷国家病例的技术在过去20年里大大改善了。



香港土地不足，死了也漂泊

• BBC 中文网，节选 / 2015.10.06

→ 香港土地珍贵，能找到一处安身之所，并不容易。

港人在生要为口奔驰，为了改善生活环境，炒股炒楼，细屋搬大屋，劳心劳力。即使人死了，也不容易入土为安，富人买炒贵的骨灰坛，普罗市民则申请政府骨灰位；但轮候需时，先在外漂泊一番，静候安排。

在生要住私楼，租买都贵。捱不住，便排队住公屋，现有28万人在轮候之中，需要3年多时间。港人一旦离世，如果亲友难以负担私人的墓地或骨灰坛，便要排政府或半官方的骨灰坛，排上3年也是等闲。港人知道骨灰坛短缺，但就反对在自己区内兴建骨灰坛场。由于供应不足，近年骨灰位价格比私楼的升幅不遑多让。

香港每年死亡人数4万多人，九成进行火葬，再加上土葬后“起骨”的需求，对骨灰坛有极大需求。去年和合石已推出4万多个骨

灰位，现仍有5000多个空缺，但位置不如理想。排队上政府骨灰坛持续要等几年，未来供应令人担心。至于半官方性质的华人永远坟场便有1.8万人正在轮候旗下荃湾、将军澳、香港仔、柴湾坟场的骨灰坛，柴湾有家族灵灰位最早由2005年排到现在，将军澳普通禁香区灵灰位有最早由2008年排至现在，荃湾有6800人排普通位最早由2011年排至现在。“先人灰骨一旦未能排到政府位，便滞留在殡仪馆、长生店或道观里，暂时泊在那里，等到轮候上位。”从事殡仪业20多年的张先生说，其实长生店、殡仪馆等都不想暂管骨灰，先人始终是要上位安息下来。

香港弹丸之地，只有一成进行土葬。入土为安，非常困难。家属要为死者土葬，一般安放于和合石坟场，七年后要把骨殖挖走。要是葬于华人永远坟场，也不是一睡“永远”不起的，大部分墓地十年



后要续期或不接受续期。华人永远坟场置有永久墓地，每年只有零星的重用，售价28万元。港人身后要葬于永久墓地，机会微乎其微。

香港私价贵绝全球，一个居屋单位一平方米都要一万港元，但仍不及一小格七吋乘八吋放置骨灰坛的价格高昂。殡仪业内人士说，由于香港欠永久墓地供应，富贵港人便选择北上。按中国传统，死必归土，亲友为其做完仪式后，便即日运往内地，不少愿意花上几十万元甚至300多万于深圳大鹏湾华侨墓园购地，不惜舟车劳顿进行土葬。至于穷人，死后也可获福利

支持。譬如接受综援人士，政府提供约13200元的殮葬服务，包括死亡注册费、火葬费、棺木、殡仪化妆、寿衣、灵车件工、骨灰坛，至火葬完成领回骨灰。

港府倡议绿色殡葬政策，食环署建议海上撒放骨灰、在纪念花园撒放骨灰，以及“无尽思念”网上追思服务。由于土地缺乏，政府一度提倡进行海葬。早前业内估计是一盘新生意，但如今发现不是太受欢迎。业内人士称，除非死者无儿无女，否则后人宁可多尽孝道，进行传统土葬或火葬仪式。（黄楚琪）

香港1.2万在职贫穷人士拥学士学位

• 《星岛日报》/ 2015.10.11

→ 在职贫穷问题香港特区政府一直关注，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明年第二季才推出，10月10日公布“2014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中，非综援的在职贫穷户数微降4600户，跌至13.62万户，但仍有45.91万人属在职贫穷，八成一为三人以上家庭，大多数只是一名家庭成员有工作，家中有逾三名小童及长者，又以新移民家庭为主，负担相当大。

学历方面，有1.2万名非综援的在职贫穷人士拥有学士学位，整体近半为初中及以下的教育程

度，四成人有高中程度。从居所分类，全港96.2万名在政府介入后的贫穷人口中，有近半、即44万人住在公屋内，贫穷率达21.4%，特区政府相信，公屋住户内领长者生活津贴人数上升，助纾解贫穷生活；临屋住户贫穷率最高达28.1%，住有万多人。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指，明年特区政府额外拨款30亿元推低津，料有20万户家庭涉70万人受惠，望可降低贫穷率2个百分点，她有信心可在2017年的贫穷报告中反映成效。

“死亡质量”排名 台湾居亚洲之冠

• 《经济学人》/ 2015.10.06

→ 《经济学人》信息部公布2015年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临终关怀的死亡质量指数调查，英国位居全球第1，台湾排名第6，位于亚洲之冠。“死亡质量指数”计算善终及医疗保健环境、人力资源、人们对服务的负担力、服务的质量、社会参与等因素来排名。

调查显示，台湾是全球最先实行临终关怀体系的地区之一，2000年立法施行临终关怀条例。台湾全面的研究计划、临终关怀的广泛培训、纾缓治疗及免费的高品

质服务，使其排名居亚洲之冠，比上一次调查的19名有所进步。亚洲其他地区，新加坡排名12，香港排名第22，中国大陆排名71。

信息部2010年分析40个国家和地区后完成第一份死亡质量指数报告，2015年分析对象增加至80个国家和地区，并首次就纾缓治疗需求，访问纾缓治疗专家后进行分析。调查编辑David Line表示，2014年世界卫生大会决议呼吁全球提升纾缓治疗水平，仍有许多改善空间，强调拥有良好的死亡质量是一种人权。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处理得好不好，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国内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

中国应理性处理南海问题

●《联合早报》，节选 / 2015.10.06

→ 针对南中国海问题日益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焦点这种局势，作为南中国海问题主要角色的中国，需要特别小心，理性地来处理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有可能和主权争议国家发生冲突，更有可能和美国发生冲突。中国必须具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甚至危机。政策工具包括内外部政策的调整。从目前局势看，中国至少必须注意如下几个领域的问题，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有所作为。

第一，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行为的反应应当有所节制，保持理性的态度。例如对菲律宾的态度。菲律宾所做的并没有得到很多东南亚国家的认同，相反，其行为往往和东盟其他国家不合拍。不过，当菲律宾挑衅中国的时候，必然遭到中国各个方面的口诛笔伐。中国一些人和机构往往把国内“骂人”的方法带到国际社会，产生了很多反面效果。

第二，中国可能不得不接受南中国海问题已经高度国际化这

个事实。理想地说，中国-东盟关系就是中国和东盟国家双边之间的关系，和域外的其他大国没有多大的关系。但现实已经不是这样了。东南亚国家和美国一直具有紧密的关系，美国和一些东盟国家更有同盟关系。如果东盟小国感觉到来自中国的压力或者威胁，这些国家很自然就要邀请域外大国来干预。实际上东南亚的情况非常复杂，并非中国所能解决，至少有几个问题和中国无关：

首先是文化、种族和宗教问题。东南亚是多文化、种族和宗教地区，不同文化、种族和宗教之间也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安全，一些国家需要域外大国即美国在本区域的存在。一旦遇到危机，他们可以依靠美国的力量来管控局面。第二，越南问题。越南在历史上一一直具有扩张的野心和行为，这种行为不会因为越南成为东盟的一部分而消失。要遏制越南，东盟也需要其他域外大国的存在（包括中国）。第三，印度尼西亚问题。印尼历来是东盟的“老大”，历史上也曾经对其

他国家构成外交压力甚至威胁。所有这些因素证明了域外大国存在的合理性。对中国来说，不要把美国存在的方方面面都视为是针对中国的。如果是那样，就很难处理好和东盟国家、和美国的关系。

第三，中国应当避免南中国海问题成为日本扩张其地缘政治影响的一个极好国际大环境和机会。近年来，南中国海问题恶化，日本可以说是最大赢家。日本不仅在东海和中国较劲，更是利用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关系的恶化，发展自己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随着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其必然追求本身的地缘政治利益。今天，在美日同盟的保护伞下，日本正在追求这个目标。在东南亚，日本正在努力和那些同中国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发展准同盟关系，也在和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国家结成所谓的“民主同盟”，来应对中国。同时，日本和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也在强化。未来南中国海问题也有可能演变成中国和日本

之争，而非中国和美国之争。这是中国需要理性把握的。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必须管控美国所具有的那种军事冒险主义。美国从其涉及世界事务以来，养成了军事冒险主义精神。冒险主义精神一方面和美国“牛仔文化”相关，另一方面和这种军事冒险主义所带来的巨大好处有关。美国这个国家就是通过冒险主义式的扩张而形成的。和前苏联的军事竞争中，美国不仅赢得了胜利，而且促成了前苏联的解体。中国要关切美国的军事冒险主义，不是胆怯的表现，更不是投降，而是要对此进行有效管控。

对中国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处理得好不好，不仅仅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国内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持续的问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仍然是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南中国海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郑永年）

卢布贬值推升俄中农业贸易

• 《金融时报》，节选 / 2015.10.10

→ 遭受衰退加剧、大宗商品价格下跌重创，还面对信贷危机风险的俄罗斯，至少可以指望从卢布贬值获得一个优势：对华农业贸易大幅飙升。

从巧克力到葵花籽油和动物饲料，在截至7月底的3个月里，俄罗斯食品出口出现指数级增长，成为卢布贬值带来切实利益的少数例子之一。尽管在今年头6个月期间，俄罗斯对华出口总体下降23.5%，但农业出口额上升33%，出口量增长近80%。莫斯科农业监管机构俄罗斯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的高级官员阿列克谢·阿莱克延科表示：“中国过去总是想把自己的产品出口至我们的国家，但现在中国突然对俄罗斯农产品产生了兴趣。就农产品而言，俄罗斯和中国有许多新的重大供应项目，涉及从猪肉到蔬菜的各种农产品。”

在此过程中，在过去一年里相对于美元贬值45%的卢布，帮助巩固了双边经贸关系——从

总体上看，俄中经贸关系在实现两国领导人的宏伟预期方面进展缓慢。欧洲传统上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伙伴。面对乌克兰危机带来的政治后果，莫斯科承诺与亚洲加强经贸往来。俄罗斯试图用中国贷款取代被制裁掐断的西方资金，并签署了巨额能源协议。但中国的银行对俄罗斯市场的业务态度谨慎，双边贸易下降，尽管降幅小于俄罗斯整体对外贸易的下降幅度。

中俄经贸合作的主体一向是小本经营的中国生意人，现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回国，因为他们的贸易业务的微薄利润随着卢布贬值而消失。9月关了门的莫斯科的服装店的龚宇（音译）表示：“我们找不到地方可以削减成本。在这里销售中国消费品也赚不到钱了。”

然而，新的投资者正在出现。自去年年末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代表团访问俄罗斯，寻找可供出售或出租的农地。在最靠近蒙古、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俄



罗斯远东地区，这种趋势更为明显。国有和私营农场一直在滨海边区、犹太自治州、阿穆尔和哈巴罗夫斯克等俄罗斯边境地区租赁土地。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谢平表示：

“农业、水产养殖业……我们将认真研究在边境地区推进这些行业。”中投称，过去7年里在俄罗斯投资了大约70亿美元。

俄罗斯公司也受益于更为有利的汇率。国有的俄罗斯农业集团去年开始向中国出口葵花籽油。与此同时，远东联邦管区的俄罗斯巧克力和糖果制造商报告称，今年6月-8月，对华销售同比增长了11倍。但中国对俄罗斯食

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并未受到无条件的欢迎。许多俄罗斯当地官员指责中国农业投资者过度开发土地，对俄罗斯资源造成长期破坏。犹太自治州州长亚历山大·莱温塔尔表示：“中国人全都种植大豆。大豆是很好的农产品，它们很容易出口中国，但专家说，我们必须采用轮作方式。”

更为根本的是，人们质疑，人口稀少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如何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逾1亿人口的中国东北地区打交道。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伊戈尔·列别捷夫表示：“我们不能将那里太多的土地交到中国人的手里。长期而言，那将威胁到我们的主权。”

中国积极拓展绿色能源 成全球最大投资者

• 美国《一周》网站，节选 / 2015.10.10

→ 中国正在担忧气候变化，并且现在是绿色技术的全球最大投资者。

过去20年间，中国闪电般的工业化速度已经让大量人口脱离贫困——同时也把数以百万吨的碳排放到了大气中。仅仅在2008年至2013年间，中国的能源年消耗量就增长了超过50%。而在中国，大约70%的电都是从污染最严重的能源，也就是煤炭中获得

的。从笼罩北京和几乎其他所有城市上空的厚厚雾霾中，就能看到这样做的后果。事实上，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一小部分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空气污染每年导致约50万中国人过早死亡。去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的参加者必须戴上口罩来抵御令人窒息的雾霾，而不定期的雾霾预警则迫使城市实施机动车限行和暂时关闭工厂。

中国政府正在推出控制碳排放的重大举措，以缓解雾霾和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9月在华盛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将在2017年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量超标的中国企业将被罚款，而排放量低于限额的企业则可以出售自己的配额。

中国也在大量投资发展可再生能源，仅在去年就投资900亿美元，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国家。中国正在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发展太阳能，在戈壁沙漠大量兴建太阳能农场。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风能生产国，在多风的西部安装了数以

千计的涡轮机，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将涡轮机的数量增加一倍多。

排放减少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中国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新承诺意味着即使经济提速，增加的需求也将来自于更为绿色的能源。中国拓展绿色能源使用的步伐十分迅速，大部分新增能源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初期阶段，而将这些能源连接到电网并令其可以被消费将是巨大的挑战。例如，许多风力农场和太阳能农场距离大城市非常遥远，政府尚未找到储存和运输其生产的所有能源的方法。

内地青年掀起创业潮：仍面临体制束缚

• 《南华早报》/2015.10.11

→ 在中央政府对创新经济支持的鼓励下，年轻的创业者正在利用蓬勃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优势开创自己的企业。经济放缓和股市暴跌已经令大型国有企业受到重创，许多传统行业的制造商也因劳动成本上升和订单减少而亏损。

没有受到低迷经济影响的是大量运转资金较少的互联网技术创业公司。这些创业者部分是被总理李克强对企业应用互联网改善商业模式增强服务的号召所鼓舞。30岁的崔恩（音）就是其中一位。在听到李克强总理表示3D打印技术将是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后，崔恩辞去了在一家驻沪外资银行担任职员的工作，开创了一个3D打印公司。

“辞去在银行的稳定工作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崔恩说，“但是3D技术巨大的市场潜力



和政府的支持态度坚实了我的信心，这是做出改变的正确时机。”

由于曾在银行业工作，崔恩目前负责这个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企业的融资和营销，而他的商业伙伴提供工作场所和技术。过去，内地私营企业创业者需要与地方政府的人脉关系确保获得订单和优惠待遇。但是通过互联网

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创业孵化器中，一名互联网青年创业者在咖啡厅的沙发上休息。



吸引客户令这一切发生了巨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李若山表示，中国正处于全新商业时代的开端。他表示，企业必须尊重市场，而不是只关注与政府官员拉关系。

安永公司的何兆峰表示，现在评估一家公司的市值比几年前“复杂得多”。何兆峰说，一家公司即使没有大量的收入，但如果它的网络流量很大，也可被视为明日之星。位于杭州的创业公司浙江时空电动汽车有限公司不久前被安永列为中国最有前途的企业之一。这个为电动车提供电池充电服务的公司利用互联网技术销售产品，管理客户。该公司提供低价的电动汽车租赁服务，并从汽车制造商获得资金。安永表示该公司专注发展的商业模式会确保其长期成功。何兆峰表示，现在不必纠结一家创业公司的资金实力。

“随着内地在寻求发展新动力时强调创新的作用，广大市场将成为一家公司前景的最终裁判。因此网络流量可以作为评估一家创业公司市值的重要标准。”

然而，即使最有技术优势的年轻创业者也会遇到困阻。中央政府最近暂停了股市上市融资——这为一些谋求资金的公司关上了大门。

五中全会如何定调“十三五”

• 法新社，BBC / 2015.10.12

→ 在经济增速放缓引发全球担忧之际，中共10月晚些时候将召开会议，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接下来五年的经济发展制定计划。据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2日召开会议，决定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审议将于2016年开始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

中国致力于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的持续繁荣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关键要素之一。由于产能过剩及出口萎缩，中

国经济近年来增速不断放缓。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称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向在内需推动下的更平稳和可持续的增长方式转变。

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意味着他在结束访问返抵北京后就要立即主持这一会议。根据早些时候的官方报道，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并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0月12日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官员的话称，中国经济增速已进入“换挡”期，而有关官员更预测在“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合理区间将在6.5%至7.5%之间，如果国际因素变化比较大，完全可以把上下限再平移0.5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也在同一天发表文章，表示目前尚不能排除将“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从“十二五”时期的7%下调至6.5%的可能。由于两大官媒异口同声地提到

“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因此有分析认为，这有可能是为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宣布下调中国经济增速吹风。

有受访学者分析称，中国经济形势严峻、出口明显受限，产业创新将是未来五年的当务之急。

“十三五”的关键意义在于它面临着中国在未来五年是逐渐“拉美化”还是“欧美化”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推进产业创新升级，不仅是中国避免“拉美化”寻求出路，也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动能。既然是追求创新升级，经济政策便会强调质的增长，而不是追求粗放式发展。

习近平致信金正恩，中朝关系升温

•《纽约时报》，节选 / 2015.10.12

→ 在陷入“深冻”之后，中朝关系最近显现出了“解冻”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了一封热情的函件，还派中国级别最高的官员之一前去参加金氏领导的执政党成立70周年的庆祝活动。

这名官员是刘云山，在朝鲜首都平壤的一个精心举办的阅兵式上，他站在金正恩身旁，两人还时不时地聊聊。刘云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是自2011年年底金正恩上台以来，访问朝鲜的级别最高的中国官员。

刘云山于10月9日晚抵达平壤，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抵达后马上会见了金正恩，向他转交了习近平的信函，中国的官方新闻媒体对这次会面作了广泛报道。习近平表示，信带来的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祝贺，也有他个人的美好祝愿。刘云山称赞金正恩“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习近平在2012年年底上任后曾表示，任何国家都不该被允许为“一己之私”把亚洲地区搞乱，人们把这句话解读为对金正恩核武器计划的批评。

中国在旨在惩罚朝鲜核武

器计划的联合国制裁上签了名，金正恩没有参加中国9月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的阅兵仪式。自从2011年上台以来，这位年轻的朝鲜领导人没有访问过任何国家。中国虽然对朝鲜的核计划表示担忧，但并未把全部的经济影响力施加于朝鲜，使其放弃核计划，似乎是对朝鲜潜在的不稳定更加关注，担心不稳定可能波及到本国境内。中国的大笔经济援助维持着朝鲜最起码的经济，但在过去一年，中国的军事官员和学者们一直在争论，这个盟友对中国来说更多的是负担，还是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的朝鲜问题专家杨希雨说，习近平给金正恩的信的调子，是比较标准的北京在这种主要的周年纪念场合发给平壤的信

息。“这种官方语言总是一样的，不管双边关系是好是坏，”杨希雨说，“这是一种例行公事。”

但首尔延世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副教授鲁乐汉说，习近平似乎是在利用阅兵式，把其作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朝鲜重修旧好的机会。此次阅兵也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朝鲜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鲁乐汉指出，习近平的信中没有提无核化，这与中国上次去朝鲜访问的高级官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带去的信息形成对照。“习近平的信标志着中国领导人与金正恩交朋友的首次真正努力，”鲁乐汉说，“向金氏王朝表达恭维之词对习近平来说是件新鲜事，中国政府之前对平壤使用的语言一直是戒备的，甚至是恼火的。”



香港凤凰卫视倾力打造 全球华人精品生活杂志

**《凤凰周刊》征订的读者
征阅全年《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生活》**

可享受690元优惠，即刻节省90元

单订阅《凤凰周刊·生活》全年240元

用户可免费获得凤凰精美礼品一份!

征订热线：陈先生 0755-25934591

广告热线：张先生 0755-25469762

城市版合作：聂小姐 0755-25934586

征订传真号：0755-25934593

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

收款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银行汇款

开户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帐号：7705 5795 9990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若通过银行汇款，请将汇款收据及您的详细邮寄地址

一起寄回或传真至本刊发行部。

邮寄方式

平邮免费；挂号邮寄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18元，全年挂号费36元。

NASA公布登陆火星计划 人类将在火星生活数年

• 《洛杉矶时报》/ 2015.10.12

→ 美国宇航局(NASA)近日公布了登陆火星“三步走”计划。太空人不仅要在这颗红色星球上登陆,还要在那里生活,最终建立立足地。不过,该机构没有说明实现这些计划与目标的时间表。

NASA把登陆火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地球依赖”,主要工作集中在国际太空站进行,包括人类健康和行为研究、高速通信技术测试、先进防火安全设备测试、下一代太空服技术测试、3D打印技术测试以及可长期使用的生命支持系统研究等。

第二阶段称为“试验场”,主要工作集中在数日即可返回地球

的地月空间内。美国宇航局将在这一阶段学会在深空环境中执行复杂任务,包括2018年利用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新一代载人飞船“猎户座”;2020年发射无人航天器,从一颗小行星表面采集巨石,挪至月球附近供太空人研究;测试深空环境居住设施等。

第三阶段称为“地球独立”,将实施火星邻近区域包括火星卫星的人类任务,并最终登陆火星。太空人将能够在火星表面栖息地和运输飞船中生活和工作数年;能利用火星资源制造燃料、水、氧气和建筑材料;能利用先进通信技术把科研数据和结果传回地球,而将延迟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



↑ NASA科学任务理事会副理事长兼宇航员约翰·格伦斯菲尔德向公众介绍火星“三步走”计划。

中国太空“长征”挑战美优势

• 《南华早报》网站 / 2015.10.06

→ 随着中国揭开其运载火箭家族新成员的面纱,该国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在发展航天武器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展。据中国中央电视台和《解放军报》报道,首枚长征6号运载火箭9月携20颗微小卫星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据大陆《科技日报》9月29日报道,第二炮兵某营在夜间试射了一枚战略导弹。此次测试证明,该战略导弹部队如今能掌握美军使用的C4ISR系统,即自动化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的所有环节。上海政法学院防务政策专家

何奇松说:“长征6号的发射将向美国传递这样一个信号,即解放军如今已具备突破美国在亚洲部署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因为……多星发射技术也能用于东风-41(远程核导弹)。”

被五角大楼称为中国最强大武器的东风-41导弹的射程约为1.2万公里,能携带多达10枚核弹头。东风-41和巨浪-3导弹总共可携带20枚核弹头,同时打击多个目标。解放军尚未承认东风-41导弹的存在,但美国媒体援引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说,北京自2012年以来至少进行过4次发射试验。

9月末,中国首次发射了2种

新型火箭——长征6号和长征11号。尽管全球媒体的目光主要集中在“9·3”阅兵式展示的洲际和中程弹道导弹上,但来自太原、酒泉、西昌等中国卫星发射中心的一次次不那么抓人眼球的太空发射才是中国迅速成为太空大国的前奏。能够发射不同种类的卫星和飞行器对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防至关重要。

中国军方分析人士将太空视为“信息集结中心”。从战略上而言,这种能力是他们所必须具备的,而且必须在不依赖其他国家发射的情况下具备。相形之下,美国仍依赖俄罗斯火箭完成载人航天任务及向国际太空站运送补给的大量任务。卫星技术是中国军方“赢得信息化战争”的关键要素。中国将继续重视提高作战部队之间的远程通信能

力,以及侦测威胁并向导弹系统提供打击目标数据的能力。

尽管中国的载人航空和探月计划已获得官方支持,但显而易见,中国优先考虑的还是发射商用和军用卫星。发射这些卫星不仅在逐步建成中国的民用通信基础设施,而且增加军用侦察卫星的数量对中国的情报、监视及侦察能力至关重要。中国的进步不仅体现在运载火箭和卫星发射上。中国还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以支持卫星网络的扩大。这其中包括与阿根廷政府签署协议,共享位于阿根廷内乌肯附近的卫星监测基地。该基地将为中国在南半球提供更好的卫星追踪和通信能力,而且也是中国更为长期的太空雄心的一部分,载人登月计划就包括在内。



美国追杀“首位本国圣战者”

• 《华尔街日报》网站，节选 / 2015.09.22

→ 自“伊斯兰国”组织崛起以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等恐怖主义组织很容易被外界忽略。

而不久前，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还是美国官员最担心的恐怖主义组织——目前它最关注的目标仍是美国。

该组织的国际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已死去的安瓦尔·奥拉基，他不是基地组织的领导人，但却是一名真正的恐怖组织精神领袖。他具有领袖的魅力和伶俐的口齿，但最重要的是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1971年，奥拉基出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当时他的父亲正在新墨西哥州大学读研究生，奥拉基在内布拉斯加州和明尼苏达州长大。奥拉基巧妙地用美国俚语发布支持恐怖主义的信息，这使他成为西方圣战者崇拜的对象。察尔纳耶夫兄弟受到奥拉基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的视频影响，并根据奥拉基在网络上发布的指导学会了制造炸弹。

但在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发

生后，他们的偶像就不复存在了。2011年9月30日，中情局操控“收割者”无人机发射“地狱火”导弹，在也门炸死了奥拉基。正如《纽约时报》记者斯科特·沙恩在新书《目标特洛伊：恐怖主义分子、总统和无人机的崛起》中所指出的，奥拉基成为自美国内战以来，“根据秘密情报并在不经过刑事指控和使其拥有在法庭上自我辩护机会的情况下，被本国政府追踪并故意杀害的”首位美国公民。

2010年，在也门一所大学担任教授和该国农业部长的奥拉基父亲向美国联邦法院递交诉状，要求美国政府给予其儿子作为一名刑事罪被告所应享有的正常权利。但美国联邦法院和奥巴马政府的立场没有丝毫松动，因为正如美国司法部的法律观点所认为的，奥拉基已对美国“构成持续且即刻的危险”。他不仅煽动对美国实施暴力行动，而且他个人还参与策划袭击。

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奥拉基将自身置于美国司法体系的保护

之外。在《目标特洛伊》(书名来自于美军给奥拉基取的代号)，沙恩重演了奥拉基的生活以及导致其死亡的决定。他从作家的角度，把这个恐怖分子的故事与下令干掉他的总统的故事并列起来。“像安瓦尔·奥拉基一样，”他写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出生在美国，父亲是有着穆斯林背景但思想世俗的外国人，靠奖学金来到美国继续其学业。”

但是这些平行并未延伸很远，这个层面并不引人注目，因为正如奥巴马总统据报道所说的那样，这是个“简单案例”。沙恩没有给已经公开的内容加太多料，也未能进入奥拉基或者奥巴马的内心世界。本书读起来就像是一篇超长的杂志文章。

沙恩不太成功的地方是，质疑无人机袭击的道德问题。虽然他说有些人因此无辜丧命是正确的，但是其他各种类型战争的“附带损害”要比这高得多。然而，即便如此，他被干掉没有给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构成致命打击：在也门局势乱成一团之际，这个恐怖组织继续浑水摸鱼大肆行动，而奥拉基在互联网上的传经布道不断激励着想成为“圣战者”的人们。

中国和美国 盟友还是对手？

• 《卫报》/ 2015.09.17

→ 在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张少书(Gordon H. Chang)看来，美国与中国的情感纽带渊源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久远。他在今年出版的新书《宿缘：美国关注中国的历史》里，着力描绘了中美这两大太平洋强国在过去3个世纪里的起伏多变的情感联系。如果说两国官方的外交来往是“显性”的，那么张少书则更多地着眼于探究“隐性”因素：他考察政治领袖的个人记录，还有企业家、艺术家、传教士、社会活动家等的活动及其对中美关系和人们观念的影响。他在书里穿插列举了诸多比如《时代》杂志创办人、哲学大师杜威、意象派诗人庞德等对于中国的想象和描述，呈现出了中美关系在官方文件记录之外的、其丰富程度更甚于今日报纸头条的昨日历史。

“长久以来，中国都是美国的自我身份认同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成元素”，张少书如是说。尽管中美两国关系在过去300年来经历了起起伏伏，但美国人实际上早前是把中国当作塑造美国人自我身份和命运的关键点。“当美国人思考美国的未来和国家的命运时，他们会把目光投向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书中按照晚清、民国、二战、冷战以及当代的历史顺序，从文化、经济、宗教、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对美国人看待中国的观念史进行梳理。“我的研究是希望在这个国家正航行向不确定的未来、并面对着如今这种空前巨大的转变之时，能鼓励一种反思。”张少书说。

美国南海巡航计划挑战中国领海主张

●《纽约时报》，节选 / 2015.10.13

→ 美国已向其亚洲盟国通报，计划在中国于南海修建的人工岛屿附近进行“航行自由”海军巡逻。南海地区向来存在争议，美国和亚洲官员表示，在习近平最近的访美后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加剧华盛顿与北京的紧张局势。

这些巡逻进入至少其中一个人工岛域的12海里范围以内，其目的是对中国扩大领土主张的努力进行挑战。美国官员称，中国通过把岩石和暗礁扩建为足以建设军用跑道、雷达设备和士兵营地的岛屿，加强对这一战略水道中大片海域的领土主张。

至少从2012年起，美国一直避免这么近距离地接近中国在南海中占据的岛屿。今年5月，美国海军的一架P8-A海神飞机曾搭载一位CNN记者，在中国修建的五座人工岛中的三个附近飞行，但没有进入距离它们12海里以内的海域。中国海军无线电操作员曾八次警告美方离开该区域。菲律宾官员说，过去几天美国已经向

他们告知了巡逻计划的事情。菲律宾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特里兰尼斯四世对这一政策转变表示了欢迎。

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和国务卿克里本周在波士顿与来自澳大利亚的对等官员会面，讨论巡逻事宜。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也出席了此次会面，并直言不讳地支持开展巡逻以维护“航行自由”。数月前白宫曾让他提供一些备选方案，考虑美国应该在南海对中国的行动做出何种回应。

在习近平离开美国后，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问题高级顾问丹尼尔·克里滕布林克在华盛顿与研究该地区的美国分析师举行了会晤。一位与会者透露，克里滕布林克在会上向分析人士表示，白宫已决定着手在人工岛屿周围巡逻。这名与会者说，克里滕布林克表示，白宫和一直主张巡逻的五角大楼现在意见一致。

对于如何最好地应对中国在南海的举动，奥巴马政府和美国



2015年9月28日，在南海执行任务的美军阿利伯克级DDG82“拉森号”导弹驱逐舰。

在亚洲的盟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一些人敦促开展巡逻来抵御北京，另一些人则担心中国可能会以此为由进一步扩军。

中国已经表示，如果美国军舰进入人工岛屿周围12海里的水域，中方将予以回应，基本是指中国不会坐视不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表示，中国“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中国“严重关切”美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人工岛屿周围进行巡逻的计划。另外五个国家也对这些水域提出了领

土主张。

在白宫同奥巴马总统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习近平称中国无意让南海岛屿军事化。美国军方的一名官员称，巡逻的目的之一是考验习近平的话。在和习近平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奥巴马强调了“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称“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一切地方航行、飞行和活动”。

防务分析人士休·怀特称，新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可能不会像更强硬的前任阿博特那样倾向于支持巡逻。特恩布尔9月上台前称，中国的造岛活动会“适得其反”。但怀特表示，特恩布尔对与中国对抗，可能会持谨慎态度。

港部署红旗-6导弹阵地或与深圳红旗-9形成防御网

●《汉和防务评论》/ 2015.10.12

→ 据悉，解放军从今年开始，将在香港石岗军营机场建设地对空导弹阵地，研判部署1个营、6个红旗-6地对空导弹，估计年底建设完成。建设仍在进行中，从阵地外形判断，是部署6部红旗-6地对空导弹、1个营的建设方式。红旗-6也有在成都部署，比较两个

阵地的外形，都是6个场坪。

地面战术侦察结果显示，截至7月初，石岗军营机场未部署导弹，估计阵地建设全面完成应是今年年底。同时，由于用地缺乏，在石岗的红旗-6阵地显得比较拥挤，阵地直径142米，6个发射场坪无法对称，这与在内地其他地区建设的红旗-6发射阵地不同。根

据这种导弹的特点，其可能与部署在深圳的红旗-9远程地对空导弹形成高中程防御网。

红旗-9用机动阵地，平时不驻防。红旗-6的出口名称是猎鹰-60D，外形酷似意大利Aspide空对空导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进口少量Aspide导弹，改良成地对空导弹。猎鹰-60D每个发射营部署6部发射车、1部搜索雷达、3部跟踪雷达，搜索雷达距离50公里，可同时跟踪60个空中目标，同时攻击其中4个，采用半主动雷达诱导模式。猎鹰-60D射程1000

到1万8000米，射高30到1万2000米，反应时间14秒，部署时间15分钟，撤退时间7分钟。

在今年9月3日的大阅兵中，地空导弹第一方队展示了红旗-9地对空导弹，第二方队展示了红旗-12地对空导弹和红旗-6弹炮系统。官方简介指出，红旗-12地对空导弹是解放军新型中高空防空武器，红旗-6弹炮系统是新一代末端防御武器系统。而红旗-9地对空导弹是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Emirates
阿联酋航空

你好未来

空中盛会 邀你尽情畅谈

机上行政酒廊带给你高朋满座的喜悦，头等舱机上水疗沐浴房让你焕发身心，安坐于平躺式座椅尽享一晚舒适睡眠，完美点缀你的旅途时光。

阿联酋航空A380每天从北京及上海出发。

emirates.cn

中西美饌 • 免费豪华专车接送服务* • 头等舱私人套间

*免费豪华专车接送服务于北京和上海及超过70个指定目的地提供，需提前48小时预订及仅限于头等舱及商务舱乘客。*阿联酋航空机场头等舱及商务舱贵宾休息室设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及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部分产品及服务内容只适用于指定航班。受条款及细则约束。查询详情，请联络各大旅行社，致电阿联酋航空中国大陆客服中心热线400 882 2380或浏览emirates.cn。



笼中病人

2015年10月10日，**第24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国家卫计委同期公布统计数据称，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例，患者管理率达到73.2%，其中96.9%患者病情稳定或基本稳定。此前，大陆官方发布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五年规划，并且在39个城市启动新一轮精神病人社区康复的试点。

精神疾病患者被如何对待，他们能否获得良好的医疗，足够的尊重，权益受到保护并避免污名化，是衡量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尺之一。他们能否走出精神病院，回归家庭和社区，被社会所容纳，亦是对社会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的极大考验。稍早前刚刚败诉的上海徐为案，是精神疾病患者在各方帮助下，试图通过法律渠道自主走出精神病院，回归家庭、社会的重要案例。徐为“飞越疯人院”、回到平常街巷生活的前景看来并不乐观，但精神病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问题，已被推至众人面前，无可回避。

记者/曾鼎



2013年11月5日，浙江境内一家精神病院，病人在室外的活动场晒太阳、聊天、活动身体。

2015年7月23日下午3点,上海市闵行区瓢泼大雨。汽车经过繁华的商场时,徐为凝视车窗外,迟疑了一会儿,说出冒雨逛街的想法。驾驶座上的律师杨卫华否决了这个主意。他没有停车,但他清楚,徐为下次逛街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杨卫华看了下手表,冷静地提醒他的当事人:“时间已经不多了”。

徐为必须在4点前赶回他所说的那个“关鸟的笼子”。对于笼子外的世界来说,徐为的时间此刻已经是每小时、甚至每分钟作为尺度。但对于笼子里的生活,即便是以年来衡量,徐为的时间也漫长得很。他已经在那里熬了超过10年。

半小时后,车逼近闵行青春精神病康复医院三四米高的围墙。病人徐为属于这里。精神病院的作息时间要求,15点50分病人晚饭,饭后病人即刻回到宿舍楼,直至翌日早晨6点30分才能下楼。徐为冒雨穿过精神病院的铁门,那是他通往笼子的入口,也是他向往世界的出口。

精神病人

徐为脸庞瘦削,黝黑,身材颀长。他掉了一颗门牙,但不影响说话时语速很快。他谈吐清晰,与常人无异,甚至堪称健谈。只有当他承认自己存有幻觉、有被跟踪的幻想时,才可能会被注意到患有精神疾病。

这个穿着橙色Polo衫的上海男人挽起袖子,向媒体讲述他被精神病院收治十多年的经历时,言辞间对出院的渴望,以及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很容易让人以为他是舆论曾热议的正常人“被精神病”。

“树上有十只鸟,开枪打死一只,还剩几只?”

“我说还剩九只。”病人徐为狡黠地

笑着,回忆自己当年的玩世不恭,随后升高语调,嘲弄医生的问题,“剩下的都站在树上等你打呢。”

14年前,面对精神科医生的问询,徐为展现了他身上迄今仍可令人觉察的机智与幽默,但他没有从医生当年的其他问题中脱身。医生判定他存有幻觉和被跟踪被迫害的妄想。病历本上,诊断写着“自知力无,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这表示,徐为患上了他自认为没有的精神疾病。对病情缺乏主观认识,他的疾病属于“严重精神障碍”。

在登记在册的逾400万精神障碍患者中,徐为也许是治疗后病情最轻的重症精神疾病患者之一。但在不了解精神疾病的人看来,病人徐为本质上跟2011年在上海浦东机场刺母的留学生汪某、2015年被曝光对3岁男童施暴的陕西男子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是令人畏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精神病人’是一顶污名化严重的帽子,对它的认识趋于极端。”专注精神病人权利的深圳衡平公益机构负责人黄雪涛认为,施暴男子不代表精神病人的整体面貌。没有确凿证据表明,精神病人比普通人更具明显危险性。黄雪涛是一名在职律师,过去多年,她频繁介入中国精神病人的焦点事件。

精神医学界的知名医生也认为,当下中国精神病人面临社会诸多误解,处境糟糕。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说,“像徐为这样的精神病人,出院回归

社会的最大障碍是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和歧视。”

“有些精神病人出院以后,他回医院不是要求随访,而是要求医生摘掉‘精神病人’的帽子。可这个帽子怎么摘?疾病的诊断是个客观事实。”作为中国顶尖精神医疗机构的医生,谢斌和他的同事对于病人的求助束手无策。

2013年,中国第一部关注精神卫生领域的《精神卫生法》在耽搁多年、屡次推迟后,终于得以实施。从公益、医学、司法界多方人士的评价来看,中国在精神病人权益保障的问题上取得了进步,尤其是在中国强制收治精神障碍患者程序,即常说的“被精神病”问题上,立法取得突破。不过,另一个隐藏已久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精神病人住在医院里出不来,是非常普遍的问题。”谢斌说,徐为的遭遇具有代表性。在中国各地精神病院甚至住得比徐为更久,超过二三十年的人比比皆是。

从36岁住到49岁,精神病人徐为的遭遇,撕开了这罕为外界关注的一角。像他一样,中国精神病院的许多病人按照医生对病情的评估,早已经可以出院,但由于家庭、社会的因素,他们迟迟无法出院。

徐为通过各种渠道努力了超过10年之久,迄今仍未能走出医院。在为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杨卫华看来,徐为头上戴着一顶无法摘掉的“精神病人”的帽子,在残酷的现实中,他的出院努力一再失败,是为全社会所有的精神病人埋了单。

顽疾阴影

徐为的精神分裂症病情要追溯到他早年间在异国的经历。同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徐为的疾病症状首次出现是在青年时期。23岁那年,他借出国潮远赴澳

**在这个名字充满希望的
“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49岁的徐为在日复一日的
“康复”中,青春不再。**

2015年4月14日下午，与精神病院的值班医生僵持了近1个小时后，杨卫华获准站在精神病院的大铁门外，为门内的徐为宣读判决书。

大利亚，边打工边读语言学校。如今的他坦然承认，其间自己迷恋赌博，输掉100多万元，并于那时起出现了一些幻觉和被跟踪的感觉。

徐为在澳洲输光了积蓄。失业后，他一度被迫住进澳洲的慈善机构接受救济。2000年，也就是在赴澳洲的11年之后，34岁的徐为被告知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取得签证，被澳当局遣返回国。

徐为坚持认为，澳大利亚移民局毫无理由拒签。为此，回国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他到上海外事部门、出入境管理处、澳大利亚领事馆等机构四处维权，甚至向父亲要钱跑到北京的澳使馆申诉。

在此期间，徐为曾在国内短暂谋职，但他的工作并不顺利。他仍试图回到澳大利亚，越洋电话费就花掉上千元。“我爸爸急了，就告诉我大哥，我大哥说‘他发病了’，就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徐为回忆。

2001年，徐为被送入上海市普陀区精神病院收治，并于一年之后出院。根据徐为目前所居住的闵行区青春精神病院的病史记录，徐为那时候已经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被医院给予氯丙嗪——一种常见精神分裂药物的治疗。病历记录称，治疗在徐为身上“取得了进展”。

但出院以后，徐为擅自停药，病情复发。这样的情况在精神病人中不算少见。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多名精神科医师均表示，由于精神类药物存在肥胖、嗜睡等副作用，很多病人在病情得到控制以后没有听从医生的反复叮嘱，擅自停药。

“经过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病人有20%能够完全痊愈，30%的病人病情显著改善。这意味着有一半的人几乎能够完全恢复。”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副主任医师诸索



字说，“但有30%的病人只能部分好转，仍有症状残留，需要持续治疗。悲伤的是目前还有20%的病人治疗没有效果。”

整体上，药物仍是精神分裂症病人的福音。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举办的一个精神分裂症知识讲座上，参加者多是病人和家属。受益于良好的治疗和康复，活动现场的登记和桌椅的排放都由该院的病人自己操持，以至于外人很难分辨哪些是院方人员，哪些是病人。

“统计表明，精神分裂症5年内的复发率达到80%。”诸索宇医师现场叮嘱，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出院后千万不可擅自停药。

时隔10年，今天的徐为已认识到这一点。“当时我自己没吃药，现在我肯定会吃药的。”徐为说。根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书的记录，再次入院后的徐为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到了吃药时间能爽快地吞下氯丙嗪。他知道，这种药物能控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兴奋躁动、紧张情绪。

但是，2003年徐为的那次停药，或许已经令局面不可挽回。徐为与父亲因生活

琐事发生了一次争吵。从徐为和居委会街坊的回忆中，当年事情的经过大致是：在徐为因不满“每天吃饭都是青菜豆腐冬瓜汤”而发生的争吵中，徐为的指甲抓伤了父亲，作为徐为的监护人，徐父喊上居委会，把徐为强行送进了闵行青春精神病院收治。

这一住就是漫长的12年。再度进入精神病院的岁月里，徐为按照医嘱服药治疗。按照院方记录，他的病情再也没有恶化。然而，徐为却未能像上次那样依靠家人走出精神病院。在这个名字充满希望的“青春”精神病康复院，49岁的徐为在日复一日的“康复”中，失去了青春。

飞越病院

由于不是徐为的临床主治医师，谢斌不敢断言徐为的临床情况。但从该院的司法鉴定看，谢斌认为，今天的徐为已经可以、也应该回归社会正常生活。“无论是疾病的症状、对行为的控制以及对自身权益的保护，综合这些能力来看，徐为可以在社会上正常生活。”谢斌说。

不过，尽管医生对病人病情作此评价，但它们日后并未能呈现在法庭上作为证据。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司法鉴定中有对病人诉讼能力的鉴定,但目前,还没有“出院鉴定”这一项。

对于徐为来说,精神病院的铁门似乎永远关上了。闵行青春精神病院在地图上直线距离徐家20多公里远,但徐父一直没有把徐为接回家。2008年,徐为住进闵行病院的5年后,徐父去世。徐为的监护人变更为徐为的大哥。

但大哥也反对弟弟徐为出院。徐为怀疑,父亲留下的公租房被他的大哥拿去出租,他出院可能影响出租房的使用权问题。此外,大哥可能嫌弃作为监护人的负担,认为还是关在医院省心。

没有监护人的同意,闵行青春精神病院便不肯让徐为出院。根据中国精神病院的惯例,精神病人一直履行“谁送来、谁接走”的做法。这在法律上无据可依,但却默认了一个强大的现实逻辑:精神病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只有监护人拥有这个权利。

徐为的监护人已经多年没有再出现。徐为称,“大哥平时在外省工作,以前每年春节还会到医院探望一两次,但最近几年,大哥再也不出现了。”徐为的大哥拒绝了媒体的采访请求。

出院无望,徐为曾一度想过自杀。但一名新入院的女病友迎春让徐为发生了改变。徐为恋爱了。

他摆脱了轻生念头,他要攒钱,带女友逃离精神病院。于是,在闵行青春精神病院,徐为演绎了如电影《飞越疯人院》一般真实的逃亡故事。

徐为开始帮康复院做一些事情,获取酬劳。这一点得到青春精神病院院方的证实。徐为为两百多名病友理发,以此向院方争取到每月60元的报酬。因为精神状况比较稳定,他还帮助院方管理病

人。时间久了,徐为甚至获得自由出入精神病院的“特权”,能够有偿帮病人采购点心、香烟等物品。他用自己的报酬购置了一部手机。

“我们想逃到广东,那身上一定要有。我拼命做生意,存了好几年。”徐为说,“不然我早就跑掉了,就是没钱。”七八年下来,加上政府发放的残疾金,徐为已有两三万块存款。

2011年2月,徐为觉得时机成熟,准备带女友迎春逃奔南方。他特意挑了春节后的时间,因为“那时期买火车票不用身份证”。他告诉精神病院守门的阿姨,4点钟要出去买点心。

为了避免阿姨生疑,徐为已经在逃跑前做了很长准备。他会不时策略性带上女友出去,为康复院采购东西,“让看门阿姨觉得这是习惯”。

精神病院的铁门一打开,徐为和迎春直奔出去,打车到上海南站。两人买了9点多去广州的站票,又买了两盒泡面。因为又饿又冷又困,他们在候车室里睡着了。醒来一看,康复院的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已经在朝这边走。

徐为的心里一凉,女友还想挣扎。徐为劝住了她:“(如果医生)他们在大厅一叫,这是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一大帮人就会把我们摁在地上,很难看,有什么意思。”

徐为和女友被抓回了病院,两个人被分别关进精神病院的小黑屋。院方告诉他们出来可以,但一定要和对方断掉关系。徐为不愿,甚至写信给上海的电视台,问为什么精神病院就不能谈恋爱。“后来医生拿我们没办法,我们两个就是黏在一起。”徐为笑着说。

和女友的逃跑计划失败后,精神病院加强了看管,徐为失去了自行出院的特权。

徐为的女友迎春早就病情稳定,医院认为可以出院,家属也愿意接她回去,但她却留了下来。她要等徐为一起出院。

艰难诉讼

逃跑失败以后,徐为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谋求自由。

既然他的出院权利被授予监护人,他就尝试申请变更监护人。徐为的两个哥哥都反对他出院,但母亲的突然出现为他带来了希望。

徐母早在徐为不到12个月大的时候就与丈夫离异,后来生活无着,选择出家,住在邻近的江苏省某地的一座小庙里。几十年母子离散,2011年与母亲在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再相见时,母亲已是70多岁的高龄。徐母在精神病院见到徐为和他女友后,住了几天,相处愉快。徐母夸赞迎春人很好,为她洗衣服,很贤惠。他们甚至畅想起出院后三人共同生活的幸福前景。

但徐为的哥哥打断了他们的幻想。徐母去找徐为的兄长商量变更监护人,但对方执意不肯。徐为向法院请求变更母亲为监护人。但法院判决认为,徐母年事已高,且无稳定经济收入来源,不适合担任徐为的监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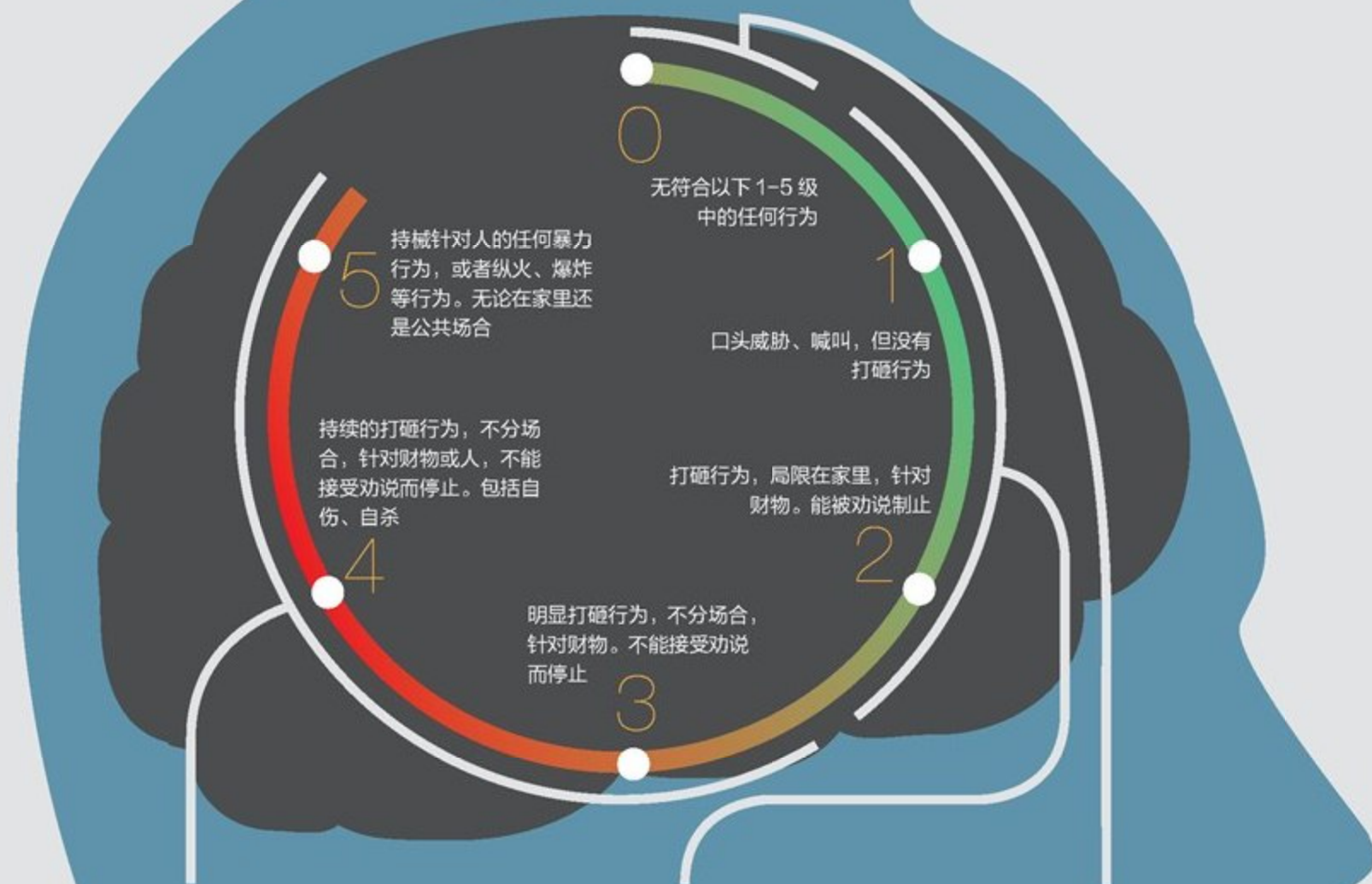
付完律师费,给了母亲一些钱,徐为的积蓄所剩无几。幸运的是,他通过公益律师黄雪涛找到上海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杨卫华,杨同意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2013年5月6日,《精神卫生法》实施的第六天,徐为委托杨卫华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大哥告上闵行区法院。这是依据《精神卫生法》起诉、被法院受理的第一个案件,事后也被冠以“精神卫生法第一案”之名。

但徐为提起诉讼以后,法院迟迟未予

大陆社区对不同病情 精神病人的管理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承担患者社区/乡镇管理，分为患者基础管理、患者个案管理。国家卫生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提出的风险评估分级标准，对辖区所有精神病人进行危险性评级为0-5级。针对不同级别病人，对社区精卫医生的随访频率要求不一。



病情不稳定患者

危险性为3-5级，或精神病症状明显、自知力缺乏、有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或严重躯体疾病的患者。

要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症处理后立即转诊到上级医院。必要时报告当地公安部门，协助送院治疗。对于未住院的患者，在精神科执业医师、居委会人员、民警的共同协助下，进行系统、规范治疗，1-2周内随访。

病情基本稳定患者

危险性为1-2级，或精神症状、自知力、社会功能状况至少有一方面较差的患者。

要求

若无其他异常，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生首先应判断是病情波动或药物疗效不佳，还是伴有药物不良反应或躯体症状恶化。分别采取在规定剂量范围内调整现用药物剂量和查找原因对症治疗的措施，必要时与患者原主管医生取得联系，或在精神科执业医师指导下治疗，经初步处理后观察2周，若情况趋于稳定，可维持目前治疗方案，3个月时随访；若初步处理无效，则建议转诊到上级医院，2周内随访转诊情况。

病情稳定患者

危险性评估为0级，且精神症状基本消失，自知力基本恢复，社会功能处于一般或良好，无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无严重躯体疾病或躯体疾病稳定，无其他异常的患者。

要求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继续执行上级医院制定的治疗方案，3个月时随访。

精神病科普

摘自香港心理卫生学会

Q 精神病患者都是有暴力倾向、随时会伤害别人的危险人物？

A 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占病患者总人数不到百份之五，多数由于缺乏适当的治疗所致。大部份的精神病患者都是比较被动、内向、退缩和心地善良的。如能定时复诊服药，加上专业人员的辅导及照顾，则更为安全。

Q 精神病永不会痊愈？

A 和生理疾病一样，精神病患者越早接受治疗，痊愈机会越高。多数精神病患者，只要治疗得当，加上定时复诊服药，就能稳定病情，逐渐恢复正常的生活。

Q 治疗精神病人最好将他们隔离或关进医院？

A 精神病属于长期病患，治疗过程较长，但大部分病患者只需在精神科门诊部接受治疗，无需住院。只有当病患者病情严重，或会对自己或他人作出伤害时才需要入院。长期隔离只会令精神病患者更脱离现实，增加依赖性和自卑感，更难痊愈。

2014年7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做出的精神司法鉴定结论认为，徐为“精神症状基本缓解”，“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立案。法院质疑，徐为能否委托律师打这个官司。

杨卫华向法官写下言辞恳切的一封信，为徐为陈情：“自由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稀松平常，但在他那里却是那么遥不可及。他不一定强求法院支持他卑微的诉求，只希望能从4公里外的康复院走出来，来到神圣的法庭上，倾诉他对自由的渴望。”

2013年12月，法院在案件拖了7个月后终于立案。这令徐为和杨卫华欢呼雀跃。案件定于2014年1月6日庭审，但令人意外的是，就在开庭前几天，杨卫华接到闵行区人民法院取消开庭的通知书。法院要求对徐为的诉讼能力进行鉴定。

法院对徐为诉讼行为能力的质疑，意味着事情又回到了原点。杨卫华每年选择为一两个公益案件提供法律援助，但他没有预料到，比之其它公益案件，徐为的案子会如此漫长。

对于徐为的案件来说，这只是波折的开端。继法庭立案用时7个月后，徐为的诉讼能力司法鉴定又耗时6个月。2014年7月，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杨晓敏做出的精神司法鉴定结论认为，今天的徐为“精神症状基本缓解”，“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徐为可以打官司了。“这是对徐为精神状况的高度认可。”杨卫华说。

2014年11月17日，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徐为终于从封闭管理的康复院走出来，坐到原告席上出席庭审。

那是公开报道里全国第一宗封闭病房的病人以“被监护人”身份成功出庭坐上原告席的案件，也是徐为自越院逃跑失败后，三年来第一次可以自由走出精神病院。

等待宣判结果的日子里，徐为几乎每天都向法庭打去电话，询问案情进展。闵行青

“自由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的稀松平常，但在他那里却是那么遥不可及。他不一定强求法院支持他卑微的诉求，只希望能从4公里外的康复院走出来，来到神圣的法庭上，倾诉他对自由的渴望。”

春精神病院的值班医生回忆，病房里的徐为对判决结果充满期待：“赢了一定要出去好好吃一顿。”

2015年4月14日下午6点，康复院紧闭大门。尽管已经过了探视时间，律师杨卫华还是从法庭赶来，希望能给徐为当面送达判决书。在与精神病院的值班医生僵持了近1个小时，反复强调精神病人不是犯人，并请来民警协调后，杨卫华获准站在精神病院的大铁门外，为门内的徐为宣读判决书。

徐为败诉了。通过司法渠道努力了三年之后，铁门还是未能为他打开。门外，几名来自全国各地乃至香港的关注徐为案的公益人士前来声援。其中一些人和徐为一样都曾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症状也都已经和徐为一样得到缓解，但她们拥有徐为没有的自由。

2013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不过，在“非自愿住院治疗”这一点上，法律的表述较为模糊。医院方面称，徐为是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前由监护人送医的，“并非‘自愿住院治疗’”，因此其出院也应当由监护人提出申请并接走。一审判决支持了院方的说法。

在杨卫华看来，一审判决结果拖了那

么久，可能超出了法官独立判断的范围。2015年3月，杨卫华问闵行区法院，这个案子到底什么时候会判？主审法官说要跟领导商量。黄雪涛猜测，法官可能担心，此事口子一开，那么多出院难的精神病人都要求出院，会不会造成比较大的恐慌？

“但就徐为的个案而言，我实在想不到有什么理由判决不让他出院。”黄雪涛认为，法官不应该为了维护所谓社会整体的稳定，侵犯徐为个人的人身自由权利。

徐为和代理律师杨卫华决定上诉。

二审希望

二审成为徐为及其律师的最后一搏。2015年7月23日早上8点，二审开庭前，徐为和杨卫华提前两个多小时就已经赶到法院等待。

二审中，杨卫华没有找到新的法律事实，也没有新的证据要提交。他的辩护继续反驳了一审判决书中采用的康复院说法。他指出：“被告认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有200多个精神病患者，整个上海的患者有更多，如果你让他出院的话，会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精神卫生法》所讲的危险性，是针对患者个人，而不是患者所处群体。用推而广之的视角，去考虑整个群体的危险性是不妥当的。”

院长陶乃强的辩护也在意料之中。他陈述了自己一贯坚持的说法：徐为目前病情相对稳定，精神病症状基本消失，是在医院的治疗和看护下所取得的，“倘若在缺失监护的情况下出院，其潜在的风险和危险性令人担忧。”

就“徐为是否具有危险性”、“徐为是否能够自行办理出院手续”两个焦点问题，双方在法庭上再度激烈辩论。这些议题与双方在一审法庭上的辩论并无明显差别。



摄影：陈鹤

被告席上本应出现的另一被告人——徐为的大哥，依旧没有出席庭审，法官因而几乎成为一审和二审的唯一区别。在庭审当中，主审法官李虎不断追问案件细节。事后，杨卫华和其他几位旁听者都认为，这位未曾有过接触的法官展现出很高的专业素养。

“当事人徐为，法庭现在给你五分钟的时间，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请你着重谈谈，为什么你强烈要求从康复院出来，你具备了哪些可以回归社会的条件和能力？”就在整体上的法律事实已经清楚，庭审本应波澜不惊地结束时，主审法官李虎突然授予徐为这一权利。

忐忑不安，这是上海本地一家精神疾病志愿协会的旁听者在庭审结束后对自己

心情的描述。没有人知道，徐为能否抓稳这根表现自己思维能力的橄榄枝。

徐为像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样，几乎没有停顿地以一、二、三、四的逻辑顺序，说出这段最后的自我陈述：

“首先谈谈我为什么强烈要求出院。住在精神病康复医院是没有自由的，不管里面有个广场可以走走，还是有个房间让你稍微自由一点，但总之这是不自由的。

至于我有何能力出院，首先我脾气很好，一般不会和人发生争执。我之前在医院的时候，他们指着我的鼻子，甚至有的时候打我一下，我都不生气，很少发生争吵。

我这个人很努力，我愿意工作，也愿意承担生活的压力。同时我也有这个能力。我

曾经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不管怎么说总归是有工作的。虽然他们说从前会去赌博，但赌博首先要有钱，这也可以证明我有工作，没工作哪来的钱去赌博？

即使因为年龄的关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导致我找不到工作，我也有低保，有国家的保障。另外我有女朋友，她哥哥已经同意每个月给1500元供我们俩人生活。她现在的症状已经基本缓解，只是因为没有人照顾而且要等我所以才继续住在康复院。等到我可以出去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会一起出院，两个人可以相互照顾，相依为命。”

这一幕让人想起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只不过徐为的梦想仅仅是“出院”这么简单。徐为在法庭争取权利的



摄影 吴悦

这场短暂演说赢得庭审旁听者的称道。一位普通上海市民甚至忘却法庭纪律，鼓掌并激动地叫了一句：“好！”

在总结完庭审后，法官李虎说，“最后我想告诉院方，徐主张出院，是正当权利。法庭之外，不管结果如何，要善待他。”

上海青春精神康复院院长陶乃强没有对徐为的最后陈述发表看法。庭审外，他婉拒了记者的问题和所有时间段的事后约访。

唯剩等待

2015年7月23日下午，我和杨卫华送徐

为回精神病院，乘坐了一段地铁。对于这些年地铁线路建设风头正劲的这座城市来说，上海复杂的地铁网线已经令徐为这个本地人备感陌生。在摇晃的车厢中，他紧紧拽住头顶上的抓手。

我和徐为聊到对二审的预期结果。他畅想，出去就把父亲的公房收回来，和女友迎春住一起，开个棋牌室。两个人都有残疾金，又有房子，还能有点收入，这就是徐为理想中的自由日子。

“徐为你要是真出去了，自己一定要争气。”杨卫华在一旁插话。根据精神科医生

瓢泼大雨中，杨卫华的车将徐为送回青春病院——那个他讨厌的、被剥夺自由的笼子。徐为打开车门在雨中奔跑，从门口小屋处的护工那里接过当天的药物氯丙嗪和水，一饮而尽。

徐为离家住院十多年以后，邻居们已经淡忘了早年前的记忆，他留下的只是隔阂和一点模糊的残影。社区里的很多街坊觉得“病人不闹”就好。

的描述，徐为的精神分裂症不太可能彻底治愈，他有过“擅自停药”的前科，仍有残留症状，幻觉比如不安全感依旧还会有一小部分。也是私底下，杨卫华才会对当事人说出他的担忧。但徐为回应坚定，“我出去以后，他们肯定不会有机会把我送进来。”

尽管存在同样的担心，但我在同徐为的相处以及前后的电话交流中，从未感受到他是一个精神病人。现实中，这个已近天命之年的男人热忱而有礼。我试图努力捕捉他“精神状况不稳定”的病态细节，但徒劳无功。事实上，当精神科医生们普遍认为他“符合出院条件”时，这样的尝试不免显得滑稽可笑。

回去的路上，杨卫华提及一审开庭后的一段经历。“当时我们庭审结束后一起吃饭，徐为刚开始就坚持要埋单。中间我就自己出来结了账，370块钱。事后他知道，抓着一把钱硬是要还给我。我们吃完饭，他还把剩菜打了包，说是带回去给病友改善伙食。”

瓢泼大雨中，杨卫华的车将徐为送回青春病院——那个他讨厌的、被剥夺自由的笼子。徐为打开车门在雨中奔跑，从门口小屋处的护工那里接过当天的药物氯丙嗪和水，一饮而尽。与我们道别后，他在大雨中穿过空荡荡的院子，跑回关了他12年、一天睡十多个小时的病房楼。

二审结束的一个多月后，徐为在电话

里告诉我，判决结果还没有消息。他已经不再像一审后那般焦急，甚至一个电话都没给法庭打过。徐为知道，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有用的，只剩下等待。

徐为的命运，如同阻挠他下车逛街的大雨和时间一样，未能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他已经与众人无数次讨论过官司的结果。经历过大喜大悲，徐为已经有所准备。“要真失败了，”在我和杨卫华送他回康复院，下车前的最后一刻，他咧嘴笑着接过杨卫华的安慰：“也算是这一生来过，历练过。”

2015年9月18日，二审的结果传来。徐为败诉了。

（应受访者要求，徐为和迎春系化名）

博知天下
一扫尽知

一码不扫，何以扫天下！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不信？来扫！

瞬息万事

信手可得

有家难归

大陆精神病人回家困境

记者 / 曾鼎





徐为并非无法走出精神病院的个例。在内地，仍有很多像他那样应该走出、也可以走出的康复精神病人被困在精神病院的高墙之中。他们的康复情况已经符合出院条件，但他们的监护人——家属不愿意接纳其出院。按照多年来的惯例，这意味着病人几无可能出院。

这类出不了院的病人规模，尚未见全国性统计数据。但《凤凰周刊》的调查表明，这种现象极其普遍。从对大陆精神卫生领域医生的采访、地方媒体的公开报道以及学界的文献研究中可以窥见，这样的人群在长期住院的精神病人中可能高达半数：

2013年，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近300名住院患者，150余人符合出院条件未能出院；2013年，上海市浦东精神卫生中心，70名已经临床康复或病情稳定的精神病人要求出院，52名病人有家难回；2015年，福州市精神病人疗养院300多名住院者，其中一半左右病人已经痊愈，但家属或监护人不愿接人；从业15年的温州康宁医院分院院长叶晓丹也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该院目前的数百名在残联申领了残疾证、托管在医院的病人中，大概有将近一半是家属不希望出院的。

如果说罹患精神疾病是一种不幸，那么置身高墙围拢的精神病院，再也无法回归家庭、社区和社会，便是一出更为不幸的悲剧。家属不肯接纳，社区一再反对，个中原因错综复杂，也各有苦衷。但一个文明的社会，不应让没有罪行的精神病人和康复者，忍受社会的歧视并承受社区精神卫生资源短缺的代价，在精神病院度过漫长一生，直到死亡。

疾病的羞耻

在所有疾病当中，没有哪种普遍的疾

病能像精神病一样，给中国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庭，带来如此沉重的羞耻感。它叫做“病耻感”。受访的医务工作者无一不向记者强调这个词。

“它是指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自己有精神病或家里有精神病人的事实。”民营精神病医院康宁医院的医师叶晓丹叹气道。记者此前也曾联系了北京和上海的多名精神科医生，请他们帮忙介绍病人和家属，结果无一例外地婉拒采访。

疾病会给家庭造成经济负担和精神创伤，但精神疾病更加特殊。它会令病人和家庭以及家庭和外界的关系都变得紧张。街坊、民警、社区工作人员都曾在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有时希望了解情况，帮助做病人的看护管理，但都会遭到家属的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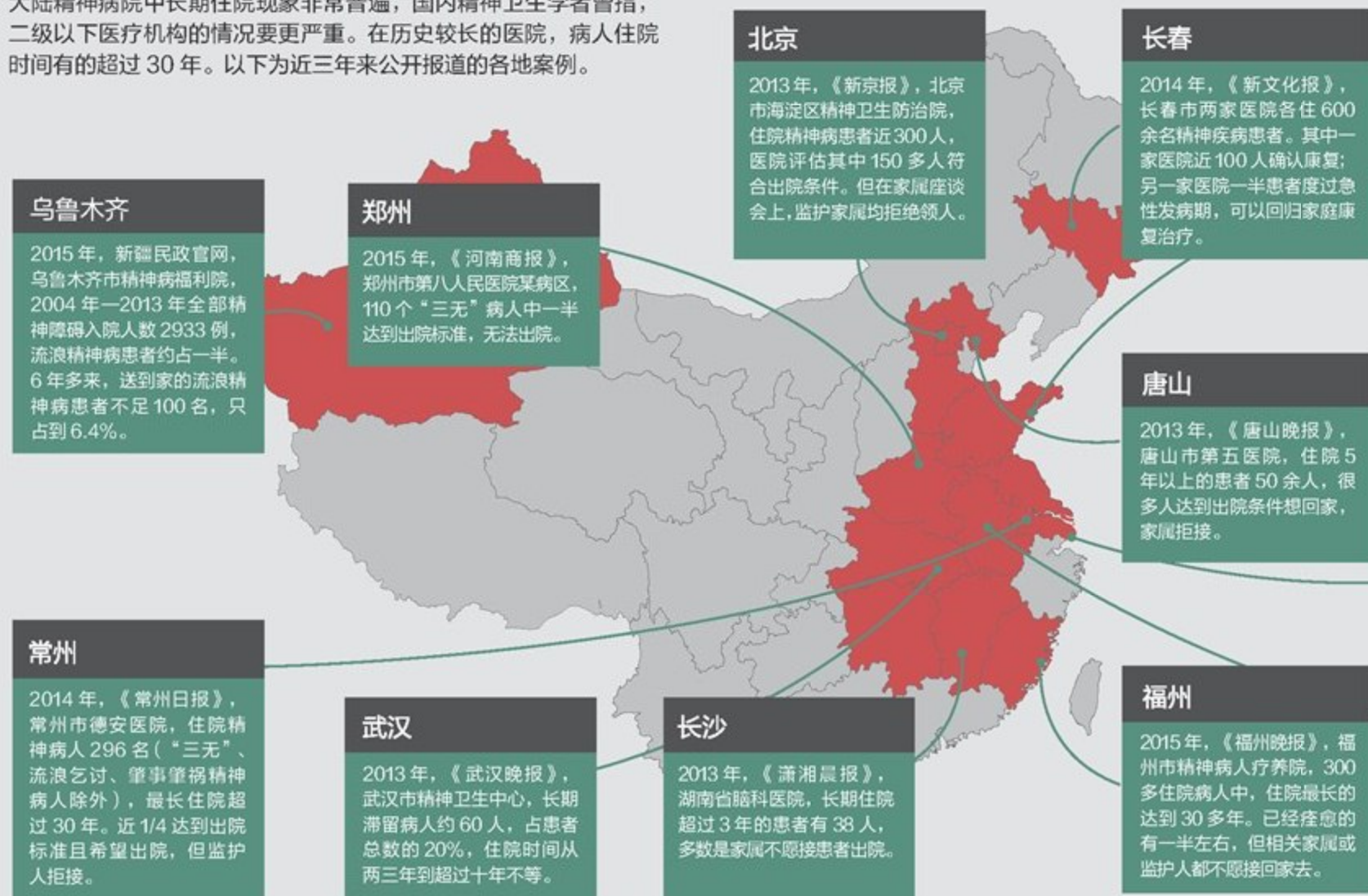
被小心回避的“外人”甚至包括医护人员。即使是看病就诊本身，对很多人来说也难以见光。叶晓丹过去在康宁医院门诊坐诊时，就曾碰到很多使用假名字的情况，医院后来被迫要核对病人的身份证。还有一些家属甘愿放弃报销，也要把病人带到异地求医。

“因为觉得不光彩，很丢人，精神病人跟家属能来我这儿参加活动已经说明情况很好了。”在北京海淀区的田村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神康复科的心理治疗师张冲为他的20位病人做完团体康复活动后向记者解释，为什么团体康复活动中没有一张年轻人的面孔——年轻精神病人的家庭不愿让病人抛头露面，他们更加隐秘，病耻感更加严重，只有病史较久的年长者才能相对坦然。

“整个社会的歧视和偏见，甚至波及到精神专科医院及医务人员。”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说，在政府包分配的年代，一些医生、护士分到了精神病院工作，都是哭着来的，过一两年就都

难出院的各地精神病人案例（不完全整理）

大陆精神病院中长期住院现象非常普遍，国内精神卫生学者曾指，二级以下医疗机构的情况要更严重。在历史较长的医院，病人住院时间有的超过 30 年。以下为近三年来公开报道的各地案例。



走了。叶晓丹告诉记者，有的护士择偶也为此受到影响。当谈到自己的工作时，有些人的语气会立刻变得不一样：你是跟精神病人打交道的？

“一得精神病，一辈子就完了”——由于过去无药可求的精神医学史，部分病人表现出的疯狂状态，以及当代精神卫生知识的普及欠缺，精神病从整体上被污名化了。当极少数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以暴力的面孔示人时，它可能会酿成一场公共视野里的悲剧。但同样悲剧的是，它可能引发社会对所有精神病人群的恐惧和歧视，加剧对精神病的污名化。

他们被视为无法控制自己精神状态的疯狂病人，是公共安全的洪水猛兽。如果说

“危险”、“恐惧”，没有谁比跟精神病人朝夕相处的医护人员更能理解这些了。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对于重症精神障碍患者急性期住院的管理是封闭式的，一些病房配有门禁。医护人员告诉记者，只要度过行为怪异、又动又闹的急性期，病人病情稳定后其状态可与常人无异。

“留在精神病院，住上十几年的病人，很多是精神分裂症病人。他们很难彻底治愈。”叶晓丹说，精神分裂症分为“阳性”和“阴性”症状，阳性症状表现为精神亢奋，多动不安，比如又唱又跳、吓人，一般一周就能控制，再经过巩固治疗，出院以后坚持吃药，病情基本可以维持稳定。阴性症状表现为精神活动减退，情感淡漠，很难治愈，

比如街头上一些流浪的患者，病人自言自语，但不影响到其他人。

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分裂症知识讲座上，识别出哪些是病人哪些是家属并不容易；在北京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也很难觉察到精神康复科与其他科室患者的差异；在北京社区内的家庭病房，也很难从病人当中找出哪些是照顾他们的护工。只有当医护人员告诉记者或记者与患者交流时，才能感受到病人言语、精神上的些许障碍，有的是疾病本身所致，有的是药物副作用所致，有的或许是长期被隔离、被禁锢的生活所致。

精神病是一种谱系很广、病因和表现都很复杂的疾病，其中有很多需要澄清的

青岛

2013年,《齐鲁晚报》,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近900名病人中,近1/4的病人病情稳定适合出院,但是病人家属多拒接。

上海

2013年,《劳动报》,上海市浦东精神卫生中心,70名已经临床康复或病情稳定的精神病人自愿要求出院回家,大部分监护家属拒绝领人,其中52名病人有家难回。

合肥

2013年,《安徽青年报》,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某病区患者约100人,长期住院约占1/3,有的病人住到直至去世。

地方。随着现代医学的强势,对疾病理念的扩大化,越来越多的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精神病。比如,网瘾、睡眠障碍都可能是精神疾病。叶晓丹说,有精神科医院调整了科室名称,比如将“睡眠障碍”单列为一个科室,以减少病耻感。很多人可能患有抑郁症或精神分裂症,但仅仅表现出失眠,所以去失眠科看病,便于家属接受,不会被轻易扣上“精神病”的帽子。

但公众的看法不会随着家属病耻感的减少而改变。中国的一项学术调查表明,当代社区市民对精神病人仍持有传统的偏见、歧视、害怕及阻隔。尽管社会各界同情精神病人,主张精神病人应享有个人权利,但高达39.6%的市民认为精神病人应与社区

其他人隔离,35.5%的人主张精神卫生设施应设在居民区以外,35.8%的人认为引起精神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自我约束能力和意志。

家庭的两难

2013年,中国首部正式实施的精神卫生领域法律《精神卫生法》规定,今后如无特殊情况,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一般实行“自愿原则”。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为落实这一要求,向所有住院患者宣讲了《精神卫生法》。院方调查发现,近300名住院患者中,180多名患者都要求出院回家。经过医院对患者病情评估,其中150多人符合出院条件。

医院随后为此召开出院患者家属座谈会,但几乎所有参加座谈会的患者家属都在会上表明,坚决反对患者出院。时任海淀精防院副院长的李文秀回忆,有的家属当场质问医院领导:“你们怎么能让患者回家呢?我们有困难啊,没地方住,回到家我们管不了他……”

精神疾病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很高的疾病负担。国家卫计委2015年10月9日的信息显示,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患者429.7万例。另据新华社报道,2013年卫生部门调查表明,中国现有1亿多各类精神障碍者。精神疾病在各类疾病负担中排在首位,约占总负担的20%。据国内精神卫生学界的推算,这一负担还在快速增长,到2020年预计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1/4。

当这一负担落到单个家庭时更显沉重。精神分裂症患者第一次发病通常是在青壮年时期。在中国农村,这很可能让一个家庭因病致贫。一些被称为“武疯子”的重症精神病患者难以得到有效的救治和监

精神疾病谱系

ICD-10世界卫生组织精神与行为障碍类别目录。中国的精神科,包括综合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和精神专科医院,采用世界卫生组织ICD-10和中国自己的CCMD-3两套标准的都有,但目前看CCMD-3的应用范围越来越窄,大有被ICD取代之势。

F00-F09 器质性,包括症状性,精神障碍
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

血管性痴呆;

见于在它处归类的其它疾病的痴呆;

未特定的痴呆;

器质性遗忘综合征、非酒和其它精神活性物质所致;

谵妄,非酒和其它精神活性物质所致;

脑损害和功能紊乱以及躯体疾病所致的其它精神障碍;

脑疾病、损害和功能紊乱所致的人格和行为障碍;

未特定的器质性或症状性精神障碍

F10-F19 使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

F20-F29 精神分裂症、分裂型障碍和妄想性障碍

精神分裂症;

分裂型障碍;

持久的妄想性障碍;

急性而短暂的精神病性障碍;

感应性妄想性障碍;

分裂情感性障碍;

其它非器质性精神病性障碍;

未特定的非器质性精神病

F30-F39 心境[情感]障碍

躁狂发作;

双相情感障碍;

抑郁发作;

复发性抑郁障碍;

持续性心境[情感]障碍;

其它心境[情感]障碍;

未特定的心境[情感]障碍

F40-F49 神经症性、应激相关的及躯体形式障碍

恐怖性焦虑障碍;

其它焦虑障碍;

强迫性障碍;

严重应激反应,及适应障碍;

分离(转换)性障碍;

躯体形式障碍;



护，家属们把他们关进自制的铁笼以图省事。农村地区“镣铐锁身”、“猪圈关儿”等悲情病人报道不时见诸报端。

即使是在城市，家属拒绝病人回家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新京报》曾报道海淀精神病院一例年轻病人小令的遭遇。医生评估认为，他已基本达到出院标准，“经过康复训练，恢复得更好一些后，就可以回归社会了。”

然而，家人似乎被小令之前杀害女友的劣迹吓坏了。包括母亲、妹妹在内的家人都坚决不同意他出院。母亲曾写信给住在海淀区精神病院的儿子，“小令，你是个极孝顺的孩子。你病好时极好，但有一点外界的刺激就容易犯病，你在这里住院，有医生护士看着，妈妈放心。你要有自知之明，这种病终身离不开大夫。”

的确，对于曾经面对病人病情的家庭而言，他们的生活可能随着病人的病情飘摇不

定。患者家属普遍经历严重缺乏专业知识的阶段，有过与家中精神障碍患者发病时口角乃至打斗的不愉快经历，抱怨其“太危险、太折磨人”。他们还要为求医背负沉重的家庭负担。对于家人而言，将患者送入精神病院，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脱。

“家属想‘甩包袱’，把医院当成‘收容所’。”多位精神科医师对记者称，家属将病人搁置在精神病院是一个经济上的选择。

“现在条件较好的地区，精神病人绝大部分的住院费都由医保报销，个人只需承担极小部分，监护人可能每个月只出几百元，甚至完全都不用交。”

此外，不排除一些监护人不愿让这些曾经的精神病人分享父母遗留的财产，因此干脆让他们留在医院。长期住院的许多精神病人没有配偶、子女，等他们原来的监护人——父母过世后，需要由其他家庭成员作为他们的监护人，这样的病人出院机会往

往更小。

病人回归家庭，不仅意味着要花费时间、财力、精力去在生活上照顾家中的这位病人，家庭还可能要面临其他额外的压力。如果精神病患者没有得到良好的医治和康复，或者因为停药而发病，其在发病状态下的行为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后，往往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其监护人却可能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北京某社区民警宋晓栋（化名）告诉记者，他所在的社区就曾有一位病人因为监护人出远门，没有看护好，病人自己没有服药，导致病情复发，给邻居造成了财物损失，派出所调解不成，曾经的近邻最后只能对簿公堂。

但至亲的冷漠和拒绝也可能成为压垮这些患者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医学文献中的病例显示，有的精神病人因为家庭拒绝造成病情反复，最终自缢而亡。

◀ 2014年6月10日，湖南省强制医疗所内，除了吃饭、睡觉和吃药的时间，病友们会被警官组织转圈——排队围着房间走道散步，锻炼身体，因为活动空间受限，只能依靠这样来保证运动量。

稳定的风险

2015年6月8日晚至9日凌晨，在一起因精神分裂症长期患者引发的特大涉枪刑事案件中，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公安局的两名民警在处置过程中不幸牺牲，同时遇难的还有2名无辜村民，事件还造成2名民警、3名村民负伤。

一年前的5月20日晚，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依安县依龙镇初晓村一名精神病患者突然犯病殴打家人，接警后，辖区依龙镇派出所民警及辅警赶到该村处置时，精神病患者点燃警车，刀伤辅警张智超，经抢救无效身亡。

前述社区民警宋晓栋告诉《凤凰周刊》记者，他分管的社区也曾几次经历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2011年，他曾处置过一起精神分裂症病人持刀伤害案，自己的脸部险被划伤。2013年，他遇到一名50岁左右的男子发疯似的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说有人要害他。好在这些事件都被妥善处置。

这一切恰恰凸显了内地在精神病人社区康复治疗方面的缺失。而负责处理这些公共安全事件的民警们，则承受了这一缺失必然带来的风险。有评论认为，只有平等地看待精神病人，尽量满足他们作为人的社会需求，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才有利于他们病情的恢复和治疗，从而有效防止精神病人危害公共安全。

尽管曾有过险些被精神病人伤害的经历，宋晓栋也仍对这一群体表达了理解：

“他们发病的时候，可以说不懂得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感情，什么是害怕，对他们而言根本没有什么后果可顾虑。虽然他的行动是对社会造成危害，但他毕竟是个病人，患了病也很可怜。完事了，我们还是会给予救

助，包括尽快联系其亲属或监护人，或将病人送到精神专科医院收治。”

2013年，北京曾在一周之内连续发生两起精神病人伤人事件：7月17日，在北京青年路大悦城东侧，犯罪嫌疑人孝某持刀行凶，造成两名行人受伤，最终不治身亡；7月22日，北京马连道家乐福又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捅伤4名顾客，其中1人不幸死亡。

在众多要求对精神病人应该严加约束的声音中，一位网民仍平静地表示：“我们在为血案受害者感到不平的同时，不能忘了精神病人本身就是需要关怀的群体，他们更可能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而不是行凶者。只有保护好他们，不让他们生活窘迫，流离失所，我们才更安全。”

律师杨卫华在接手徐为的案子时，也曾有过担心，但不是担心徐为伤人，而是担心自己“好心办坏事”——由于整个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支持系统还不够完善，徐为反而容易出事。

被放大的暴力

上海精神病人徐为离家住院十多年以后，邻居们已经淡忘了早年前的记忆，他留下的只是隔阂和一点模糊的残影。徐为因当年与父亲的一场纠纷，被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对于徐为今天打官司渴求回家的态度，社区里的很多街坊觉得“病人不闹”就好。但他们的言辞间，还是透露出对于这种疾病的不安。有人觉得，精神病人终究是“定时炸弹”。

精神病人的暴力倾向的确很容易为外界误读。尽管有关精神病人危险性的说法很多，但并没有权威、有力的证据表明，精神病人的危险性要显著超过普通群体。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谢斌告诉《凤凰周刊》，

其它神经症性障碍；

F50 - F59伴有生理紊乱及躯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

进食障碍；
非器质性睡眠障碍；
非器质性障碍或疾病引起的性功能障碍；
产褥期伴发的精神及行为障碍，无法在它处归类；
在它处分类的障碍及疾病伴有的心理及行为因素；
非依赖性物质滥用

F59 伴有生理紊乱及躯体因素的未特定的行为综合征

F60 - F69成人人格与行为障碍

特异性人格障碍；
混合型及其它人格障碍；
持久的人格改变其它疾病所致；
习惯与冲动障碍；
性身份障碍；
性偏好障碍；
与性发育和性取向有关的心理及行为障碍；
成人人格与行为的其它障碍；
未特定的成人人格与行为障碍

F70 - F79精神发育迟滞

轻度精神发育迟滞；
中度精神发育迟滞；
重度精神发育迟滞；
极重度精神发育迟滞；
其它精神发育迟滞；
未特定的精神发育迟滞

F80 - F89心理发育障碍

特定性言语和语言发育障碍；
特定性学校技能发育障碍；
特定性运动功能发育障碍；
混合性特定发育障碍；
弥漫性发育障碍；
其它心理发育障碍；
未特定性心理发育障碍

F90 - F98通常起病于童年与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

多动性障碍；
品行障碍；
品行与情绪混合性障碍；
特发于童年的情绪障碍；
特发于童年与少年期的社会功能障碍；
抽动障碍；
通常起病于童年和少年期其他障碍



统计数据表明，只有大约5%的精神病人有暴力倾向。

对于这5%范围内的患者伤人事件，“媒体报道时若只顾大肆宣传博眼球，只会让这个群体成为危险的代名词，这种行为无疑比那5%的患者更具伤害性。”有卫生界人士如此表示。

中国长期住院的精神病人大多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2006年曾对全美精神分裂病患暴力行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表在精神病学领域的顶级杂志《JAMA Psychiatry》上，美国精神卫生国家研究所网站也刊载了这一结果：对全美1410名精神分裂病患半年的调查表明，仅3.6%的精神分裂病患存在可能威胁社会的严重暴力行为。精神病人暴力行为的多发地主要还是在家庭，而非公共场合。

中国精神疾病管理工作列有六大类重症精神疾病。2013年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国家实行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

2013年11月16日，浙江境内一家精神病院，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这里的患者们情绪稳定，聚在一处打牌如同常人，而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玩“争上游”、贴胡子，打发时光。

度。发病报告的范围为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主要涉及的疾病种类有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重症精神疾病。

之所以实行发病报告制度，中国卫计委解释说，此类精神障碍患者病情严重，尤其在急性发病期需要尽快尽早进行救治，否则有可能危害个人及他人。同时，还有助于卫生、民政、残联及社区治安管理部门加强合作，共同对患者进行救治、帮扶和管理，最大限度减少此类患者对他人及社会的危害。

目前，为了有效防止和减少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危险行为，中国政府在社区部分加强了对精神病人的管理。这主要是借助免费服药政策。譬如在北京，京籍的精神分裂症等六类重症精神疾病患者在自愿基础上，可以享受门诊免费基本药物治疗政策，但须到户籍所在地建档。

卫生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重症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已登记重症精神疾病患者超过27万例。但这只是登记建档的患者数量。按照一些研究者的推算，中国每千人中有超过10个重症精神疾病患者。

一个社区的重症精神病人有多少，这一点普通人可能难以注意到。大多数时候，他们被低调地处理了。这可以理解，精神病人的存在可能引起公众恐慌。“我们辖区病人具体的数字，我不方便告诉你。”北京田村路社区精神康复科治疗师张冲告诉《凤凰周刊》，这可能涉及公共安全的问题，他本人并不惧怕精神病人，但担心曝光这个数字可能带来麻烦。

回归实验

精神病人社区康复的中国实践

记者/曾鼎

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在1981年就提出“以社区为基地的康复（CBR）”的方针，强调社区康复对于精神病人的重要性。WHO精神卫生和物质滥用司司长Benedetto Saraceno认为：“与精神病医院相比，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不仅更便于严重精神残疾患者获得，而且在照顾他们的需要方面更为有效。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还可能减少在精神病医院经常遇到的忽视和侵犯人权的可能性。”

40多年前，美国推行了去机构化的精神病权利保护行动——精神科非住院化运动。全美精神病床总数由当时的56万张减至21世纪初的14万张，院外社区服务比例不断提升。意大利从1978年起关闭了所有精神病院，所有精神病人都在专科医生指导

下在社区治疗康复。欧盟正在欧洲各国推广这种服务模式。

精神病人可以有生存的另一面。他们可以在达到条件后出院，在社区更好地康复治疗，更快地回归社会，享受作为人的权利。被社区排斥，被社会拒绝，被隔离在群体之外，没有人际交往，也无康复可言。

发达国家的社区服务模式已经在中国试点。从2011年起，欧盟资助了中方在中国三个地区实施，北京市海淀区是其中一个地区。由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组织协调，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专家对社区精神卫生人员进行系统培训。项目希望建立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开放式居住机构、就业组织和患者家属自助组织，以社区形式实施的精神卫生服务。

精神病患者的生存和康复逐步社区

化，使精神病患者治疗由封闭转向开放，由被迫转向积极参与，这是精神病学专业的进步，也是社会文明的进步。

无奈的“院中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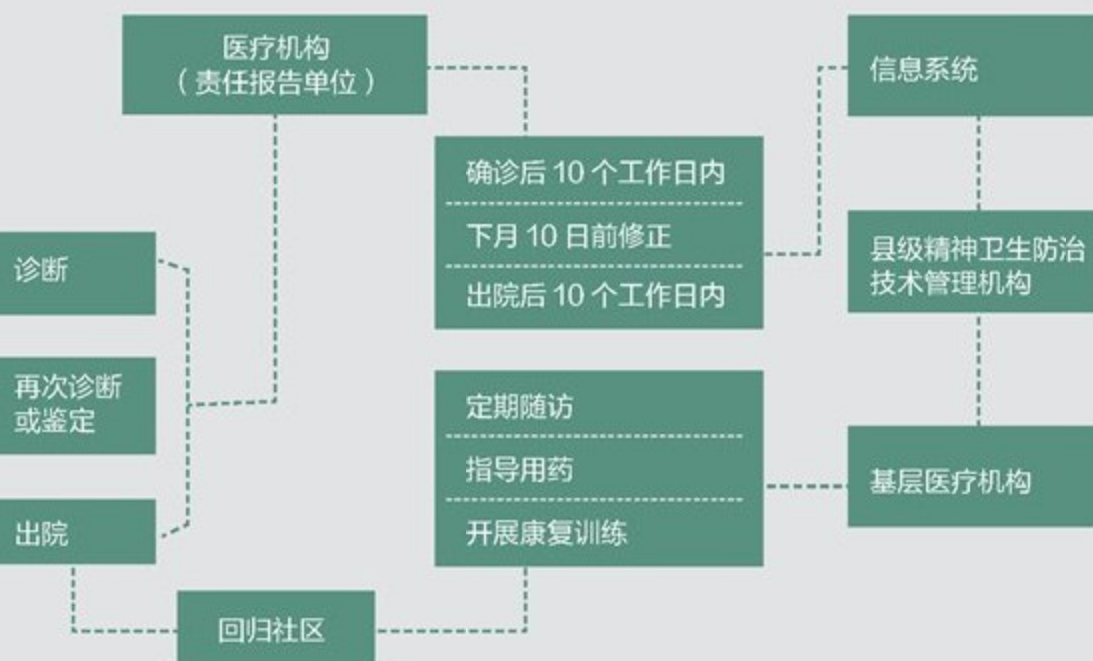
在中国的精神科医生看来，国际社会的经验表明，社区康复完全可以做得很好，但目前，中国的社区并未做好接纳精神病人回归的准备。

68岁的北京老人田小青（化名）有一个近40年精神分裂症病史的弟弟。弟弟年轻犯病时，莫名跑到边境地区。田小青回忆，当年的极左思潮让弟弟因为通敌嫌疑受尽折磨被劳教判刑，直到几年后精神司法鉴定显示他是个病人，才得以释放。这些年来，田小青一直致力于希望让弟弟过上好

大陆重性精神病报告 管理流程

严重精神病患者

精神分裂症、
分裂情感性障碍
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
双相（情感）障碍
癫痫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





2015年7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医生为听众（精神分裂症病人和家属）普及这种疾病的基本知识。

解，他们仍旧只会是避之不及的“麻烦”。

温暖的团体康复

在海淀区田村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神康复科心理治疗师张冲主要负责给辖区内的精神病人做三项工作：发放药物、随访病情、康复活动。免费发放精神科药物的活动由北京市残联创立，需要患者携带重性精神病的诊断证书建立精神科健康档案才能参与。患者在社区内享受的包括基本药物、体检、基本心理服务等都免费；目前社区中还有部分患者不愿自己的病情被他人所知，没有建立精神科健康档案，故暂时无法享受服务。

田村路社区目前管理几百名精神病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占七成以上。张冲说，田村路社区的病人随访工作已有5年。这项工作解决了精神病专科医院里医生一个常见的担忧：精神病人出院后可能因不按时服药导致病情复发。在医生随访、监督服药等社区管理下，患者病情一般能够保持稳定。社区的患者病情分成5级，不同分级的患者随访时间不同，重症患者至少每周随访一次，较轻的每月随访一次，特别稳定的患者三个月随访一次。随访形式多样，包括患者找医生，医生上门，通过居委会、监护人或电话联系。

“病人随访的工作在治疗过程中越来越重要。通过社区医生的干预，可以减少患者住院率。”张冲说。

这样的基本社区卫生服务已经在中国部分地区证明可以降低精神疾病复发，减少疾病负担，降低肇事危险。记者查阅到一些研究，譬如2010年—2012年广州市越秀区的社区干预模式以及世博会期间上海某区对一千多名病人的社区干预研究都表明：对社区病人实施规范服药和定期随访后，病人按医嘱服药率和家庭支持率显著提

点的生活。她也在退休后投入了社区精神卫生的公益工作。

田小青的弟弟目前住在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设置的家庭式病房。该院在北京多个社区内租下民宅，设置成“院中院”。这在全国已是开社区精神康复之先河。当病人由于监护人的关系无法回到家庭时，他们可以在这种特定的社区环境先行过渡。

由于年龄已大，作为弟弟监护人的田小青没有把他带回家，暂时选择了“院中院”。田小青的弟弟目前已经在家庭病房住了一年，里面共住有9名病人——都是康复较好、属于符合“出院条件”的精神病人，由两名护工照顾。

这在国外是一种成熟的精神病人回归社区模式。然而，在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的实践中还是遭遇到了来自社区的麻烦。护理人员曾向田小青抱怨说，一天夜里，社区警察接到居民报告后上门盘问，警察“像审贼一样审她”，并以警告的口吻质问她：“现在一共9个人，你对付得了么？”

病人们都不敢、也无法跟小区里的其

他居民打交道，甚至不敢去与居民分享使用小区内的公共健身器材。有一位病人在社区碰到别人，无意中说自己是精神病人，但小区居民原本不知道这间房子是租给精神病人的。他的无心之语招致小区保安的登门拜访，并警告他们“不能随便乱出来，不能出问题”，此后他们的活动便受到制约。

这样的家庭式病房与精神科医生设想的理想社区精神服务还有很大距离。病房虽然从医院搬到了居民区，但病人跟社会的距离依旧遥远。

唯一可以给病人以安慰的，倒是那位接受警察盘问的护工。她告诉记者，她儿子是河南某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我儿子跟我讲过，他们吃完药恢复好了跟正常人一样，所以我根本不怕。”她甚至向警察承诺：“这些人都挺好，他们也不犯病，他们现在都很健康，不会出问题。”

作为社区精神卫生服务走在全国前列的海淀，这就是其目前试水家庭式病房，帮助病人回归社会的冰冷现实。当一个社会对精神病人的处境缺乏平等的关注和理

高,危险性等级显著降低,精神病人肇事、肇祸起数明显下降。

《凤凰周刊》记者到访田村路社区卫生中心的当天,正值张冲组织田村路社区特有的病人团体康复活动。由于人手所限,一对一咨询工作量太大,张冲只能选择团体心理治疗的形式。

当天团体治疗活动的主题是“交朋友”。病人、家属、医生和志愿者搬着凳子坐成一圈,交流人际交往的经历。病情不同,病人们的表达能力也不一样,但他们共同倾诉:“得病后失去了原本的朋友。以往呼来唤去的朋友变得很忙,没时间来探望了。”

为时一个小时的游戏和交流活动,吸引的不止是田村路社区的精神病人和家属。一名女病人甚至冒雨从数十公里外的回龙观赶来参加活动。每周一天,大家围坐在一起分享一个主题,这样温暖的交流与相处在她看来弥足珍贵。

张冲告诉记者,当医生同患者讲幻听、妄想等症状,有时并不为患者信服,如果医生指引其他病友来分享相关话题经历,对患者来说会更可信。

袁峻芳老人是田村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志愿者。过去的一年中,她只因为生病错过了一次团体康复活动。走访过海淀区26个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中心后,她评价,“田村路社区的社区精神卫生工作做得最好。”但她也指出了缺憾,认为仍有改善空间。比如,她观察到,在每周一次的团体康复活动中,医生似乎没有照顾到每个病人的情况,“毕竟病人的活动表现、病情改善情况不一”。

巨大的现实缺口

袁峻芳的评价显然是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在社区精神卫生资源紧缺的现实下,这是一个尚无法解决的难题。张冲

说中心是因为觉得团体康复活动有实际康复价值,才坚持做下来,“比起门诊多接待几个病人,团体康复活动在工作的评估指标中没有什么分量”。在目前的状况下,他难以在这项工作上投入更多精力。

一位来自北京某社区精神康复科的医师则指出,目前他们社区康复面临的棘手问题是,社区留不住人才:“我们现在只有3个精神科的医生,但按照工作量和理想情况来看,我们至少需要8个医生。”

在中国,尽管很多地方的社区精神卫生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轨,但其重要性早已成为学界共识。国内三种《精神病学》的主流教材,都无一例外地专门开辟章节讲述“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名义上也已经指向社区卫生服务这个方向。

但目前,中国的精神卫生社区服务还局限在对病人的“管理控制”上,而非“服务”,而且各地实践情况不一。海淀区的精神卫生社区服务在中国已是前列水平,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和海淀社区的精神科医生根据他们走访的经验告诉《凤凰周刊》,即便是海淀区内部,各社区之间也有差异,精神卫生服务发展并不平衡的北京市内部各区以及中国各省市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距更为悬殊。在很多地方,精神卫生的社区康复系统甚至根本没有建立。

符合出院条件的精神病人走出精神病院,未来势必成为趋势。在精神病人徐为无法得到监护人接纳出院之时,2015年3月,上海实施新修订的《精神卫生条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告诉《凤凰周刊》,新的条例规定,非自愿住院患者只要达到出院条件,就可以自行办理出院手续。这是对《精神卫生法》中未能明确说明的细化补充。

谢斌介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也经常

遇到一部分病人,完全没有必要长期居住,医生反复通知家属来办理出院手续,但家属一直没来。按照国际上的做法,精神病急性发作,住院一到两周即可;慢性的病情,需要康复和养护机制。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医院有2300张左右床位,但有将近一半是“压床”(即长期住院)患者,导致精神科床位资源紧缺,很多有需要的精神病人无法住院。

“上海曾经有过十几例医院和病人一起起诉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责的案例,基本上都胜诉了,但监护人大多没有履行法律责任。以后操作规范的话,或许可以强制家属执行。”谢斌说,从2015年3月的新条例开始,以后他们有望不用通过法律诉讼,可以直接帮病人办理手续,然后送回家去。这意味着,徐为如果在该医院,可能将直接获得出院。

谢斌认为,上海的精神卫生地方立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但能否推广,也跟当地的经济水平、精神卫生资源、社区建设状况相关。”

如果精神卫生的社区服务不够完善,精神病人无法融入社区,一直被困在精神病院的高墙之内,可能形成恶性循环:长期住院使患者与家庭、社会疏远,患者本人对治疗及社会康复欲望的下降又加重了上述情况。随着患者年纪增大,失去劳动技能甚至生活自理能力后,更难以出院回归社会。

“解决慢性病人,必须依靠社区为主的康复设施。不解决这一问题,以后国家建设再多精神病院也没用。”谢斌仍旧主张,病人回到社区以后,要有医生的随访和管理,接受正规的药物治疗,享受健全的社区服务,家属也免除后顾之忧。

“这样就能把精神病患者的暴力攻击情况、出事的概率,降至极低的水平。”谢斌说,“当然,不会一点事情都不发生。这个不可能打包票。社会也需要认识这一点。”

香港经验

官民合力推动社会融入

记者/曾鼎

如果给香港女性Sophie贴标签的话，她很容易得到这几条：一个治疗后断药将近10年、已获康复的精神病人；一个为精神残疾患者权利奔走于香港和内地的公益人；一个关注、思考、著书论述精神医学与权利保障的观察者。

标签便于人们对于事物的理解，但也会偏狭甚至阻挡人们的视野。在中国内地，“精神病”在社会话语里往往带着强烈的歧视。人们分不清“精神病”与“神经病”的区别，把二者总结成一种疯疯癫癫的危险状态。这是一种令病人和家属备感羞耻的疾病，他们忌于向外界透露。

Sophie不讳于说出自己的真名——张馨仪。她曾经与一种常见的重症精神疾病“精神分裂症”抗争。13岁那年，未得到精神科医生的诊断时，她在英文课堂上忽然大声拍桌，起身对后面的同学说：“不要再说了！”全班同学和老师被她吓了一跳。此后，她开始接受香港社工、心理学者、老师、热线辅导员、教会干事等人士的辅导。

一度有段时期，张馨仪不懂群体生活，总觉得在人群中一开口说话，声带就被堵塞，只有独处时才能滔滔不绝。现在，她仍深切记得最初英文课上的那位老师。下课后，老师与她在休息室聊天，邀请她加入合唱团。“她试着从我的内心世界出发，了解行为背后的原因，让我没有被粗暴地推入‘不正常’的世界。”张馨仪说。

张馨仪接受了长期的药物治疗，后来在医生的认可下停药至今。她深切体会过这种精神障碍，也承受过别人异样的眼光。她也用自身的经历证明，从精神障碍当中走出

来，恢复，在社会上立足，完全是可能的。

入院出院都不难

“像徐为这样关了十多年出不了院的精神病人，不会出现在香港。”张馨仪介绍说，和内地精神病人出院受制于监护人不同，香港的监护人制度多不用于精神障碍者，多适用于智力障碍者。张馨仪接触的众多香港精神病人中，只有一个因为不能处理自己平时生活的精神病人有监护人。“他有比较严重的幻觉，不能处理自己的财产，才通过法庭判决变更监护权。”

张馨仪说，香港也有将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强行收治入院的程序，但香港精神病人出院也容易，被关进精神病院有一个期限，通常是28天。“香港的精神病人住院，整体上是‘易进易出’。”

张馨仪的这一说法在《香港精神健康条例》中可以得到印证。条例列出了各种可能的病人住院和出院情况，其细致程度远超内地的《精神卫生法》。对于自愿入院的病人、精神病院认为暂时不能离开的病人和未痊愈病人从精神病院的释放，有暴力倾向病人的有条件释放，涉及刑事法律程序的病人出院……香港《精神健康条例》都一一做了详细规定。

“精神病人除急性期住院治疗外，多数时间仍生活在社区中……香港精神科的社区康复服务形式多样、体系完善，为精神病人进入社区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减少了慢性病病人滞留医院。”早在2000年，曾在香港进修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李萍等医师就在其发表在《中华护理杂志》的文章中

这样写道。

香港医院管理局提供的推算数据显示，全港约有100万至170万人患有不同程度精神障碍，其中约有7万至20万人患有严重精神病，约有4万人经诊断患上精神分裂症。近年来，香港每年赴各精神科门诊就诊的患者多达20万人，不过，香港的精神科床位却在削减。

香港医药管理局总行政经理钟健礼2013年所做的一份报告显示：从2007年到2011年，香港全年精神科住院人数稳定在14000人左右，但精神科病床数目从4400个降至3600个，病人平均住院日数从100天降至不到70天。这些年来，香港精神科每年长期住院（超过1年）的精神病患者不到1000人，并且一直在下降。

“病人长年累月在大型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年代已成过去，以社区为本、提供个人化照顾、使患者在经历急性发病后能够复原，长期患者亦能逐渐重过普通人的生活已是趋势。”香港医药管理局称，过去数十年，全球精神健康服务经历重大变化，除少数情况外，大部分地区的医疗体系均逐步减少对精神科住院服务的依赖，转而加强社区精神科及基层医疗服务。

张馨仪告诉《凤凰周刊》，香港社会福利署在精神病人回归社区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机构为精神病康复者提供职业训练、住宿服务和社区志愿服务等多项社会康复服务，“旨在协助他们在其残疾情况下尽量发展体能、智能和社交能力，最终目的是协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在香港社会福利署的资助下，共有24间

香港精神健康条例涉及出院规定

出院类型	出院条件	其他必须条件	法条
自愿入院病人出院	16岁以下：父母或监护人书面/口头通知满7天后或7天内院长同意；或院长签署书面通知后72小时内 16岁以上：自己办理，条件同上 16岁入院至16岁后：留在院内为自愿入院病人，28天后自行出院	无	30
暂时离院	院长准许	须受院长订明条件限制	39
未痊愈病人出院	病人亲友向院长书面申请，院长获申请后48小时内决定出院	也可能决定不许出院	42
羁留病人出院	院长作出释放令	无	42A
有暴力倾向病人出院	院长作出释放令	也可能决定不许出院，且出院后须遵守若干条件	42B
涉及刑事法律程序病人出院	入院令羁留期满或监禁刑罚期满	无	49
审裁处核审出院	病人及亲属申请，审裁处核准指示释放	也可能决定不许出院	59E

名为“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的康复机构分布在香港各个居民密集的社区内，为各社区有精神困扰的市民及精神病康复者提供社区支援。与精神病医院相比，综合中心主要有两大工作：一是医护人员、社工会主动定期探访，提早发现、介入有精神障碍的个案；二是对于已经接受治疗且康复的精神病患者，回到社区后，中心会有社工跟进做个案服务，帮助康复者重新融入社区。

发达的民间支持体系

除了由政府机构——香港社会福利署

提供的社会康复服务，香港还拥有极为发达的非政府机构（NGO），为精神病人提供各类社会康复服务。这给前往香港进修、学习的内地精神科医务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香港最大的精神科康复机构——新生精神康复会有中途宿舍、长期护理院、庇护工场、新生农场、辅助就业部、新康中心等机构。它们为出院后的精神病人提供职业训练、辅助就业、消遣活动等机会，进一步促进病人的康复。”前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在其文章中写道。

数位香港精神卫生领域NGO项目的接触者都向《凤凰周刊》表示，NGO与政府机构提供的社区支持服务在总体职能上没有什么区别，但NGO在政府社区服务的框架指引下，可以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更有针对性，且补充性强，因此充分发展出多种形式的社区精神康复机构。

作为香港精神卫生领域规模最大的NGO之一，香港心理卫生会共建有7所为精神病康复者设立的中途宿舍，提供宿位共281个。此外，香港社会福利署和扶

康会、利民会等NGO都各自设立了规模不等中途宿舍。它们一般为出院后的精神病人提供免费或廉价的临时住处，期限为两年。

中途宿舍要求入住的舍友（即出院病人）自我照顾能力较强，并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工作人员根据舍友的能力，安排其白天到辅助就业部参加工作或去庇护工场工作，通过劳动让病人自食其力，增强病人回归社会的自信心。工作人员还定期组织舍友外出活动，教他们使用社会资源，如乘坐地铁、应对公共社交场合，提高病人的社交和沟通能力。

张馨仪说，如果是在香港，徐为所在精神病院的院长应主动连结社区支持系统或为精障者服务的民间自组织，协助徐为出院后适应社区生活。目前，她没有在上海看到这样的过渡系统，但中国南方的广州等地已经出现中途宿舍。

张馨仪的弟弟曾经因暴力倾向被家人强制住院，不到一个月后出院。张馨仪说，弟弟出院之前，医生与家人一起商量出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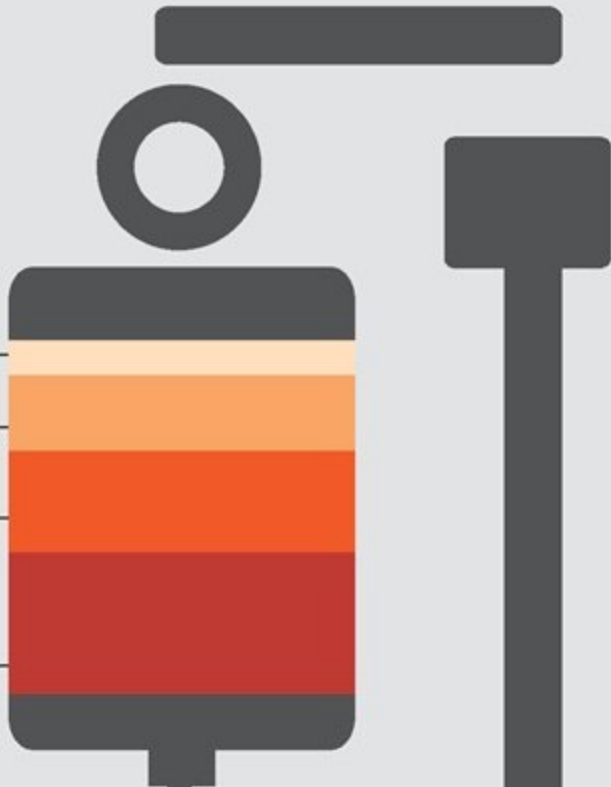
“病人长年累月在大型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时代已成过去，以社区为本、提供个人化照顾、使患者在经历急性发病后能够复原，长期患者亦能逐渐重过普通人的生活已是趋势。”

香港精神病服务模式

——精神健康服务

香港医药管理局称，过去数十年，全球精神健康服务经历重大变化，除少数情况外，大部分地区的医疗体系均逐步减少对精神科住院服务的依赖，转而加强社区精神科及基层医疗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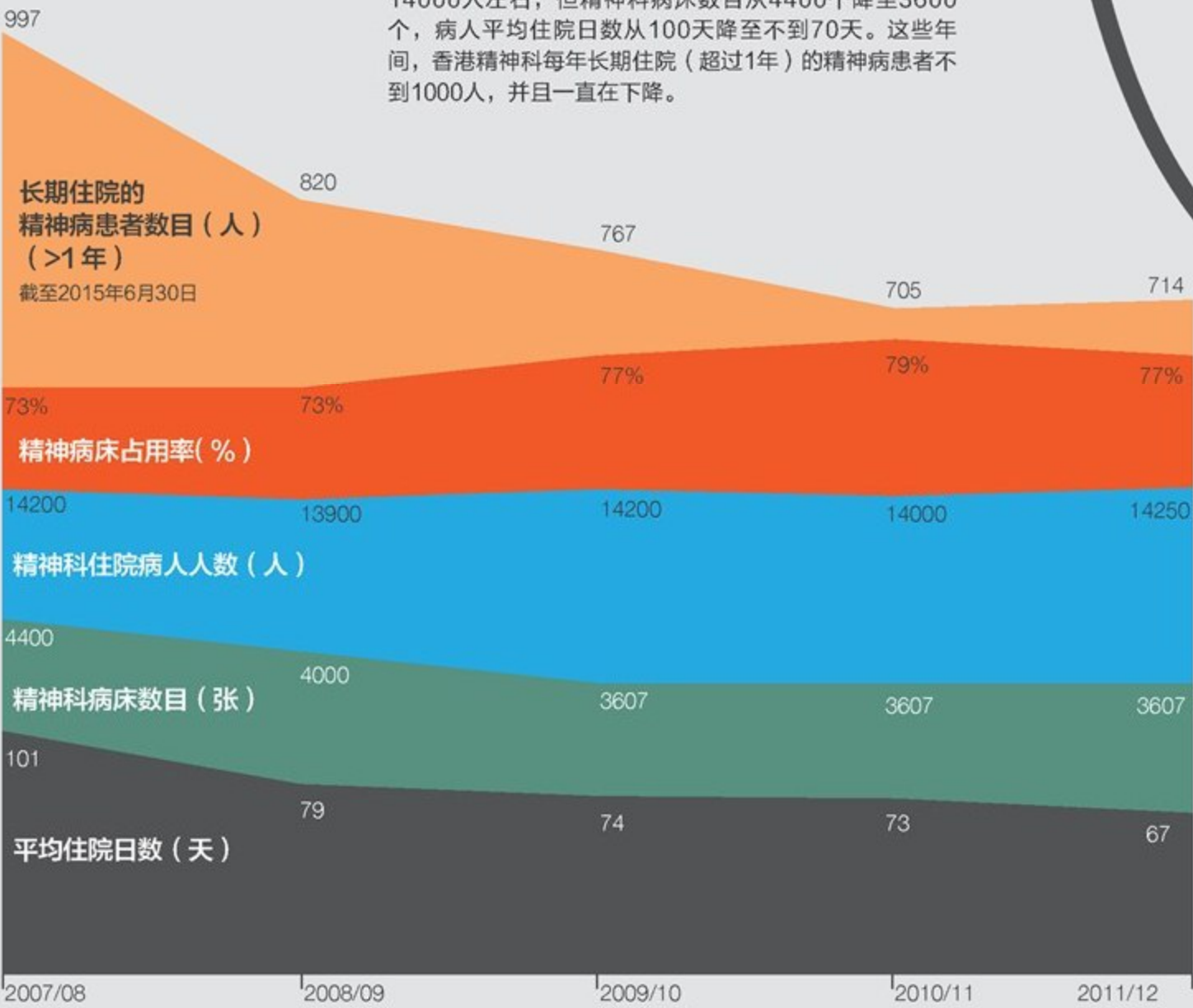
- 专科医疗护理
- 基层医疗护理
- 社会福利服务
如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 (ICCMWs)
- 精神健康推广 / 社区服务及支援



香港精神健康服务数据

——住院服务

从2007年到2011年，香港全年精神科住院人数稳定在14000人左右，但精神科病床数目从4400个降至3600个，病人平均住院日数从100天降至不到70天。这些年间，香港精神科每年长期住院（超过1年）的精神病患者不到1000人，并且一直在下降。



后的对策。由于弟弟并不想住在外面的中途宿舍,所以直接回到家里。按照香港的制度会有社区探访,也可以保证他在家中得到治疗。

家庭病床是香港医院护理向社区的延伸,由与精神科社区康复护士(简称社康护士)负责病人在家的康复治疗。如香港东区尤德夫人那打素医院的每个社康护士负责约60个家庭病床的病人,每月家访1次,观察病情、指导服药和康复锻炼。病人在家有意情况也可以随时打电话与社康护士联系,寻求帮助。

香港还有很多这类为精神病人提供服务的专业设施。譬如,庇护工场能为康复期的精神病人提供既受照顾又具康复作用的工作环境。香港共有50家庇护工场,分工业性质和农业两种性质,根据病人的能力为其安排不同的工作,比如做包装、木工、缝衣、零售或农场种植。庇护工场有导师指导,要求病人按时上班,并计件算工资,多劳多得。

社区里的辅助就业部则要求病人的病情稳定,工作能力较强并适合外出工作,他们主要来源于医院、中途宿舍、家庭,由社工和社康护士根据病人的能力转介到此。前述医生介绍,以新生精神康复会屯门辅助就业部为例,145位病人分为擦车组、除草组、环保清洁组等外出工作小组,另外还有病人经营的菜档、水果档、便利店和餐厅。工作组同样有导师指导,一般一位导师负责20位病人。每位病人每月约有3000港币收入,足以支付日常开销。

香港精神科完整的社区康复体系,相关机构和服务的种类及功能齐全,让不同能力的精神病病人在社区中得到康复训练,防止疾病的复发,重新融入社会。若病人的自我照顾能力较差,他还可能转入长期

香港精神科完整的社区康复体系,相关机构和服务的种类和功能齐全,让不同能力的精神病病人在社区中得到康复训练,防止疾病复发,重新融入社会。

护理院,着重于病人自理能力的训练。

香港社工也是联系病人与社区的桥梁。他们与医护人员合作,为病人回归社区提供全面的服务。他们在病人出院前为其联系中途宿舍、申请政府公屋、安排就业或为病人联系日间训练中心等;为病人和家属提供适当的支持帮助,如定期举办讲座、咨询,让家属了解精神病人;成立家属联谊中心,帮助家属接纳和护理病人。

政府购买、民间运作

2015年2月初,张馨仪曾参与北京大学医学院举办的一次会议。主办方邀请了深圳衡平机构,张馨仪作为CNUSP(中国精神医学幸存者及使用者网络)成员,与衡平机构的创始人、公益律师黄雪涛等人一同参加了会议。

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深刻意识到,内地与香港对社区服务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内地社区服务的提供者主要是街道办,这与香港以NGO作为主要服务提供者的社区服务完全不同。“《精神卫生法》中提及的全是行政职能机构或半官方机构,多以慈善或福利形态推行服务。”

不过,民间化的尝试已经开始。“过往精神病患者的照顾只能依靠家庭、医院的模式已经得到改变,这在内地来讲是很大的突破。”衡平机构的调研显示,华南地区,如深圳、广州、东莞三地自2011年推行

政府购买、民间运作的社区服务中心。长沙、昆明等地也建立会所,类近香港的精神残障者自助组织,自主意识开始萌芽。

但张馨仪认为,进步仍存在明显局限。内地的社会工作还不发达,涉及精神病人的社会工作服务在内地还是存在维稳思维。“政府是购买方,有绝对的发言权”。

香港的法治环境也为患者争取权利提供了保障。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披露的一份报告显示,2011年港府在全港推广综合“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时,近七成受访者同意在所住地区内设立,理由是“有助于他们融入社区”;明确表示不同意的受访者仅有一成半。当年,香港屯门区有议员曾带头反对在社区设立中心,精神病康复者董礼霖就以其违反《残疾歧视条例》将该议员告上法庭并最终胜诉。张馨仪认为,内地精神病人的权利意识也有待开拓。

黄雪涛告诉张馨仪,其实内地《精神卫生法》出台后提高了非自愿收治门槛,已经是精神病治疗去机构化的第一步。但目前,内地的精神病治疗的社区之路还很漫长。

“社区,一是地理方位上的区域,不是远离日常生活区域的偏远大型集中机构;二是民间意义上的人群,是公民社会的发育,比如同辈互助、顾问服务、家属支持、社工服务、慈善公益等等,不是公权力主导下的专业管理机构。”黄雪涛解释说,“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尚未成形。”

据内地媒体最新报道,国家卫计委联合多部门近日在39个城市启动新一轮试点,平均每个省份都有至少一个试点城市。试点方案要求,每个试点地区至少要扶持1个社会组织,并吸引专业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参与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服务。

中共布局“大统战”

统战部“双副国级”配备，统战工作会议由“全国”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条例颁布，一系列动作释放出中共要进一步加强统战工作的信号。

记者/张弛

中共最高层今年多番为统战工作“升格”，最新动作是9月22日向社会公布了史上首部统战工作法规。这部名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党内法规共10章46条，于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结束4个月后正式公诸于众。

去年年底，中央政治局委员孙春兰出掌统战部，一下子提高了统战部掌门人的层级；紧接着，今年4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兼任统战部副部长，形成了罕见的“双副国级”配备；今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时隔9年后再度召开统战工作会议，其名称由“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变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65年来首次“升格”。明确释放出统战工作要进一步加强信号。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

有长期关注大陆政情的观察人士分析，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根据他的观察，十八大以来，中共党委有两个系统比以前益发重要，一个是纪委，一个是统战。“如果说纪委是要剔除政党内部的毒瘤，那统战要做的就是将更多人士团结在党的周围”。

重点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随着社会转型，社会阶层和群体越来越多样化，新型经济和社会组织日益增多，且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涉及统战工作的内容大为增加。此次颁布的《工作条例》，明确了统战工作对象为党外人士，重点是其中的代表人士，并正式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作对象。



根据官方解读，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狭义指自由择业的知识分子。这个解释，源自8月4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微信公号“统战新语”发出的一篇解读文章。

据介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四大群体：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指受聘于私企和外企，掌握企业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知识者）、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提供知识性产品服务的社会专业人士，以及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业者）、自由职业人员（指不供职于任何经济组织、事业单位或政府部门，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与专长，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并获取报酬者）、新媒体从业人员（指以新媒体为平台或对象，从事或代表特定机构从事投融资、技术研发、内容生产发布以及经营管理活动者）。



今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由中共总书记亲自布置工作，除了要求统战部门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还提出重点团结“洋”“网”“创”三类人士。其中，“洋”指留学人员，“网”指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创”指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年轻一代。

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善于联谊交友。“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

“统战新语”指，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知识层次高、流动性强、思维活跃、影响面广”，其中党外人士占多数，在维护网络安全、影响社会舆论方面有重要作用，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过，“网络异见人士

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统战工作对象”。

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主要包括四种人:新媒体企业出资人(包括技术入股)、经营管理人员、采编人员、技术人员。至于开展新媒体领域统战工作的目的,“统战新语”称,一方面是“引导和帮助”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健康成长,另一方面是“支持和推动”新媒体行业健康发展。

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中央统战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今年3月24日到4月3日,中央统战部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第12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修班”,重点培训新媒体和互联网领域人员。

消息指,参加上述研究班的55名学员中,近三分之一来自互联网和新媒体行业,包括小米科技副总裁陈彤、“今日头条”CEO张一鸣、百度副总裁朱光、爱奇艺CEO龚宇、优酷土豆集团副总裁陈丹青、天涯社区副总裁马娜等。

这是中央统战部第一次将新媒体从业人员,成规模地纳入培养体系。《工作条例》亦明确,“加强对党外代表人士的管理,重点了解掌握其政治表现、思想状况、履行职责、廉洁自律情况,特别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态度”。

而共青团中央2月下发的一份文件,一度引起媒体广泛关注。该文件要求全国各地团组织在6月底之前,招募1050万名“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积极参加团中央的“阳光跟帖”行动,在网上主动抵制“负能量”。3月2日,中央网信办和团中央联合召开专题电视电话会议,推进实施“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行动”。

统战系统官员“升格”

新公布的《工作条例》,对担任地方党委统战部部长的人选作出了明确规定。“省级党委统战部部长一般由同级党委常委担

任,市、县两级党委统战部部长由同级党委常委担任或者兼任。民族、宗教工作部门主要负责人具备条件的,可以担任同级党委统战部副部长。”

这样的布局,将直接影响省级党委常委班子的人事和组织架构。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认为,党委常委的权限和政治权威,可赋予统战部长更大的协调各方的力量。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将为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提供巨大组织保障。

因为继中共地方党委领导班子配备改革后,书记办公会被取消,各常委分工负责并直接面对书记,常委会日益成为一级党委的权力核心。在更加强调集体领导、常委负责背景下,由党委常委担任统战部长,可有效理顺内部关系,构建完善“大统战”格局。

微信公号“长安街知事”分析称,变化主要呈现为两种模式。一是现任统战部长进入常委班子。在目前各省常委班子基本配齐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带来较大连锁反应。二是现任常委兼任统战部长。这种模式较为常见,目前大多省区的统战部长都是先成为常委,之后才被任命的。

截至目前,31个省区市中,已经有24个省的统战部长由省党委常委担任,余下的7个省区是海南、辽宁、吉林、江苏、浙江、广西和新疆。除海南统战部部长为专职、不兼任其他职务外,其余6省区均由省政协副主席兼任。根据《工作条例》新规,接下来上述7个省区的统战部长料将发生职务变动。

但统战部长“入常”并非自《工作条例》始。上世纪90年代,中共开始酝酿由党委常委担任统战部长。在2000年12月召开的第19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省及省以下党委统战部长要由党委常委担任”首次写入中央文件。2006年7月,中共下发文件再次重申了这一要求。在这两个文件的推动

下,常委担任统战部部长的省区市从2000年的1个一度上升至2006年的15个。

更高层面的人事配置“升格”则早已完成。先是2014年12月31日,孙春兰补缺落马的令计划出掌统战部。今年4月,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出任副部长。至此,中央统战部形成罕见的“双副国级”领导格局。

孙春兰曾任天津市委书记,且是掌握大权的政治局仅有的两名女性委员之一。这是继1977年乌兰夫之后,第二位出任统战部部长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逾30年间,此职位一直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担任,一般是退休高官。

本港媒体《南华早报》评论称,是次委任表达的信号很清晰:习近平将统战部工作视为首要任务之一,这不但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力,也是维持中共有效管治的手段。更直接地说,统战部再非只说不干,限于举办座谈会、邀请政界和社会名流出席晚宴,而会担当更积极的角色。

而在市县两级,因为基层党委常委的职数限制,选派有其他分工的党委常委兼任统战部长,成为比较实际的选择。在河南、安徽等地,均采用这种思路实现基层统战部长“入常”。

一种模式是组织部长兼任统战部长。比如湖南14个地州,除了省会长沙和张家界,其余地级市均实现了组织部长和统战部长“一肩挑”。

还有一种模式是统战部长与政府副职交叉任职。以河南省为例,18个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均在政府担任副市长、党组副书记或党组成员,直接分管非公有制经济、招商引资、工商行政管理、民族宗教、港澳台侨等方面工作。而福州、马鞍山的统战部长,均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兼任。

第三种模式是专职副书记兼任统战部长。这在县一级比较多见,地市较少。

上述三种模式,也可视为常委兼任统战部长的具体实现方式。西部一位统战干部称,对于基层来说,统战工作是否被看重、有效推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强

党委常委的权限和政治权威,可赋予统战部长更大的协调各方的力量。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将为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提供巨大组织保障。

势的部长。而由党委常委兼任统战部长，就赋予统战工作一种职务强势。

而统战部门升格，不仅体现在常委任统战部长，还包括在用人方面掌握更大的主动权。《工作条例》就明确，“组织部门、统战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协作配合机制。在动议和讨论决定党外干部的任免、调动、交流前，应当征求统战部门的意见”。

除了人事调动，地方党委的组织架构也因统战工作的走向发生变化。9月23日，中央统战部网刊发了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的高端访谈。他透露，四川省委将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而西藏、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份此前也陆续提出将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

《工作条例》明确，一些不要求设置统战部的单位，也应重视统战工作。“统战工作任务重的乡(镇、街道)党组织应当明确专人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任务重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党委，应当设置统一战线工作机构；统一战线工作任务重的大型国有企业党委应当明确机构和人员负责统一战线工作”。

党外干部队伍扩容

党外人士从政，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中共建政伊始，政府部门里党外人士曾一度占

例》规定，“符合条件的党外干部可以担任政府部门(单位)行政正职”。至于数量，还有刚性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政府组成部门中应当配备2名左右党外正职”。

在配备的岗位上，要求相当宽松。“各级政府部门除有特殊要求外，均可以积极配备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具体方向也予以明确，“重点在行政执法监督、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紧密联系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性强的部门配备。”

在原本党外人士就比较集中的人大和政协，《工作条例》明确，党外代表人士在各级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委员中应当占有适当比例。而对于政协的任职安排，还有量化要求：党外代表人士在各级政协中应当占有较大比例，在换届时委员不少于60%，常委不少于65%。

对于领导班子的任职要求也很明确。比如人大，“全国和省级人大常委会中应当有民主党派成员或者无党派人士担任专职副秘书长”。比如政协，“各级政协领导班子中副主席不少于50%(不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全国政协和省级政协应当有民主党派成员或者无党派人士担任专职副秘书长”。

以前中共党内才有的后备干部，现在党外人士也有了，“按照多于可配备职数的要求，建立统一的党外后备干部名单”。

据半壁江山，许多党外人士还担任着部门正职。但现在即便中央部门，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也寥寥可数，近年来较为公众熟悉的，可能只有科技部部长万钢和原卫生部部长陈竺。

此次颁布的《工作条例》，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培养、使用和管理做了明确规定。除了党政部门和人大政协，其他单位也基本都要求配备党外干部。

以往党外人士多担任政府部门行政副职的情况，有望彻底改观。此次《工作条

待遇问题也考虑到了，“除特殊情况外，人大常委会、政协领导班子中的党外代表人士应当与担任同级职务的党内干部享受同等待遇”。

除了党政机关、人大和政协，其他单位也基本都要求配备党外干部，只是措辞有所不同。比如法院、检察院，“应当配备”；高校领导班子，“一般应当配备”，而且“符合条件的党外干部可以担任行政正职”；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加大在领

导班子中选配党外干部的力度”；参事室、文史研究馆，领导班子中应当配备党外代表人士；馆员应当以党外代表人士为主体，参事室中共党员参事不超过30%。社会团体，要“举荐党外代表人士”任职。

以前中共党内才有的后备干部，现在党外人士也有了，“按照多于可配备职数的要求，建立统一的党外后备干部名单”。《工作条例》明确提出，各级党委应当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纳入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总体规划。

为保证党外干部能实实在在掌权干事，《工作条例》规定了“合作共事”原则，即“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保证党外干部对分管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人事任免的建议权”。

民族、宗教工作也是重要内容，因此要“大力培养民族地区各族干部，大力选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除了传统思路，还有新精神，即“重视培养民族地区知识分子特别是少数民族党外知识分子骨干，积极培养少数民族专业人才”。

宗教界人士和信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发挥，不仅要“支持和引导宗教界人士对宗教教义作出适应时代进步要求的阐释”，还要“加强爱国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巩固和发展党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

基层宗教工作也需要加强。“建立健全县(市、区、旗)、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宗教工作网络和乡(镇、街道)、村(社区)两级责任制。宗教工作任务重的乡(镇、街道)，党委和政府应当有领导干部分管宗教工作，并明确专人负责”。不过，“共产党员应当团结信教群众，但不得信仰宗教”。

一个变化是，较之之前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认同”，此次又增加了一项“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更多资讯 更多阅读方式 尽在

鳳凰週刊 | **新媒体**
New Media

微信

微信客户端扫描以下二维码
或搜索香港凤凰周刊
添加我们的公共账号吧
每天为您播报更多资讯



新浪微博

用新浪客户端
扫描以下二维码
赶紧 @ 凤凰周刊
随时获取更多即时资讯



亚马逊电子书

扫描以下二维码
即可购买凤凰周刊
亚马逊 Kindle 电子书
获取更多资讯



官方网站

登录以下网址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您可以无障碍在线浏览精华内容
或在线订阅《凤凰周刊》
www.ifengweekly.com



足球改革： 大陆体育改革新样本

记者/马军

这是中国足球改革启动后，中国男足战绩第一次遇挫。

10月9日，中国男足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0:1不敌卡塔尔队，在赛程过半的情况下落后对手5个积分，直接丧失了小组出线的主动权。在2002年之后的三次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队皆兵败垂成，甚至没有一次打进过最后阶段的亚洲区十强赛。

两天之后，再次被国足糟糕战绩推至风口浪尖的中国足协发布世预赛半程总结，感谢球迷，呼吁力挺主教练佩兰。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总结完全由中国足协做出，历来与中国足协同时出现的中国体育总局足管中心已经不见踪影。今年8月，中国足协正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此次世界杯预选赛也是中国足协第一次以“纯粹”的社会组织身份参与管理的赛事，虽然国足成绩仍不见

楼——此次会议正式宣布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虽然目前相关改革的细节仍在进行中，但足球在中国大陆或就此正式与国际接轨，走入纯粹的市场化逻辑，困扰中国足球发展二十几年的行政桎梏开始破裂。

以中央政府最高层自上而下地打破原有行政束缚，是本届政府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条战线上改革的显著特点。此次足球改革中，中国政府高层以深改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名义推动足球改革，让停滞多年的改革重新上路，不仅让中国足球的未来更为可期，也在体坛反腐的大背景之下，为其他运动项目的后续改革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早在2009年，中国政府就专门成立了足球改革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亲自负责，展开了长时间的大规模调研，为深化足球改革做准备。

中国政府高层以深改组的名义推动足球改革，不仅让中国足球的未来更为可期，也在体坛反腐的大背景之下，为其他运动项目的后续改革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起色，但中国足球的“去行政化”“市场化”改革之路仍受普遍期待。

最高层强力推动

中国足球本次改革始于2015年8月17日中午12点45分，中国足协所有的工作人员走进国家体育总局办公楼参加会议，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以体育总局员工的身份走入这栋

但中国足球真正全面意义上的复苏，应是2013年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之后。《凤凰周刊》记者从大陆多位足坛元老处获悉，习近平在各种场合遇到足球界人士，都会提出改革的期望与勉励。此后，沉寂十年的中国足球也逐渐让世人看到希望——国足在东亚杯、亚洲杯上接连表现优异，恒大队等俱乐部在亚洲赛事上成绩显著，观众也逐渐被高水平

比赛吸引回看台。改革足球、发展足球渐渐成为全民的共识。

2013年两会期间，适逢中国国家队亚洲杯外围赛，在中国绝杀伊拉克队后第二天的政协分组会议上，身为政协委员的广州恒大、山东鲁能、北京国安和贵州人和四支中超强队的老板均请假未出现。《凤凰周刊》记者现场获悉，这四人很有可能是去参加一个有关足球的临时会议。

在全面调研两年之后，足球改革开始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201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这是羊年习近平出席并主持的第一个会议。会议强调，必须克服阻碍足球发展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为足球发展振兴提供更好的体制保障。

方案提出了四点改革措施：尊重足球规律；抓好群众基础；贯通足球发展机制；进行体制探索。自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这些内容曾被媒体及足球从业人员反复提及，这是第一次经最高层批示。有大陆媒体评论称，习近平亲自参加此次会议，为中国足球改革注入了“最强执行力”。

以“去行政化”为主要目标的改革也让市场对足球信心大振，9月25日，中超联赛电视转播版权以5年80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花落体奥动力（北京）体育传播有限公司。巨额的版权费用为未来中超各支球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消息一出，已有不少球队表示将用版权分红来支持球队青训的发展。

早在今年年初，有日媒援引英国的调查结果称，“中国民间隐藏着7000个梅



↑ 2015年8月17日，北京，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蔡振华、张剑出席发布会。

西”，此次以扩大足球人口为抓手的改革很可能激发出中国的人才潜能，巨额资金的涌入更是为此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与此同时，巨额版权费用也为其他领域的体育改革提供了强大激励。中国篮协竞赛部部长张雄表示，“CBA未来的版权模式也会改变，收入也会比原来高”。在打破了行政桎梏，确立了市场为决定性力量之后，中国体育的改革或就此借由足球改革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

以行政力，去行政化

2015年8月17日，《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备受瞩目的是，方案提出中国足协正式与体育总局脱钩，作为原中国足球最高行政单位的足球管理中心就此走入历史。广州作为目前中国五个足球试点城市之一，于9月1日率先出台了第一个地方足球协会改革方案。

中国足协的改革也正在积极推动中。此次改革后的中国足协，即与行政管理脱钩，成为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又是根据法律授权的政府委托管理全国足球事务、具有公共职能的自律机构，承担了体育部门领域的管理责任。

换句话说，在足管中心与足协长期“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的情况下，足协与足管

中心的脱钩，让其未来运转的逻辑，更多的向市场逻辑靠拢，而非原先的行政逻辑。足协的改革可称是体育系统的“简政放权”。也为未来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已经进行市场化改革的运动项目提供了改革样本。

改革后的中国足协，面临去行政化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事问题。此次改革后，国家体育总局将撤销足球管理中心，并按规定撤销相关事业编制。足球中心原4人的领导班子作为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进入到中国足协工作，免去事业单位职务和级别，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在《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公布后，现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表示，未来仍会坚持竞选中国足协主席。但是按照改革计划，蔡振华若当选下一届新足协的主席，或将就此放弃目前副部级的干部身份。而原足管中心的主任张剑及另外三位副主任，已经不再具有行政级别，而是转到了中国足球秘书处工作，原中国足协秘书处的官员，行政级别也全部冻结封存。

行政级别的冻结有助于打通阻碍中国足球发展的行政性桎梏。2004年中超联赛第14轮，在主裁判周伟新屡次误判之后，北

京国安队宣布罢赛，此后大连实德、深圳健力宝等七支球队结成联盟，向中国足协“逼宫”，提出“行政退出、资本决定、政企分开、管办分离和公司化经营”的要求。在与足协的谈判中，北京国安队老总、拥有中信集团副部级干部身份的罗宁曾坐在足协主席的座位上怒斥足协领导：“我比你还要大半级，你不要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

在这场十年前被称为“G7”的足球革命当中，俱乐部方就提出了建立资本主导的公司化中超运营方案，行政自我监督、自我主导、自负盈亏和自主经营的职业体系。这种以“去行政化”为代表的改革方向既与国际足球强国主流联赛接轨，也与目前提出的足球整体改革方案不谋而合。

事后据当事人回忆，这场十年前以“去行政化”为目的革命最终被“和谐”的原因还是行政力量。2014年10月，北京市政府、国家体育总局、辽宁体育局、深圳体育局等相关机构先后约谈了北京国安、大连实德、辽足和深圳健力宝等俱乐部，“革命”联盟被逐渐瓦解。事实证明，单纯以市场主体或底层俱乐部的“反抗”，抵不过行政监管的垄断。换句话说，在现行的行政体系内，若无高层定调并强力贯彻，做出以行政力“去行政化”的最终举措，行政化体制仍不知道要多久才被甩掉。

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与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座谈时，特别提到三大球运动，并对在场的新任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说：“你现在挂帅足协，我们拭目以待。”而在一个月前刚刚当选足协主席的蔡振华，也体会到了足球改革的艰难，称中国足球的发展需要决心、信心、恒心。自己在这时主管足球，“可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语中还有些犹豫和疑虑。但短短一年半后，蔡振华对媒体表示，即使有可能失去副部级头衔，也要坚持参选足协主席，“对中国足球充满信心。”

浪潮已起，风还会继续吹。



“草台班子”何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四方机制”之所以大功告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复兴党这个突尼斯原教旨政党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类似政党（如埃及穆兄会）那样极端、恋栈和不调和。

特约撰稿 / 陶短房

“冷门未免太冷了点，”最新的诺贝尔和平奖出炉后，一位法国读者在《解放报》网站如此评价。或许有人会事先想到，公认的大热门——德国总理默克尔很可能与大奖擦肩而过，甚至会猜测得奖的或是如昔日意外获奖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联合国蓝盔兵那样的组织，但绝不会有人想到，这个爆冷者会是此前外界从未听说过的名字：“突尼斯国家对话四方机制”（下称“四方机制”）。

“四方机制”作为一个组织或集体在获奖前鲜为人知是毫不足奇的，这不仅仅因为突尼斯是个北非小国，更因为这个组织非但冷门到家，而且严格说很难被称之为一个组织，或者实体——它只是个由四家机构临时拼凑起的应急对话平台。

这四个机构的背景和基本盘存在不小的差异，由它们四家组成的“机制”也很难被认为是有效且持久的。然而，正是这个看上去十分脆弱的“草台班子”，却成功地在“后

茉莉花时代”的突尼斯维持了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完成了一次近乎“标准化”的民主政党轮替，绘制并推动着一张“和平解决政治分歧路线图”的出台和一步步落实——当然，还有为自己赢得了一次诺贝尔和平奖。

“草台班子”的杰作

尽管已是明日黄花，“阿拉伯之春”仍令许多人记忆犹新。这场席卷中东、北非，影响力一度波及大半个

地球的政治风暴，第一个“沸点”正是北非国家突尼斯。

2010年12月27日，突尼斯西迪布宰德市小贩巴济济遭警察虐待后自杀不治，引发了所谓“茉莉花革命”；2011年1月14日，执政达23年之久的本·阿里下台逃亡，成为“阿拉伯之春”中首个被推翻的中东政权。此后埃及导致穆巴拉克下台的“尼罗河革命”，也门导致萨利赫辞职的政治冲突，利比亚导致卡扎菲惨死的内战，以及叙利亚连绵至今的流血，都被公认可追溯到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渐渐发现，在令人激动的“民主自由”口号背后，“阿拉伯之春”的瑟瑟秋风却越刮越猛：所有被推翻或“革命”不已的，都是在上世纪60-80年代推翻君主制上台执政的世俗集权共和国，而倡导、赞助“民主自由革命”，或在本国“革命”中安然无恙的，却是同样缺乏民主、人权却在政治、宗教领域更保守的世袭君主政权。

不仅如此，“革命”导致了社会动荡、原教旨和极端暴恐势力猖獗，妇女、世俗派和“异己”宗教、教派信徒受迫害，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如今或动荡不安，或暴力不止，或内战不息，或陷入无政府状态，有些甚至成为输出难民和暴恐分子的渊藪。

与之相比，最早的“沸点”突尼斯似乎被人们所遗忘了：尽管没什么特别好的消息传出，但至少也没那么多特别坏的，大家或许早就无暇顾及它了。

但事实上突尼斯并非那么太平：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举行了“后本·阿里时代”首次“一人一票”的普选，原教旨的突尼斯复兴党击败老资格的世俗政党——突尼斯民

主进步党（PDP），获得40%以上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并获得组阁权，该党虽然标榜“温和”，但上台后同样试图推行伊斯兰教法治国，并引发世俗反对派的不满和反弹。

自2013年起，突尼斯政治和社会开始充满着不安和暴力。是年7月25日，来自“革命圣地”西迪布宰德的世俗派议员穆罕默德·罗米被暗杀，5个月后另一位世俗派议员贝拉伊德也惨遭不测。尽管复兴党实际领袖拉希德·格鲁希多次强调“与政治暴力无关”并谴责暴力，但反对派中的激进主义者纷纷主张“以暴易暴”，更严重的政治冲突似乎一触即发。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突尼斯将步利比亚、埃及、也门等后尘，成为又一个在“后革命时代”陷入乱局的失败典型。

“四方机制”在这种令人不安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它们和世俗派、原教旨派等前本·阿里时代的反对派有较多交集和良好关系，自身虽有不同倾向却并非政党，没有权力野心，因此被认为可以充当对立派系、利益集团间的斡旋、调停者。

2013年10月，“四方机制”宣告落地，并很快拿出一份“路线图”：第一步，以中立的、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过渡政府取代复兴党政府，以便久拖不决的修宪得以顺利“提速”；第二步，在2014年上半年完成修宪，以便新的大选在新宪法基础上进行；第三步，在新宪法和中立过渡政府的“双保险”下举行新的立法大选，从而完成突尼斯的“第一个民主循环”。

这张“路线图”最初被认为是空中楼阁，注定会半途而废，但奇迹发生了：在格鲁希、PDP领导人沙比等的配合下，突尼斯过渡政府在“四方机制”落地两个月后成立，中立专家约

马阿取代了复兴党总理拉拉耶赫。

2014年初，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中，“难产”数年的突尼斯新宪法顺利通过。10月26日，新一届立法选举顺利进行，世俗的突尼斯呼声党上台执政，复兴党和平交权，完成了“后阿拉伯之春”迄今唯一一例“由原教旨回归世俗”的和平政权交替。

地中海和平的需要

如果说几年前国际社会对“阿拉伯之春”普遍抱有“玫瑰色幻想”的话，随着“伊斯兰国”（IS）的崛起、原教旨主义的泛滥，以及“革命”各国普遍出现的政治暴力充斥、极端保守主义和宗教势力盛行、人权和民主原则被普遍践踏的现象，这个名词的“正能量”即便不能说消失殆尽，也已光彩不复。

曾被奥巴马和希拉里鼓励的埃及不仅出现了流血、暴力、宗教和政治迫害，还相继出现靠选举上台的原教旨党派打击异己，和本已交权的军方武装重新夺权的场景；曾被欢呼为“伟大胜利”的利比亚至今军阀割据、四分五裂，不但多次出现“一国二公”的尴尬，更赔上美国大使史蒂文斯的一条性命；同样当过“标杆”的也门也成为内战和“海合会”军事干预的战场，国内冒出了两个“合法政府”；叙利亚则更不用说了，美俄等国竞相飞掠轰炸的战机、肆无忌惮的IS和席卷欧洲的难民潮，足以让一切美好的幻想变成噩梦。

与之相比，虽经历风雨、总算勉强看得见彩虹的突尼斯“茉莉花”几乎是“阿拉伯之春”唯一可以大声褒扬的“模范”：虽有政治冲突但可以用选票解决，虽有原教旨运动但整个社会依然维持世俗主色调，虽然有诸多不情愿、不正常，但原教旨党派会败选、败选了会下台。人们太需要

当地时间2015年10月9日，挪威奥斯陆，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突尼斯全国对话机构获2015年诺贝尔和平奖。诺奖称，中东北非动荡后，突尼斯四个关键组织在2013年组建该机构，实现了和平的政治过渡，较短时间内建立宪法体系，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

突尼斯国家对话四方机制成员



Wided Bouchamaoui

突尼斯工贸与手工业雇主联合会(UTICA)主席

● 该组织是由贸易和手工艺行业的小作坊主、小业主组成的行会；

Houcine Abbassi

突尼斯总工会(UGTT)秘书长

● 该组织为历史悠久的世俗工团组织，在本·阿里执政后期因纺织等出口加工业的兴盛而声势鹊起。和许多国家的工团组织一样，其带有左翼民主社会主义色彩；

Abdessattar ben Mouss

突尼斯人权联盟(LTDH)主席

● 该组织为人脉和构成复杂的资深民间团体；

Mohamed Fadhel Mahmoud

突尼斯全国律师协会主席

● 该组织不论在本·阿里时代或“后本·阿里时代”，都是令当局感到头疼的团体。

这样一份“正能量”了，否则无法对昔日付出如此之多、寄托如此之大，如今影响又如此之出人意料和代价沉重的“阿拉伯之春”，作出一个让自己和世人都可以接受的交代。

与之相比，“大热门”默克尔之所以成为热门，是因为对“地中海难民”的慷慨，但这个慷慨在德国内外争议越来越大，诺贝尔奖评选者们难免担心重演昔日“预授奖”给奥巴马引发的争议和嘲讽，因此宁愿选择“四方机制”这个“不像组织和实体”的组织和实体。此外，难民潮是果、是下游，而“阿拉伯之春”是因、是上游，如果说默克尔在这个问题上是用息壤不断“堵漏”的鲛，那么“四方机制”更像正本清源，从源头疏解难民潮的大禹。仅从这个角度

看，颁奖给“四方机制”，也的确更有说服力一些。

相对的和平

可惜的是，突尼斯的太平也是相对而言的。

尽管经济破坏相对较轻，但革命前曾蓬勃发展的轻工等行业恢复缓慢，恢复较快的旅游业又一再被诸如今年“3·18突尼斯城巴尔多博物馆暴恐袭击事件”，和“6·26苏斯省康大维港马哈巴帝国酒店沙滩暴恐袭击案”等恶性事件干扰。本·阿里之所以下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一手推动突尼斯高等教育普及，却无力为大学生提供饭碗。这个问题如今更严重了——即便旅游业不被暴恐所干扰，其所能提供的

也多半是和大学生预期不符的低薪岗位。

“四方机制”之所以大功告成，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复兴党这个突尼斯原教旨政党不像其他阿拉伯国家类似政党（如埃及穆兄会和利比亚的某些派系）那样极端、恋栈和不调和。

但这是有原因的：和埃及、利比亚等国家属于“世俗派打酱油，原教旨当主力”不同，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主力是草根民众和世俗派别，复兴党虽早在1981年成立，但长期遭打压，领导人格鲁希流亡英国20年之久，“革命胜利”后才返回突尼斯，权力基础并不扎实。此外，突尼斯是阿拉伯世界最世俗化的国家，如此力量对比迫使他们不得不“温和”，在这种“土壤”里，“草台班子”才能大功告成。

换言之，“突尼斯模式”在其他中东国家恐怕很难复制。不过，这种“温和”同样是相对而言，就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前不足24小时，执政的突尼斯呼声党重要成员尼达阿·图内斯死于政治暗杀，未能和“同志们”分享这份光荣和喜悦。

更让人担心的是，原教旨在突尼斯水土不服并不意味着突尼斯不出产原教旨和暴恐，恰恰相反，大量突尼斯籍原教旨分子由于在本国缺乏“成就感”，转而纷纷加入IS等国际原教旨恐怖组织，成为“圣战者”。突尼斯警方今年6月发布的统计数据称，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地为极端恐怖组织作战的突尼斯人高达2000-3000人，其也是IS内人数最多的外籍士兵群体。IS则在网站上扬言，“有数以百计的突尼斯‘圣战者’领受了使命，回国闹‘圣战’去了。”

□ 编辑 漆菲 □ 制图 美编 虎妹



(澳门航空公司)



(港龙航空公司)



(厦門航空有限公司)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本刊为此版所列航空公司航班和酒店商务客房指定读物



鑫海锦江大酒店
XINHAI JIN JIANG HOTEL
(北京东城区金宝街61号)
订房电话:(86-10)58163388

(鑫海锦江大酒店)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
CELEBRITY CITY
HOTELS & RESORTS
400-826-6333

(城市名人酒店集团)



CROWNE PLAZA
HOTEL & SUITES
LANDMARK SHENZHEN
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
THE PLACE TO MEET.

(深圳富苑皇冠假日套房酒店)



CENTURY PLAZA HOTEL
新都酒店
www.szphotel.com

(新都酒店)



MARCO POLO
SHENZHEN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Tel:(86-755)8298 9888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银座泉城大酒店
YINZUO QIANG
(山东省济南市南大街2号)
TEL: (86-531) 86921911

(银座泉城大酒店)



香榭丽宫酒店
Palace Hotel
Tel: (86-0755) 82891111

(深圳香榭丽宫酒店)



丹枫白露酒店
Royal Suites & Towers
Shenzhen

(深圳丹枫白露酒店)



福州西湖大酒店
LAKEVIEW
HOTEL
★★★★★

(福州西湖大酒店)



SEAVIEW
O-CITY HOTEL
SHENZHEN
深圳海景奥思廷酒店

(深圳海景奥思廷酒店)



北京友谊宾馆
BEIJING FRIENDSHIP HOTEL
★★★★★

(北京友谊宾馆)



岷山饭店
Minshan Hotel
岷山飯店

(四川岷山饭店)



HORIZON
HOTEL
天恒大酒店
★★★★★

(云南天恒大酒店)



假日酒店
Holiday Inn
杭州国际假日酒店
特价直订: 0571-88946588

(杭州国际假日酒店)



丽江官房大酒店
GUANFANG HOTEL
★★★★★

(丽江官房大酒店)



天元大厦
TIANYUAN TOWER
杭州天元大厦
五星级商务酒店

(杭州天元大厦)



富盈酒店
CHINESE HOTEL
★★★★★
Tel:(86-769)8858 8888

(广东富盈酒店)



NARADA
Boutique Hotel
君亭酒店

(君亭酒店)



金龙建国温泉酒店
JINLONG JIANGGUO WENSUO HOTEL
★★★★★

(北京金龙建国温泉酒店)



中心大酒店
CENTRAL HOTEL
Tel:(86-025)8315 5888

(南京中心大酒店)



METRO Park
HOTEL
深圳维景酒店
Shenzhen

(深圳维景酒店)



CROWNE PLAZA
QINGDAO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
THE PLACE TO MEET.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酒店)



井冈山中泰来国际大酒店
ZHONGTAIJI
INTERNATIONAL HOTEL
五星级生态商务度假酒店

(井冈山中泰来国际大酒店)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
HARBOR VIEW
HOTEL RESORT
★★★★★

(珠海怡景湾大酒店)



珠海度假村酒店
ZHUHAI HOLIDAY RESORT HOTEL
★★★★★

(珠海度假村酒店)



帝豪花园酒店
ROYAL GARDEN
HOTEL
★★★★★
广东东莞市大朗镇黄草埔700号
Tel:0086-769-83122222

(帝豪花园酒店)



珠海华骏大酒店
HOTEL JUMBO ZHUHAI
★★★★★

(珠海华骏大酒店)



中泰来深圳戴斯酒店
Days Inn Shenzhen
预订电话: 0755-82203333

(深圳戴斯酒店)



常州大酒店
CHANGZHOU GRAND HOTEL
★★★★★

(常州大酒店)



虹桥宾馆
RAINBOW HOTEL
五星级
Jin Jiang Group

(上海市虹桥宾馆)

日本主妇德留绢枝 为美国战俘奔走16年

不久前，日本三菱公司在洛杉矶向二战时被强制劳动的美国战俘道歉，幕后推手是64岁的日本主妇德留绢枝。但在日本国内，她也因此背上骂名。

特派记者/邱林（发自日本仙台）

和 德留绢枝的见面，定在仙台市博物馆的咖啡厅。

这家博物馆位于仙台市西部的山顶上，除了树叶沙沙响和小鸟鸣叫，便听不到其他声音了。境内的两座雕像引来游人的兴趣，分别是日本战国时代仙台城的盟主伊达政宗和一个世纪前曾在仙台留学的鲁迅。或许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有关仙台这座日本东北中心城市的最初记忆，来自于鲁迅的《藤野先生》。

见面前，德留在邮件里抱歉地说，“家里极为散乱，还是在外面见吧”——这种解释并不令人费解，日本人不喜欢别人登门拜访。

显然，她在出门前花了不少功夫——亮色的红唇映衬白皙的皮肤，显得年轻且富有活力；泛着柔光的珍珠项链搭配着蓝色线衣和浅咖啡色长裤，简约却不失大方。

不过，我很快就能察觉到她和普通日本人的不同：寒暄时并没有点头哈腰，刚开始就热情地握住了我的手说：“欢迎来到仙台！”她的语调也颇为高昂，不时迸出“family”、“hometown”等英文单词，日语听起来有细微别扭。

这也情有可原。德留18岁就离开仙台，在东京上大学后跟随丈夫常住美国30多年，直到去年她才回到这片故土，照顾93岁独自生活的父亲。

人们很难将面前这位优雅的

家庭主妇和今年7月一则震惊世界的新闻联系起来——一家日本企业在洛杉矶向二战时被强制劳动的美国战俘道歉，而幕后推手正是这位64岁、身高一米六零的欧巴桑。但在日本国内，她也因此背上骂名：反日活动家，更多网民说她胳膊肘往外拐。

时令已是初秋，仙台仍是绿意盎然。“再过一段时间，街道两旁一排排的银杏树就会变得非常漂亮，树叶飘飞起来就像金黄色的蝴蝶。”德留兴奋地说，笑起来像一个小女生。

Why not do something?

很多人最初的疑问是，在家相夫教子的主妇，是如何与二战期间的人类大屠杀以及美国战俘等沉重的历史话题有交集的。在长达近四个小时的谈话中，德留毫无保留地谈及背后的种种。30余载的时光，她都信手拈来，每一个关键节点的日期、登场人物和详细过程，她都如数家珍，仿佛一切刚刚发生。

时光倒转至1978年，德留跟随外派的丈夫来到美国。丈夫作为典型的“企业战士”（日本人对工作狂的戏称），无法帮她打发空余时间。心血来潮的她开始猛攻英语，一举考入全美最具影响力的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系，并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国际关系论的硕士学位。

1990年的一天，她去美国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听了一场演讲，内容是德国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讲述自己的故事。没想到，这个演讲改变了她后来的人生轨迹。

该中心是国际犹太人权组织，以“纳粹猎手”——西蒙·维森塔尔来命名的。二战期间，纳粹政权让西蒙·维森塔尔家破人亡，战后他历经50年，最终将1000多名纳粹战犯送上法庭。

彼时，日本右翼一直有言论，否认二战时发生大屠杀这一史实。在听完幸存者讲述之后，德留特意跑上前去说：“作为日本人，我感到非常愧疚。”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笑着回答：“与其抱歉，why not do something（为何不开始行动）？”

这句话触动了德留，也让她开始关注犹太人大屠杀问题，并因此成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和一般的历史学家不同，她以讲述个人故事体验的手法，通过报纸、书籍向日本国内读者讲述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

1996年，德留亲赴奥地利和维森塔尔见面——她想知道，究竟是何种力量支撑这个传奇人物坚持了50年，将一个个大屠杀中的刽子手送上法庭。“这是我人生中最荣幸的时刻。维森塔尔给我巨大的勇气——行动起来，将历史的教训传播出去！”她如

此回忆20年前的那次会面。

失败的诉讼

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周年。是年，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撰写的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正席卷美国。这本书弥补了人们对这场历史事件的认知空白，震撼了西方世界，也引起日本方面空前的批判。时任日本驻美大使齐藤邦彦还亲自和张纯如在电视节目中公开论战。

作为唯一采访过张纯如的日本人，德留受到日本媒体的约稿。通过德留的报道，张纯如阐明了写书的动机，针锋相对地对日本舆论的质疑作出反驳。谈到这段忘年交时，德留明显放缓了语速：“她很年轻，却是一位意志坚定的女性。如果她还在的话，肯定能为西方世界了解东方的历史做出更大的贡献。”

谈及此处，德留的目光投向窗外，还不时地捋下搭肩的头发，颤抖的声音夹杂着失去挚友的悲伤和惋惜。

在采访大屠杀、这个展示人性极端黑暗的话题时，德留常被寻问：

“你的祖国，日本是如何对待过去的？”这个问题让她感到为难，因为自己接受的教育并没有给予充分的答案。德留开始有意转去研究日本历史，但1999年后美国掀起的一场诉讼改变了她的想法。

上世纪9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开始在人道层面上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清算——法国和罗马教皇对犹太人迫害进行道歉，德国政府和企业共同成立了基金会，向二战期间被纳粹强制的劳工作出赔偿。

199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法律，允许美国战俘对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请求赔偿——二战期间，有2.7万多名美国士兵被日军俘虏并



运送至日本。在三井物产、三菱和新日铁等日本企业里被迫从事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劳动，一万多名战俘因为饥饿和疾病而死亡。

这部法律促使全美各地战俘开始行动，纷纷发起诉讼。“我开始认为，美国战俘问题作为历史的延续，处于现在进行时——这比单纯研究过去的历史更有意义，也更能引起日本国内的关注。”因此，德留开始接触美国战俘，并向日本发回大量报道。“我和战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实他们很多都是医生、律师等

社会地位很高的成功人士，因此最终目的并不是索取金钱赔偿，而是想在有生之年为曾经受到的伤害得到正式的道歉，恢复自己的尊严。”

突如其来的战俘问题让日美政府乱了手脚。日方认为，这个问题在《旧金山对日和约》已经得到解决；经过四年审理，美国也于2003年驳回诉讼，理由是诉讼与日美安保条约冲突，将弱化日美同盟。

尽管诉讼最终失败，但德留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她渴望更多日本人知道美国战俘的存在，并最终促成

▲ 2012年，德留编枝在华盛顿参加战俘联谊会的活动时，与91岁的美国战俘多纳尔多·巴塞在二战纪念碑前合影留念。



↑ 2015年7月19日，美国洛杉矶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博物馆，三菱材料外部董事冈本行夫（左三）对美国二战战俘劳工詹姆斯·墨菲（右二）进行道歉。94岁高龄的墨菲是参加道歉仪式唯一的“二战劳工”，他表示，作为少数幸存者，自己有责任来这里接受道歉，这是战俘们期盼了70年的“光荣日子”。1944年9月，身为美军陆军士兵的他被俘后被送往三菱的铜矿充当劳工。

政府和企业道歉。

接下来，德留创立了“战俘·日美对话”组织，并建立网站讲述战俘的经历。她还和美国战俘联谊会合作，每当联谊会会有新动态，德留就会向三井、三菱等日本企业和日本外务省北美局发去邮件，敦促他们进行道歉。

“战俘需要的，是在人生谢幕前的一个道歉！我努力让日本认识到，和解是利人利己的。对于战俘来说，这是一个healing（治愈）的过程，我希望日本的官方和企业都能参与进来！”

谈到兴奋之处，德留情绪高昂，双手也随之挥舞，但言谈间始终没有使用任何批判性词汇。“当然，我是隔两三个月才跟他们写一次信，不妨碍他们正常的工作。”她用东瀛女性的细腻和温柔，缓慢地推动这场

和解的进行。

历史性道歉

在日本看来，德留的活动并不符合国家利益：政府官员一直对她说，政府无权命令企业道歉；一些民众更是指责她在美国从事“自虐式政治活动”，故意贬低日本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日奸”。“但我对这些毫不在乎，”德留非常坚定。

在其不懈的推动下，事情逐渐有了转机——2009年，日本驻美大使藤崎一郎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向战俘道歉；2010年，外务省启动“日本·美国战俘友好项目”，资助战俘前往日本接受日本官员的道歉。

然而，对于这些耄耋之年的战俘们来说，他们最后的愿望是：希望当事方的日本企业能够在他们有生之年道歉，实现全面和解。然而，德

留给日本企业的邮件多半石沉大海，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

今年2月，她突然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称自己是三菱综合材料的CSR（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负责人，希望能够在她的协助下，一起推动战俘问题的解决。“当时我在厨房做饭，心都要激动得跳出来了。这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提及这个瞬间，德留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三菱在道歉这件事情上态度诚恳，专门安排了三名工作人员协助德留，在道歉声明内容、战俘代表和场地安排上提供方案。“他们对待这件事情很有诚意，我和这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最后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在战俘问题上比肩作战的挚友、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副所长库伯则提出，由于受害者的健康状况已经

不允许其坐飞机去日本，而该中心作为展示纳粹受害者经历、呼唤人们珍惜和平场所，无疑是三菱道歉最适合的地方。

三菱也由此迈出历史性一步——2015年7月19日，三菱正式向曾经的二战战俘劳工、94岁高龄的詹姆士·墨菲，对二战期间强制其在艰苦条件下劳动以及一系列非人道主义行为公开道歉。该公司外部董事冈本行夫说：“我带着请求宽恕的心情来到这里，三菱还应该为没有更早作出道歉而道歉。”

很多战俘通过媒体了解到日本企业即将准备道歉，纷纷要求到现场。不过由于他们当时所在的是三井物产等其他企业，德留不得不一一拒绝。“其他日本公司至今尚未采取任何行动，我会继续努力的。”

谁在阻碍和解

战俘问题已经过去70余年，但对日企而言，是个棘手而现实的问题。2010年加利福尼亚州高铁招标时，以日立、川崎重工和日本车辆为主的日本企业联合体便遭到了当地舆论质疑，有评论认为“想中标就必须承认历史，向年老的战俘直接道歉”。

德留提到，现在日本企业宣扬理念时，毫无例外会强调尊重人权和社会责任，而战俘这一段十分不光彩的负遗产与此格格不入。“不做了解，尊重人权将成为一纸空谈。”

冈本在道歉仪式后表示，三菱认为不应把日本政府的立场当作挡箭牌，一直希望通过道歉使事情圆满解决，“但由于受到外部影响，没能实现这一目标”。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这个道歉姗姗来迟？

曾是职业外交官的冈本，也是安倍内阁21世纪构想恳谈会的委



员——该会为今年安倍战后70年谈话起草提供重要咨询。在该恳谈会4月发布的会议记录里，有一段表述耐人寻味：“被美国战俘和中国劳工诉讼的日本企业里，有些有意支付慰问金达成和解，但受到外务省和法务省的阻扰：政府认为问题已经在《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解决，在民间有意解决问题的时候进行阻止，要求不要节外生枝。”

有分析认为，一旦日本政府放弃赔偿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立场，允许民间企业道歉，势必引起中韩两国劳工问题的连锁反应，甚至有可能波及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担心，这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麻烦。

当三菱对美国战俘道歉后，在被问及是否也会向中国和韩国劳工道歉时，三菱公司董事长木村的回答称，“案件正在审理中，不能发表看法。”

日本有主张认为，现在的三菱综合材料和其前身三菱矿业不是同一法人，没有必要道歉。这种观点和

安倍在战后70年谈话中“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的论调存在雷同。

对此，德留毫不思索地反驳：“这种人的出发点，本身就是在为如何逃避责任寻找借口，并非在努力解决问题。”

“是什么力量让你为战俘问题奔走16年？”这是我最后一个也是最想问的问题。“超越国度去实现和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我能够参与其中是一项privilege（特权），让我感到非常充实。仅仅指责对方毫无意义，你需要做的，就是行动起来。Do something!”

此刻，午后温暖的阳光把她的脸颊照得通红。德留微微一笑，细长的眉毛也缓缓地舒展开来——虽然谈论的话题很沉重，她看起来却幸福且满足。37年前带着她跨过太平洋、一生默默支持她的伴侣不久前离开人世，留下必胜的信念陪伴她继续向前奔跑。☉

▲ 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的照片显示，1942年日本占领菲律宾时，巴丹死亡行军之前的美军战俘。巴丹死亡行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制造的震惊世界的战争罪行与虐待俘虏事件，当时在巴丹半岛投降的美菲联军战俘在日本士兵的押运下，从马里韦莱斯机场东面两英里的167号里程碑开始徒步行军，前往120公里以外的奥德内尔集中营。

难民危机中默克尔的“造越位”战术



王晓光

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博士,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能源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随着俄罗斯高调介入叙利亚危机, 加上美国及其盟国的复杂回应, 中东进入了一种扑朔迷离的情境。与战火纷飞相映衬的是, 大批难民持续涌入欧洲, 引得世人关注。在此次难民危机中, 德国始终处于话题中心。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出人意料地发表开放边境接收在欧洲滞留的难民的决定后, 大批难民如潮水般涌入德国, 接待能力不堪重负。

不少分析称, 默克尔这种政策是出于其政治上的幼稚, 也有评论认为, 德国的政策是基于经济理性, 需要难民来补充劳动力的短缺。但这两种解释都欠妥。

首先, 默克尔作为资深的政治家, 不会轻易犯幼稚的

错误, 而且就在几个月前, 她还冷面对待来自难民家庭的小姑娘, 招来不少批评。而以经济理性为解释也有不妥, 因为据统计, 难民绝大多数只受过中学以下的教育, 几乎不掌握德语, 这样的人力资源能为德国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支持恐怕极为有限。

因此, 要理解默克尔的政策, 德国的政党政治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点端倪, 至少是一种视角。这一次, 可以拿来类比的是足球比赛中的“造越位”战术。

难民危机背后的德国政治光谱

足球比赛中, 后卫往往运用“造越位”战术瓦解对方攻势, 即在对方助攻球员送出传球前, 后卫队员不是向本方移动防守, 而是向对方半场移动, 将对方前锋置于“越位”位置, 从而兵不血刃地终结对方的进攻。类比到政治中, 我们可认为, 政党为了扩大自身的支持者基础, 往往会向其对手政党的政策方向移动, 从而获得更多支持并削弱对手, 特别是在外界舆论风向开始对政治竞争对手有利的时候。

从德国的政党结构来

说, 默克尔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是德国最重要的保守派政党, 也是我们常说的“温和右翼”, 阿登纳和科尔都出自该党。而CDU的“姐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CSU)是巴伐利亚州的地方性政党, 可将其理解为是CDU在巴伐利亚州的分支, 由于两党在选举中以一个政党上的形式出现, 因此在德国又被合并称为联盟党(Union)。自由民主党(FDP)则是比CDU在经济上更为自由和右倾的政党。以上三党就构成了德国的右翼政治。

相对的, 德国左翼政治势力也包括三个主要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是德国第二大党, 如其名称, 该党秉承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即“温和左翼”, 其代表包括前首相勃兰特、施密特和施罗德。绿党是集环保主义和女权主义等先锋思想的政党, 光谱上比SPD更为左倾。左派党(Linke)是“激进左翼”政治势力。上次联邦议院选举的结果是, 左、右派都没有取得组阁的多数, 最后是由两个最大的政党Union和SPD组成一个“大联盟”政府。左、右政治处于一个动态平衡中, 双方也都在寻找扩大政治版

图的机会。

接收难民的政策在传统意识形态上一般是左翼政党的主张, 而作为保守派的政党往往担忧移民对社会带来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冲击, 一般秉承更谨慎的态度。如果在该议题上默克尔能反其道而行之, 以左翼政党的政策为自己的主张, 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首先, 左翼政党将失去道德优势, 无法对默克尔政府进行指责。其次, 左翼政党将不得不跟进, 因为接收难民是他们的一贯主张, 即使接收难民政策失败而造成严重后果, 左翼政党也会跟着“陪葬”。如果难民危机激发民粹和民意整体右倾, 那么左翼政党的长期社会基础将被动摇。

在这种背景下, 我们看到, 在默克尔决定开放边境接收难民虽然令很多人吃惊, 但是在初期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作为同一阵营的保守政治家, 虽然对政策本身保留意见, 但毕竟对自己人还是不便公开反对。而左翼政党, 虽然感觉默克尔在该问题上有“抢镜头”的嫌疑, 但是基于自身主张的一贯性, 也没有对默克尔的难民接收政策提出异议的空间。

可以看出，默克尔成功地在左翼政政策出台前“造越位”，将自身的执政联盟置于有利的位置。

“造越位”战术带来的副作用

不过，“造越位”战术的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即很可能失去自己阵营的支持，最后祸起萧墙而产生灾难性政治后果。

前任总理施罗德曾经试图改革德国的劳动雇佣和社会保险制度，使其更具灵活性。一般认为这样的改革是比较亲资方的右翼的政治主张，而施罗德作为来自SPD的左翼政治家，提出这样的政策似乎难以理解，但事实上这也是一个“造越位”。不过，施罗德政府很快就感受到了副作用，左派党在之后不断壮大，而SPD在之后的选举中失去和绿党组阁的可能，不得不和Union组成大联合政府，施罗德本人也将总理一职拱手让给默克尔。

默克尔之所以能更自如地“造越位”，有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即由于历史的原因，相比于欧洲其他国家，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势力显得微弱，缺乏一个像左派党制衡SPD一样的对应的右翼政党。FDP本身更像个精英色彩浓重的富人党，且在金融危机后已经日益边缘化，2013年大选FDP甚至没有拿到进入联邦议院的5%的门槛选票。这

样的政党结构也决定了默克尔可以更没有后顾之忧地将政策向中间地带移动。

但随着难民危机的深入，德国社会对难民的接收能力日益逼近极限，社会舆论的风向整体开始趋于负面，默克尔的难民接收政策也开始受到挑战。此时，质疑的声音恰恰来自保守派阵营。第一个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提出质疑，同时目前也是保持质疑声调最高的高层政治家是CSU的主席，同时也是巴伐利亚州州长的泽霍夫（Horst Seehofer），他甚至邀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访问德国。后者一向以其铁腕阻挡难民涌入闻名，且批评默克尔是“道德帝国主义”。

不少CSU的政治家也对默克尔的移民政策提出质疑，如前内政部长弗利德里克（Hans-Peter Friedrich）批评其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错误”，要求默克尔为移民额度设置上限，甚至修改德国的难民法。

与此同时，CDU本党同仁的质疑声也纷至沓来。现任内政部长德梅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直言德国对难民持续地涌入已经应接不暇，并开始对难民本身的一些行为提出公开批评。讽刺的是，截至10月初，对默克尔包容最多的反而是在政治光谱上和她的政党距离最远的左派党和绿党。

目前来看，默克尔的此番“造越位”风险比以往都大。



↑ 2015年9月10日，德国柏林，默克尔慰问抵达德国寻求避难的难民，并与一名男子拍照留念。

政治上的“造越位”战术虽能带来效果，但其副作用也是明显的，即很可能失去自己阵营的支持，最后祸起萧墙而产生灾难性政治后果。

首先，接收难民对德国带来的收益在长期的、无形的、主要是国际道义层面的，而这些收益往往难以被国内社会感知。相反，该政策对德国社会的冲击是立竿见影的、直观的、涉及切身利益的，这些对国内社会影响更大。随着难民的涌入，各类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同时默克尔的民意调查支持度也呈下降趋势。借助这次危机，极右势力已经在积聚力量。

同时，此次德国在难民危机中的政策也给它和欧洲邻国的关系造成影响。另外，左翼政党，特别是SPD，也在利用民意积极开展反制“造越位”，即表现出比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更保守的声音，开始

试图“收割”保守派的民意。面对着欧洲邻国、党内同仁和政治竞争对手的三重压力，普遍认为，默克尔现在恐怕面临着其政治生涯中最大的危机。

最新的消息是，以34名CDU党籍的市长和区长为代表的政治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致默克尔，认为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已经背离了法律和政党的基本路线。而在CDU党内和德国政坛都拥有极高威望的财政部长朔伊布勒也认为目前局势非常紧张，这似乎预示着在默克尔肩上来自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此次默克尔“造越位”的结果如何，仍待观察。🌀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朝鲜大阅兵深度解析

在此次阅兵式上，金正恩在讲话中批判美国的地方明显减少，这似乎流露出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信号。

特约撰稿 / 田聿

↑ 2015年10月10日，朝鲜首都平壤举办了劳动党建党70周年盛大阅兵式，图为朝鲜人民军新型天老虎主战坦克方队接受检阅。此次阅兵朝鲜出动2万余人，规模相当大，不过参加受阅的主战装备称得上先进的并不多。

10月10日下午，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之际，朝鲜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上举行阅兵仪式。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恩身着黑色人民装走上主席台，向台下军民挥手致意，并检阅了部队。

朝鲜中央电视台的画面显示，他左手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之后是朝鲜高级政治官员。军事官员站在金正恩右手边，话筒前方的是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随后，这位年轻的领导人面对数十万官兵和群众发表演说，回忆朝鲜劳动党建党70年来的历史。

上千名朝鲜士兵组成整齐的队

伍，走入金日成广场。广场上挂着横幅，写有“战无不胜的朝鲜劳动党万岁”的字样。广场上空飘着气球，广场上还插满了红色的朝鲜劳动党党旗以及朝鲜的蓝白红色国旗。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新闻》当天发表劳动党建党70周年的社论称，要将朝鲜建设为“无敌的军事强国”。

阅兵政治悬念不少

与2012年、2013年两次阅兵相比，此次朝鲜阅兵带来的悬念让人印象深刻。据凤凰卫视报道，阅兵当天上午8点多，大批外国记者和游客就云集于平壤羊角岛饭店大堂，打算乘车前往金日成广场观礼；但没

想到朝鲜官方竟然没有动静，眼看着以往阅兵惯用的“D时”（上午10时）过去，大家只好回到房间休息。

中午，饭店里传来“平壤下雨影响阅兵效果”的小道消息，许多人琢磨着阅兵计划还能否实施，一些俄罗斯记者则隔着房间玻璃，把摄像机镜头对准大同江对岸，发现那里停满朝鲜国产太白山牌卡车（俄罗斯吉尔-151卡车的翻版），所有车辆均为深绿色涂装。很显然，当天的阅兵已是“箭在弦上”，只是何时发出罢了。

幸运的是，午后的平壤雨过天晴。当地时间13时50分，阅兵式正式开始。金正恩在主席台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党和人民，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在白头山革命传统下，我们国家已经在劳动党的领导之下，做好了任何的准备，面对任何的困难，做出任何的斗争，打任何的斗争。”

本港《亚太防务》杂志注意到，相比前几次阅兵发言，金正恩更突出劳动党的“先锋队”作用，号召朝鲜军民永远跟随劳动党中央，团结一心，以不败的信念，沿着“主体革命、先军政治”的道路继续争取新的胜利。熟悉朝鲜“庆典语言”的香港学者宁博强调，参加阅兵的一些方队所穿戴的军服军帽正是1945年随金日成回国的那批游击队员的装束，他们是最值得尊敬的劳动党元老，在国内被称为“真骨”，这反映出朝鲜劳动党努力唤醒人民的记忆、鼓舞全国军民进行“强盛国家”建设的决心和斗志。

由于此次阅兵意义不凡，规模和内涵也极为丰富。韩国“自主国防网”援引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画面统计，朝鲜陆海空三军、战略火箭军以及工农赤卫队、红色青年近卫队等组成的约30个方阵依序通过金日成广场，出现将近800余台（辆）武器和

装备,宣传“劳动党的不可战胜”和“军队的所向无敌”,给整个“三千里江山”带来巨大震撼。

日本朝鲜问题专家边真一指出,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朝鲜在劳动党“逢十”大庆的时候往往会举行盛大庆典,其中阅兵属于当之无愧的“一号运动”。由于2015年是朝鲜半岛光复和劳动党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朝鲜已故领袖金日成上台执政的70周年纪念,因此朝鲜以阅兵来缅怀追忆,鼓舞人心,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意图体现得淋漓尽致。

“军事自信”实力几何?

韩国学者表示,朝鲜希望把阅兵办成声势浩大的“武力示威”,显示自身雄厚的国防潜力。由于朝鲜国内曾传出裁军30万(朝鲜现有兵力约119万人)的声音,因此这次通过阅兵“秀肌肉”,无疑是想告诉假想敌“不要有非分之想”,朝鲜仍有足够的“战争遏制力”自卫。

有专家指出,朝鲜武器库虽然庞大而丰富,但从整个阅兵编排来看,仍停留在机械化战争时代——所有自行火炮均为敞开式战斗室,缺乏现代化信息火控系统,装甲车辆也普遍没有安装精密的防护装甲和探测传感器;更致命的是,朝军严重缺乏争夺局部制空权的先进战机,以至于地面车辆广泛配置大口径高射枪炮或射程仅及4000米的肩扛式地空导弹,如此密集的防空火力部署其实间接反映出朝鲜军队的无奈。

一名定居韩国的“脱北者”声称,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朝军主要武器装备基本实现国产化,但作训油料供应不太正常,像空军多数飞行员的月平均升空训练时间才半个多小时,各军兵种不仅缺少燃油,还缺少必要的润滑油和液压油。2003年美国

攻击伊拉克前,朝鲜主要靠从伊拉克进口原油,然后加工各类液压油,萨达姆倒台后,朝军用油的缺口就很难补上了,这也是为什么阅兵式上朝军刻意突出导弹、火炮、携带“脏弹”的特种兵等“非对称作战力量”。

韩国“北韩战略情报服务中心”代表李润杰指出,以三次核试验为标志,朝鲜重新建立对内对外的“军事自信”,从而进入“核与经济并进”的新时代,这场阅兵也对外强调劳动党领导下的朝鲜国家体制的巩固,营造团结一心的氛围。韩国《周刊朝鲜》指出,金正恩执政后,劳动党对军队的领导得到强化。例如,辅助金正恩决策的是劳动党书记室负责分析各类信息,以此为依据形成决策参考汇报给金正恩,不用绕过其他中间程序,而该部门的分析判断直接影响着金正恩的决策方向。

据韩国国家情报院退休特工崔植寿(化名)透露:“书记室统筹朝鲜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总体布局,按领域分析研究政策,共有职员800人,其中书记官就有300多人,有独立的三层办公楼。一旦进入书记室将终身服役,书记室公务人员都非常神秘,甚至这些人不能在高丽酒店吃饭,几乎与外界隔绝。”在同一座楼里办公的,除了书记室,还有协助书记室工作的文书室、分析室等部门,这三个部门的职员加起来有2000余人。

试图打开对美外交

展望未来,朝鲜在进一步固化劳动党体制以及“先军政治”基础上,仍试图打开对美外交的新局面。在此次阅兵式上,金正恩在讲话中批判美国的地方明显减少,这似乎流露出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的信号。韩国《世界日报》认为,经历2010年

“延坪岛事件”后,美国逐渐熟悉了朝鲜的“斗争节奏”,继完成与韩国的应急军事响应体制(尤其是成立美韩联合师、为韩国“西北岛屿防卫司令部”提供情报后勤支援),美国对韩国的防务并不担心,接下去只是“静观其变”。与此同时,美国着力利用自身在国际外交、金融等方面的优势,竭力压缩朝鲜的生存空间,迫使其在关键性问题上让步。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引述多次促成美国退休高官访朝的韩裔美国人托尼·南宫的话表示,朝鲜最反感的未必是美国的“去核红线”,而是美国经久不息的金融封锁,“这让朝鲜的正常经济活动受到伤害,进一步加重平壤对外部世界的警惕性”。

美国记者纳特·泰勒却认为,金正恩时代的朝美关系仍有回环空间,“金正恩或许不喜欢美国政府,但并不代表他从来不与美国民间组织接触”。泰勒采访过美国本土一些特殊组织和团体,它们均与朝鲜劳动党中央国际部建立了“友谊”,“朝鲜执政党对不少美国民间组织作出过友好姿态,并对这些组织进行争取工作,比如‘美国先军政治研究团’”。

据称,受朝鲜政府邀请,不少美国民间组织高级成员都访问过平壤,他们在朝鲜享受贵宾级待遇,通过此类访问,他们能了解朝鲜的文化、民俗以及政治情况,回国后也一直与平壤方面保持联系,“某些组织的成员甚至在家里挂上朝鲜领导人的照片以示尊敬”。

“朝鲜希望在美国本土找到自己的政治盟友,并借机让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入美国,尽管现阶段效果有限,但总归会推动朝美互动渠道的多元化。”泰勒说。



金正恩上台后的四次阅兵

●第一次和第二次均在2012年,分别于金正日诞辰70周年(2月16日)和金日成诞辰100周年(4月15日太阳节)之际举行。

●第三次阅兵式在2013年7月27日,为纪念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署60周年举行。

●第四次在2013年9月9日,为庆祝国庆65周年,朝鲜举行大规模劳农赤卫军阅兵式,并展示了放射炮等武器。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九月 开学季，美国各类学校迎来各自的学生，其中大批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国际留学生。

中国赴美留学生的数量在近年不断增长，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和美国文化教育部的数据统计，2013年来美国就读高等教育的中国学生就高达274660人，占全部国际学生的31%，连续6年第一。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学生“走出去”的年龄正逐渐变小——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选择高中甚至不乏初中就将孩子送出国读书。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统计，2005—2006学年，只有65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私立高中就读，而2012—2013学年，数量已高达23795名，中国也在2011年超过韩国，成为美国高中生最大的国际招生来源。

这些越来越多的低龄化国际学生，父母都留在国内，只为他们提供学费、生活费，有些甚至是买张机票就把孩子“打包”送往美国。这些只身一人来美国读书的未成年国际学生被形象地称为“降落伞少年”。

许多专家认为，作为还处在青春期的未成年人，“降落伞少年”们一般很难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再加上缺乏父母的及时引导和教育，容易误入歧途。这些观点某种程度上因为今年年初发生在美国洛杉矶的中国留学生施虐同胞案得到了印证。

洛杉矶施虐案涉及的14名当事人均为中国留学生，年龄14—20岁不等，在美国就读高中，是典型的“降落伞少年”。今年3月底，因为长期积攒的不和，翟芸瑶（音



真实的 “降落伞少年”

译)与其男友张鑫磊(音译)纠集若干其他同伴总计12人,一起殴打了与他们同在加州罗兰岗牛津私立学校读书的女同学麦嘉怡和刘怡然,两名受害者被施加了一系列暴行,包括剪头发、扒衣服,甚至用烟头烫乳头、屁股等敏感部位,折磨时间长达5个小时。此案曝光后,美国舆论哗然。今年夏天,该案进入美国法院的审理程序,美国检方在庭审中对翟芸瑶等被告人提出包括绑架、软禁、殴打、折磨在内的多项指控,其中翟芸瑶及其男友二人面临的最高刑罚可达终身监禁。

该案目前尚未有最终结果,但在美国教育界引发的震动已经影响巨大。“校园霸凌”甚至成为美国新学年开学季的关键词之一。“有钱任性”也成为人们对来自

中国的“降落伞少年”的最主要印象。

翟芸瑶案的确体现了很多“降落伞少年”面临的问题,也敦促中国父母在将未成年孩子送出国前再作反复考量。但中国“降落伞少年”就全是“翟云瑶、张鑫磊”吗?我们能否因为一个极端个案就将“降落伞少年”一棒子都打死呢?带着上述问题,《凤凰周刊》采访了若干中国留学生以及相关教育学家,以期全面了解中国“降落伞少年”在美国的心理和生活状态。

在此,我们呈现一个普通中国留学少年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以便读者近距离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虽然不能以一赅全,但窥豹一斑,就此还原大多数中国“降落伞少年”的真实状态。

一个“降落伞少年”的美利坚生活

美国的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守法教育，学校管理非常严格，“校规特别详细，有一本新华字典那么厚”。

记者/李克难（发自北京） 特派记者/李想（发自华盛顿）

“你准备申请哪所大学？”
“我还没上高中呢。”

来自中国东北的少年Kevin，年近15岁，却已身高1.81米，体型宽厚，说话也显得特别成熟，让人很难将其与实际年龄联系起来。

《凤凰周刊》记者第一次见到Kevin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正准备前往美国开始其新学期。他推着的行李中最大的是一套高尔夫球装备，连同一个半人高的箱子，都要被运到美国。Kevin称，今年他参加了学校的高尔夫小组，所以特意将这套家里的装备搬去美国。

两年多前，12岁的Kevin成功申请了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的沙特克-圣玛丽中学（Shattuck-St. Mary's School）。学校位于该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郊外20多公里。坐落于美国中北部大平原间的校园是一座座中世纪风格的古老建筑。在这里，Kevin一年的学费大约是30万到40万人民币。如果选择不住校，学资会少不少，但该校现有的40名中国留学生只有一人不住校。

没有了每周的升旗仪式，也没有了每天的早操、课间操、眼保健操，甚至没有早自习，也不再经历中国学生的书山题海，Kevin“降落”美国后经历着截然不同的学校生活。

李某一曾经就读的学校

美国中学分为公立和私立两大类。原则上，外国学生不能申请公立中学，因为公立中学建校资金及各项费用支出来自美国

本土税收，学校的职能是为辖区内纳税人的子女提供义务教育，采取就近上学原则，学费、课本费全免。不过，美国公立中学可以招收国际交换生，但期限是一年，一年之后交换生必须回到派出国，此后想要继续在美国学习，就要转入私立中学。

美国私立中学隶属于私人机构和宗教团体，由民间出资，供当地或外国学生就读。留学生一般都申请就读私立中学。美国私立中学按住宿情况不同可以分为走读学校和寄宿制学校；按学校性质不同又可以分为宗教学校、军事学校和大学预备学校；按招生性别不同又可以分为男生学校、女生学校和男女混合学校。

沙特克-圣玛丽学校前身是一所军校，至今一栋男生宿舍楼进门的门廊上还刻着越南战争中战死的学生名字。现在这里是一所私立寄宿制为主的教会学校，主教堂是校园里最突出的建筑。不过学校比较开明，在信仰问题上没有任何干涉，也不会到周末要求学生去做礼拜。

该学校是男女混校，招生面向全球。目前总共600多名学生里，有大约400名住宿生，国际留学生大约150人，其中40人来自中国大陆，是外国学生中最大的群体。中国大陆学生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深圳三地。

如果仅仅提名字，沙特克-圣玛丽学校显然是不太为中国人所知的，但如果提到该校曾经的一名中国留学生，中国人一定非常熟悉——李某一。事实上，Kevin的这位学长，其故事在沙特克-圣玛丽学校也算一段“传奇”。

沙特克-圣玛丽学校管理非常严格，“校规特别详细，有一本新华字典那么厚。”Kevin告诉《凤凰周刊》，美国的学校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守法意识的教育，所以，“那些违法的，比如洛杉矶施虐同学的，有报道说他们事发后表示之前不知道这是犯罪，以为只是一般的小错误，我不太相信这种解释。”

沙特克-圣玛丽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有独特的“白卡与红卡制度”。在学校犯一些小错误，会得到一张白卡，三张白卡就要被罚在周六清晨8点到图书馆上三个小时自习进行自我反思。而一些大错误，比如打架、喝酒、抽烟之类的，则会发给红卡。红卡视情况的不同会给以从警告到开除的惩罚。一般积累两三张红卡会被开除，但考试作弊、吸毒等这样比较严重的违纪，则一张红卡就可以开除。还有一种惩罚叫14天强制离校，执行这种惩罚会导致被罚学生在此期间不能参加考试，从而影响其总成绩，期间耽搁的课程也没法补上，对该学生的升学产生长期影响。

李某一在学校就读期间的故事在中国学生中广为流传。有说法称他曾多次违纪，行为不一，受到过包括白卡、红卡在内的各种惩罚措施，最终被勒令退学。

据了解，李某一在沙特克-圣玛丽学校就读期间，喜欢独来独往没太多朋友，李某一交作业、考试情况据称都不理想，还曾在课堂上与老师发生过争执。

李某一曾被处以强制离校14天的惩罚，原因据称是曾经在学校的公共电脑教

→ Kevin正准备穿过沙特克-圣玛丽学校的标志性拱门，这个私立的教会学校随处可见中世纪风格的古老建筑。

室里观看不良视频。

之后李某一曾短暂回国。回到美国后，不到两三个月，李某一又和其美国室友起了冲突。闹僵了之后，李某一就在其室友的饮品中偷偷倒了洗衣液，导致其室友被送往医院，李某一因此被学校开除，从此从这个中学消失。再后来大家听说李某一的消息，已经是2013年在中国国内炒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涉嫌轮奸案。

在李某一案庭审期间，不少大陆媒体联系过沙特克-圣玛丽学校，校方承认李某一曾于2009年秋季到2010年春季在该校八年级就读，但以“保护任何学生的个人信息”为由拒绝证实李某一离校的原因。不过大陆媒体《法制晚报》报道称，李某一就读期间的辅导老师亨利·道尔(Henry Doyle)证实，李某一是因为不遵守学校的规定而被开除。

《凤凰周刊》记者也曾致电沙特克-圣玛丽学校校长办公室，校长助理对相关问题未予表态，要求记者发邮件询问。但截至发稿，并未给予回应。当然，李某一也并非特例，美国学校里确实奇特的人、离奇的事特别多，学生们玩出的花样比在大陆的学校多了不少。

沙特克-圣玛丽学校里有三个小有名气的“技术宅”。其中一个来自深圳的男生，他不知从哪里搞来一批象牙，然后自己在宿舍里面用各种专业工具进行打磨，做成工艺品再拿出去卖。这位男生还精通网络技术，曾经侵入学校的系统，把同学父母的工作信息盗取出来做成资料广为传播。这名男生据称还曾弄来一只野狼的头，在宿舍里切开头颅做标本，气味难闻。两次事件后这名男生被要求离校。

在明尼苏达州，医用大麻是合法的，但学校里还是会禁止，宿舍里也查得很严。有一个韩国留学生为了吸大麻不被发现，竟



然在凌晨一点多从二楼的窗户向外爬到了宿舍楼的房顶上去吸食。

在男女关系上面，沙特克-圣玛丽学校不仅不会干涉，甚至会有鼓励，只要不太过分。每年学校会举办舞会，一些情侣会得到大家的祝福。曾经有两个男同性恋还当着在场400多同学和200多家长的面接吻，让整个场面甚为尴尬。而一个长得特别帅的男生，则一次带了三个女生作为伴侣参加舞会。

中国留学生人数呈增长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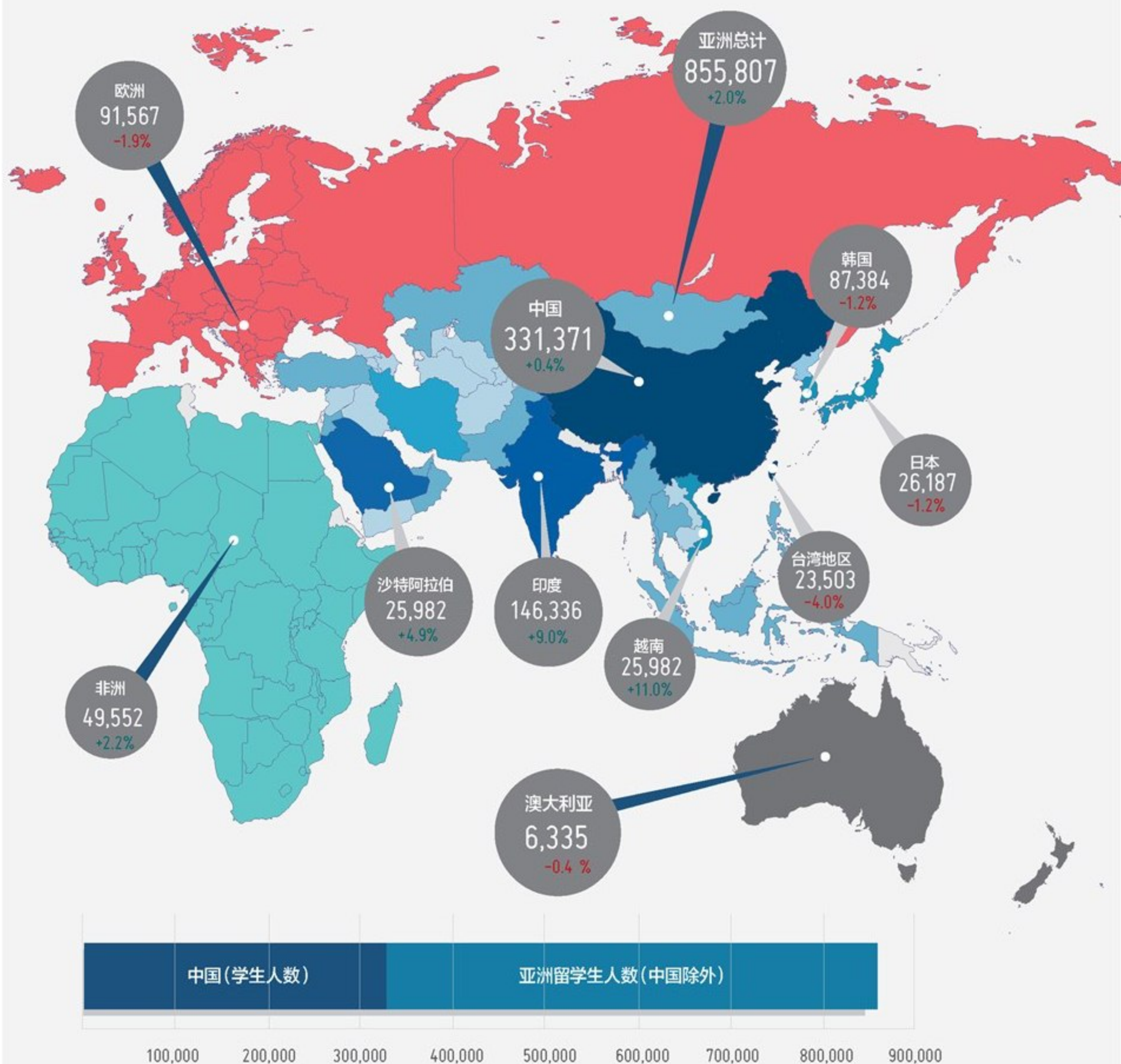
“今年不知道怎么了，中国学生暴增，

仅我们初中部，中国学生男生已经达到7个，女生11个，而此前中国学生来读初中的最多不会超过11个。”Kevin告诉《凤凰周刊》，过去大多数中国学生起码都是初中毕业后才到美国读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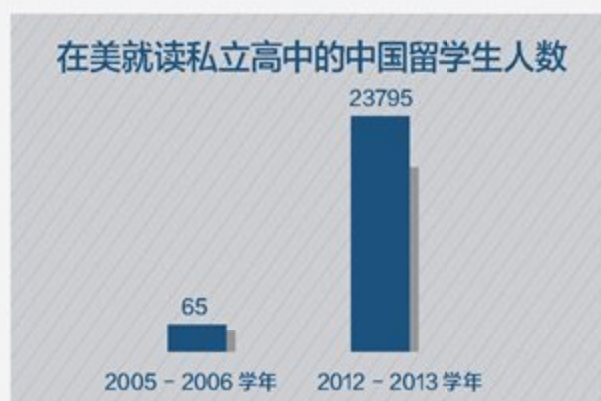
沙特克-圣玛丽学校的费用，除了学费以外，加上各种医疗保险等，一年将近40万人民币。因此，来这里念书的中国孩子的家庭都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些家庭条件优渥的小孩在美国的其他花销也不会少。Kevin的父母经常责备Kevin花钱太多，但Kevin发现，他在学校的中国学生里，可能只

在美国就读的国际学生来源分布、人数及同比比例增长率

(2014 年 10 月 - 2015 年 2 月冬季学期统计)



资料来源: 美国国土安全部官方资料



2005—2006 学年, 只有 65 名中国学生在美国私立高中就读, 而 2012 - 2013 学年, 数量已高达 23795 名, 中国也在 2011 年超过韩国, 成为美国高中生最大的国际招生来源。

是花钱排倒数第四、第五的, 花钱多的一年下来学费加生活费能达到100万人民币。

沙特克-圣玛丽学校的招生有一套自己的流程, 需要申请者提供之前的学习成绩、家庭背景, 还要通过面试, 尤其对学生的家庭背景相当看重。

“美国这些学校有点特别的是, 不仅在乎孩子父母是做什么的, 还在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以前是做什么的。”

Kevin回忆, 当时父母给自己做了一份几乎完美的档案, 申请了三个学校, 三个学校都获得了成功, 此后又顺利通过了面试, 最终成功入学。

学费的门槛以及招生的过程决定了到这里念书孩子的家庭必属社会上流。据Kevin介绍, 来自中国的学生, 其家长从事房地产行业的较多, 近两年金融方面、公司高管等也纷纷多起来, 从事的行业也五花八门。

“关于是否有‘官二代’很难说, 平时大家也不会主动说起这些事, 我也不太好主动去问, 而且如果真的是‘官二代’, 那一定是藏得最深的。” Kevin告诉《凤凰周刊》。

回顾在沙特克-圣玛丽学校两年多的学习生活, Kevin记忆深刻的是, 他到学校感觉最大的不同, 首先就是作业通过一个校内邮箱下发, 考试成绩也通过校内网络查看, 并不会像中国那样公布出来, 而是需要自己输入密码去看。

学校有关于校服的规定, 而且很详细。学生平常上课必须穿校服, 男的穿黄色卡其裤, 上身是印有校徽的T恤衫, 有红色、白色、黑色三种颜色。T恤必须掖在裤子里面, 外面的羊绒衫该怎么穿, 腰带该怎么系, 指甲不剪怎么样, 胡子不刮怎么样, 这些都一一有规定。

不过一学期中也有些日子不需要穿校



← 沙特克-圣玛丽学校在美国中学里以“冰球学校”出名，该校的冰球队曾多次赢得美国中学生比赛的胜利。图为冰球比赛前，学生们从黄色校车下来，准备前往球场观赛。穿西装的男孩是冰球队员之一。

大学可能会看不上你。”

在这个学生来自全球各地的学校，中国人、韩国人、越南人总体平均成绩是排前三的。当然也有个别成绩不行的，中国学生里有过因为英文不行而被劝退的案例。

在沙特克-圣玛丽中学，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没有什么国籍之分，都要一起上课，第一年相同国家的学生住宿也被有意分开，只有语言课程上，英语国家与非英语国家会有区别。英语国家的学生自选一门外语，比较多的是选西班牙语、法语、拉丁语等，非英语国家的学生则需要通过ESL的课程和考试。由于课程是强制的，而且学费高昂，这也成为国际学校的一个重要的创收手段。

中国学生基本属于上课能听懂，但大部分英语都不算好。除了语言课以外，还有科学类课程，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还有历史类的课程，以及各种美术课、音乐课。

语言的障碍似乎也让中国孩子们的家长与美国学校了不少可能的冲突。Kevin觉得在美国的中国孩子们的家长们尽管各个都身家殷实，在国内能颐指气使，但到了美国，到了他们孩子所在的学校面前却会柔软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中国的家长即使他可能是某个职位很高的人，但大部分英文都不怎么样，像那些平时气场很足的人，如果语言不行，想表达的表达不出来，气场一下子就下来了。”

宅在宿舍里的中国学生

在这个国际学校，各国学生混住在一起，但不同国籍学生的行为模式和习惯还是有很大差别。不上课的时候，中国学生大多宅在宿舍玩游戏，韩国学生和中国学生比较相似，而欧美学生则更多喜欢户外运动。

服，女生会打扮得漂亮性感，穿热裤丝袜露个腿什么的，碰到比较严肃的老师也会被要求去换。

Kevin回顾自己到美国生活，觉得最大的障碍还是语言。“生活上一个星期也适应了，但语言的障碍让人特别难受。”Kevin告诉《凤凰周刊》，他到美国的开学第一天就迟到了，因为学校通知要出外野营，到一个印第安部落。但他听不懂相关通知，最终没有赶上。第二年才补上了野营这个项目。

不过迟到了一年的野营项目，Kevin并未觉得很有意思。学生们被安排住一些小木屋，白天屋子里热，吃的太少吃不饱，喝水还有铁锈味，晚上冷得不行，有的女生都睡不着。白天老师就坐在屋子里，学生在外边做一些幼儿园孩子才玩的游戏。Kevin觉得这些活动有些弱智，没啥意思，他个人不太喜欢这类集体活动。

在沙特克-圣玛丽，初中的课程基本上是固定的，到了高中就要自己规划课程，比较接近大学的方式了。如果自己安排课程太少，也会对申请大学造成影响。无论是高中还是初中，学校都没有班级概念，一个年级会有几个老师主要负责，但他们不是班主任。上课以小班进行，学生拿着自己的课表去找教室。

在美国从高中开始的成绩都会有记录，包括学生在校活动的情况、受到的处分都会作为大学选择的依据。Kevin觉得，在美国虽然没有中国竞争压力这么大，但也不算轻松。并不是外界认为的美国学生就是整天玩，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压力的。

“如果你学习成绩实在太差，有可能被劝退，被劝退就只有再去找其他的学校。因此在美国，如果你在一个学校待很久则是一个不错的记录，如果你转学多次，

摄影/吴晓

→ 上图为沙特克-圣玛丽学校的钟楼，该楼同时也连通学生的宿舍楼。下图为宿舍楼里学生的公共活动区。按照该校的规定，住宿制学生周日至周四每晚八点到九点半需要在宿舍楼里晚自习，不能离开宿舍。但成绩特别好的学生可以有豁免，而成绩特别差的学生则需要去教室由老师盯着写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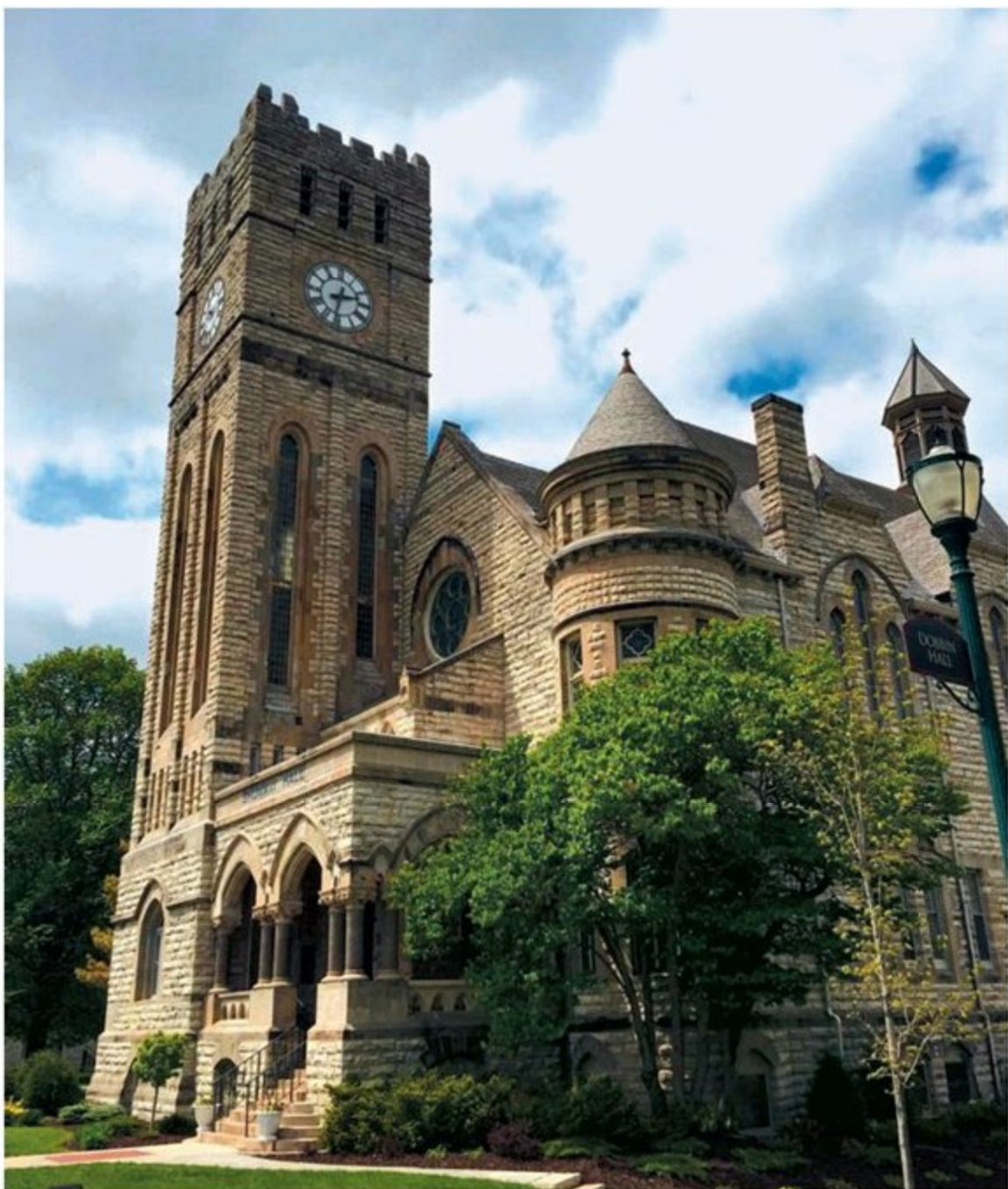
“欧美学生基本没见过宅的，中国人则大部分相反。好多中国学生说一口Chinglish（注：中国式英语），然后天天一到周末就宅在宿舍打游戏、看动漫，但论考试成绩，学霸级别又几乎都是中国人。欧美学生喜欢各种体育运动，我们学校有打冰球的，有周末组团打高尔夫的，登山的，看电影的，去逛逛的都有。而中国学生大部分会睡到太阳晒屁股才会起。”Kevin告诉《凤凰周刊》，大部分中国学生也主要是和来自本国的同学扎堆儿玩。

爱玩电子游戏是中国学生的一个大问题，Kevin也不例外。他第一年到学校疯玩游戏，除了上课以外，就几乎所有时间都玩游戏。特别是一到了周末，买一瓶叫“Monster”的功能饮料，然后就开始鏖战英雄联盟（注：一种网络电子游戏），一坐就是整整三天，他一度成了学校电竞界的一朵奇葩。

学校为了阻止Kevin疯玩游戏，甚至用技术方式把他的账号封掉不让他上网，但Kevin得到两位“技术宅”的帮助，把学校的封锁破掉了。

不过现在Kevin已经没有之前玩得那么疯了，现在虽然也玩游戏，但也时不时会出去逛逛，不会一直闷在屋里。过去两年，Kevin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今年开始准备参加高尔夫小组，每周都要去训练。

Kevin身边的中国留学生，每三个男生里最多只有一个爱运动的，两个都是爱玩游戏看动漫的。爱运动的人一般也只是以打篮球为主。中国学生的生活基本上除了上课学习外，就是玩游戏看动漫，再加上一个篮球。Kevin说，“很多中国学生说是在美国上学，只是说在这个环境里上学，并没有真正能融入当地社会。那些平时特别宅的，情商都似乎挺低的。”





← 洛杉矶虐案于2015年6月在加州地方法院开审，截至目前尚未有判决结果。上图为客户最主要被告翟芸瑶在法庭上与其律师商讨案情；下图为翟芸瑶与其男朋友张鑫磊在法庭上对视，后者也是案件的主要被告。根据检方的指控，翟、张二人最高刑罚有可能被判终身监禁。

中国学生去训练一次就累瘫了被抬回来。

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无形的

和别的学生不太一样，Kevin一般更喜欢和比自己年纪大的学长交往，与同龄人则没有太多共同语言，唯一的共同活动就是一起玩电子游戏。他有着同年龄的中国学生所没有的成熟。

他会关心社会与时事，对政治和历史感兴趣，会寻找那些在大陆看不到的东西去了解，也会和其他国家的同学讨论关于中国的话题，这和大部分中国学生对政治的漠然形成鲜明对比。一般的中国男生几乎只有学习、生活，最多再加上篮球，而他还自己计划出行，独自到过欧洲、到中东众多国家旅游，他这些行为对大部分中国初中生而言，可能只是想想也会被家人喝止。

Kevin还只是初中生，但他已经对自己的职业前景有所规划，准备大学时候在美国学习金融，然后到欧洲深造，再在欧洲的美国金融机构工作，最后再回到大陆的金融系统工作。这样的想法显然不无有他从事金融行业的父母对他的影响。

在Kevin看来，并不是因为在外念书，人就一定会变得更成熟起来。相反，缺少家庭的温情和中国式的管控，很多中国孩子在学校里变成宅男宅女，他的不同只是得益于童年时期正确的家庭教育与帮助。他的父母从他很小开始就会给他讲很多中国社会的现实，会让他接触更多的人和事，这让Kevin有了对社会事务的兴趣，在待人接物上也变得更成熟。

“我妈经常给我说，看到一个新闻或一个事，不要听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得自己去想这件事，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报道，有什么可能性在里面，有什么不能说的事情，不是听什么信什么。自己要长个心眼。”

Kevin有个习惯，每年到学长们毕业的时候，他都会请这一批的学长吃顿饭，有次他请到的一个好朋友的室友也是那年毕业。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人却一直旁若无人地看动漫，不搭理别人，等大伙吃完了发现他已经不见了，打电话才知道他已经回房间睡觉去了。

除了大陆学生以外，学校里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来自台湾、香港的学生。相对大陆学生来讲，港台学生更加爱运动，和大陆学生不太一样，他们与大陆学生的交集也不是太多。

课堂之外，学校里的活动有很多，主要是各种兴趣小组。但中国大陆学生一般兴趣不大，基本上是能逃就逃。

沙特克-圣玛丽之前是一所军校，学校也留下了一个“耍花枪”的传统，就是类似军事仪仗队训练，又叫“甩枪队”。出乎意料的是，中国学生对参加“甩枪队”却有着出奇的兴趣，很多中国学生都会积极报名参加，目的在于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免除学校要求学生参加社区义工的义务。不过这个项目对身体要求特别高，一些身体素质不行的



↑ 2013年11月2日，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SAT考试结束后，考生离开考场。SAT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每年的SAT亚洲考试都会有大量中国内地中学生前往香港参考。

Kevin认为，美国老师和中国老师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老师的收入、职务升降和学生的成绩直接挂钩，而美国老师并没有这些，学生成绩最后怎么样和老师的评定没有关系，当然，学生也会对老师上课提供反馈，以保证教学质量。

“在美国，你的老师更像个人，不像个神，会让你觉得他是你的朋友，相互间是平等的，不会比你高很多。我觉得这可能是美国教育最成功的地方。”

洛杉矶施虐同学案件中，同案被告的12人中，其中有个别学生并未参与施虐，只是因为在场目睹，但没有报警而受到指控。Kevin告诉《凤凰周刊》，他所在的中学曾经也发生类似的事情。当时有两个欧美男生带一个女生去开房，另外有一个中国男生看到了，他并没有参与，只是在开房的酒店周

“在美国，老师更像个人，不像个神，会让你觉得他是你的朋友，相互间是平等的，不会比你高很多。我觉得这可能是美国教育最成功的地方。”

围转悠。那个中国男生还拍了照片并上传到一个名为Snapchat的阅后即焚app上。后来事情外泄，那个女生否认自己自愿，指控两个欧美男生强奸。那个中国男生因为知情没有报告老师，也受到了学校的处罚。

对于洛杉矶施虐案，Kevin指出，大多数来美国上学的中国孩子，不管主动还是

被动，都会对美国法律多少学习一些的，那些庭上说自己不知道施虐同学在美国是犯法的人，可能只是装作不知道而已。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由于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没有适当的管控措施，造成这个法律事实上成了“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法”。而在美国，受害方向老师、向学校、向司法机关都有投诉的渠道，施虐的小孩即使自己不受惩罚，他们的父母也会被追究连带责任，这些都是美国制度上的优势。

事实上，洛杉矶施虐案进入司法程序后，一个施暴学生的父亲试图花钱贿赂证人的行为被曝光，这更加充分说明了“孩子某些行为其实只是家长行为的缩影”。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个插曲时，也都喜欢戏谑地加一句：“在中国，校园霸凌事件通常都用钱来帮助解决纠纷”。☪

“降落伞少年”的迷思与反思

对中国大陆学生印象的两极化反映出“降落伞少年”自身素质的参差不齐，如果简单地对他们进行标签化处理，很容易掩盖背后的深层原因。

特派记者 / 李想（发自华盛顿）

“降落伞少年”的称呼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当时主要是指从香港和台湾赴美读书的中学生。香港因为富裕家庭较多，家长也注重孩子的教育，而台湾学生很多是为了躲避兵役。研究这批学生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心理学教授Christy Hom对《凤凰周刊》表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自愿来美国读高中的，很多都住在远房亲戚家，知道父母供他们不容易，所以花钱也都比较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陆“降落伞少年”则有些不同，他们多数没有远房亲戚，而根据美国法律规定，不上寄宿学校的国际学生必须要在当地找寄养家庭。这种情况下，大陆的孩子或需要更长的时间适应，也更容易感到孤独。美国文化注重表达，最受欢迎的又是身材壮硕的橄榄球运动员，这让羞于表达、身材娇小的中国学生刚开始多少会有一些不适应。而且大多数大陆学生又是独生子女，一直是家庭中心的他们在不是焦点之后，又不太懂得如何独立地处理问题和缓解压力。

个案只是问题的集中爆发

Deerfield是美国东北部康乃狄格州的一所寄宿中学，2005—2006学年他们招收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申请不到20份，而6年后的2011—2012学年，他们收到的中国大陆学生入学申请超过200份。根据2014年的数据，加州的私立中学里，15000个国际学生有超过9200个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降落伞少年”。

Hom教授介绍，很多中国孩子刚到美国时正值青春期，本身就对未来和成长充满迷茫。面对陌生的文化，语言不通的他们有了心事不知与谁诉说，有了压力不知向谁哭诉。虽说有寄养家庭或老师帮助孩子适应，但他们很多只关心出勤率和作业完成情况，孩子内心世界那些细腻的变化和不愿分享的挣扎，他们不见得会注意到。有时甚至还会适得其反，有的孩子会因为跟寄养家庭相处不好而成日逃学泡吧。

这种种因素都为“降落伞少年”的健康心理发育埋下隐忧。

除了心理状态让人忧虑，很多“降落伞少年”的奢侈作风也引发争议。美国私立高中费用昂贵，而且很少给国际学生奖学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降落伞少年”家庭环境的优渥。而且多数父母不愿让孩子受委屈，无法亲身照料的他们只好用不停打钱的方式来确保孩子在美国的生活质量。这些学生于是常常被报道出手阔绰，满身名牌。这一系列负面信息都让他们被贴上“任性”、“奢侈”、“败家”等标签。

这些让人忧虑的问题最终集中显现在了今年年初发生在洛杉矶的中国留学

生施虐案中。

被单一化了的“降落伞少年”

封楚诚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政治学硕士一年级，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他就在明尼苏达州的St. John's寄宿学校度过了自己的高中三年。谈起当时来美的选择，他直言是自己的决定，“因为想提前接触美国文化，为大学学社会科学做些语言和学习方式方面的准备”。

2009年来美的他表示那时虽然有花钱大手大脚的中国学生，但总体并不多，绝大多数还是为了寻求更优质的教育。国内很多佼佼者会选择一些老牌的私立学校（例如Philips Exeter、Philips Andover、Groton、Milton Academy），毕业基本都能上到常春藤或者东部其他名校。虽说现在国内高中出国的主力是“富二代”，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很奢侈，不珍惜读书机会。封楚诚坦言，“媒体报道的往往是某一方面的典型，而只看到‘富二代’、乱花钱的中国留学生，有些以偏概全了”。

美国教育基金会的主席林恩成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也表示，洛杉矶施虐案多少也有些被美国媒体拿来渲染的意味。他指出，现在中美关系比较复杂，很多美国居民并不欢迎中国人。只要是几个中国人做错了什么，他们都有可能扩大称“整个群体都有问题”。但是事实上，“每年来美国读中学的中国学生高达三万多，近五年来也只有这一起行为严重的案件，从概率上来说已经很小”。Hom教授也赞同这一说法，“这是个极

与传统“有钱”、“不爱融入社会”的印象不同，林恩成反而认为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很积极，很有素质”。



↑ 2012年5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馆门口等待面签的队列中穿校服的学生。

端案件，之前也有白人做出很恶劣的霸凌行为。因为极端案例就认为‘降落伞少年’缺乏父母关心，心理易患疾病是很武断的说法”。

不是因为出了国才发生问题

与传统“有钱”、“不爱融入社会”的印象不同，林恩成反而认为大多数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很积极，很有素质”。林恩成所在的美国教育基金会是个非营利组织，专门帮助亚洲学生申请美国学校。在接触众多学生之后，他对中国大陆学生的改观最大，“他们很开朗，英语也普遍很好，上课不仅积极提问，许多问题也很有见地”。在被问到中国学生是不是都特别有钱时，林恩成回应，“不是都是‘富二代’，很多家庭也只是普通中产，只是父母很注重子女教育，愿意在这方面多花钱”。

对中国大陆学生印象的两极化反映出“降落伞少年”自身素质的参差不齐，简单地对他们进行标签化处理，很容易掩盖背后的深层原因。诚然，离开父母的青春期少年容易误入歧途，家境不错的他们也容易花钱大手大脚，但这些或许不是孩子最终误入歧途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不少中国家长是因为孩子的资质在国内上不了好大学，才仓促将孩子送出国，这些孩子在国内上不了好的中学，其实在国外同样也申请不到优秀的私立学校，只能去二等的中学。不少学校里，国际学生多，孩子在里面很难真正体验到美国文化，美国的注重自由变成了自由地抽烟酗酒、打架逃学。

某种意义上，在国内没有竞争力的孩子在美国同样也没有发挥余地。而且更糟糕

的是，小孩在国外会面临更多来自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压力，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孩子的发展还不及在国内有父母及时引导来得好。因此，家长在决定是否送小孩出国的时候要理智地判断自己的孩子是否适合美国的教育，而不是单凭他们在国内没有竞争力而仓促送出国。独立性弱、自制力不佳的孩子本身并不适合赴美读中学。如果强行将他们送出去，没有父母监督指导、同伴提携的环境，只会催化他们放纵自己，为所欲为。

林恩成认为，分析“降落伞少年”，不能只把关注点放在他们现有的行为上，而忽略了他们一开始出国的动机是否恰当，孩子本身的性格又是否合适。“如果一开始研究的位置不正确，那结论只会朝错误的方向越飘越远。”

中阿博览会主会场——宁夏国际会堂。

杂志惠
zazhihui.net

银川：向国际化城市迈进

作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核心区，“一带一路”战略重要节点城市，银川近年国际化步伐不断加速，国际范儿日益凸显。

记者/赵福帅

来自约旦的塔里克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并定居银川。在他眼中，银川环境优美、生活舒适，适宜长期居住。

妻子马玉花·索菲亚是一位回族女子，从事阿拉伯语翻译。两人在工作中相识相恋，并于2001年结婚。

塔里克1997年来中国学习汉语，之后在义乌、银川等地工作、做生意，至今已在中国生活了18年。中国很多地方都能看见熟悉的清真寺、宣礼塔以及清真餐馆，让他有宾至如归之感。2012年，他幸运地成为第一个在宁夏拿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

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节点城市，银川地处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越来越多的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到此进行各种商贸活动，有的则像塔里克一样在当地买房定居，娶妻生子。正如中国唐宋时期，大食和波斯商

贾沿着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开始商贸之梦，并最终扎根中国，成为回族先民。

塔里克的贸易公司主要给中东国家来华采购的客商提供后续服务，例如配送翻译，采购、验货、出口等等。伴随银川经济的迅速发展，公司在银川的生意越来越多，塔里克的表弟也从约旦来到中国帮忙打理公司。

“国际范儿”

塔里克只是众多活跃在银川的老外的一个。作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核心区，“一带一路”战略重要节点城市，银川近年国际化步伐不断加速，国际范儿日益凸显。

比如银川接连承办国际赛事。2013年9月，IB-HF（国际绕桶联盟）世界杯马术绕桶赛在银川举办。这是该赛事离开欧美首

次进入亚洲。2014年10月，“WCA世界电子竞技大赛”在银川市开赛，大赛永久会址也落户银川。

如意集团在宁夏生态纺织产业示范园生产所需的棉花从澳大利亚进口，中银绒业、宁夏昊蒙清真食品公司加工原料来自蒙古国，澳洲牛羊肉深加工项目在银川综合保税区签约落地，保税区黄金珠宝项目加工原料来自迪拜……

银川市得天独厚的区位、生态、人文条件使其能够高效地在全球优化要素配置。尤其是作为中国唯一的回族自治区首府城市，银川在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的交往合作中，具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连续3届中阿经贸论坛和2届中阿博览会的成功举办，拓展了银川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交往的渠道，促进了银川外向型经济发展。目

前银川市正着力建设中国与阿拉伯穆斯林地区合作的主枢纽,成为“专而特”的国际商贸、金融、文化、旅游休闲中心。

“早在1000年前的西夏时期,西夏人就大力发展中转贸易、国际贸易,并抽取10%的税,全中国当时最大的马匹交易中心就在宁夏。西夏人那时玩的就是自贸区。”

银川综合保税区经贸发展招商处处长施永浩认为,如果宁夏只向东看,按照传统的发展方式,难以弯道超车。相反,只有向西看,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利用银川位居中国几何中心的独特区位优势,就可以成为连接京津冀、东北亚、中东和欧洲等地的国际物流集散地和分拨中心。

银川市正紧盯“一带一路”战略,依托中阿博览会平台,努力构建开放大通道。重点打造空中、陆上、网上丝绸之路,保障向东出海、向西出境物流大通道互联互通,吸引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向银川聚集。

“两三公里的高速公路,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两三公里的飞机跑道,却能将一个地区和世界连接在一起。”这是中国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常说的一句话。

银川有着独特的空域资源优势。银川毗邻雅布赖国际航路,银川以东、以南地区飞往西亚、中东乃至欧洲的航班,都从银川上空经过。中西部地区乘客经银川飞往阿

据悉,银川国际机场三期扩建正全面展开,工程预计在2016年年底结束。机场扩建完成后,将进一步强化银川作为“一带一路”的战略节点,奠定银川在中国与阿拉伯合作的枢纽地位。

此外,银川还大力发展通航产业。9月27日,银川通用机场正式开航,标志着银川通航产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进入了“通航时代”。此举是银川迎接低空时代到来,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

日益便利的航空条件,使得近年来银川从事经贸、旅游等活动的外国人数量呈现井喷之势,银川的国际化氛围随之不断强化。

今年9月8日,2015年中国·阿拉伯国家旅行商大会上,仅自治区旅游局与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港中旅)、马来西亚纯真(TAHIRA)航空公司签订的银川至吉隆坡航线包机协议,就意味着入境游客每年将增加20万人次。

建设中阿国际结算中心

5月3日,宁夏如意科技时尚产业有限公司进口的一批设备,从鹿特丹港经水路运输至青岛后,通过铁路专列运抵银川。

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模式于5月1日正式运行以来的第一批货物。

银川通过加强与天津、青岛、深圳、郑

如意公司此次进口的设备,共节省通关时间3天以上,节约物流成本12万元以上。

正在进行的银川至西安快速铁路项目,以及包(头)兰(州)线银川至兰州段改造工程等,将实现宁夏与陇海线、兰新线的全面衔接,这将构成宁夏向西开放的“陆上通道”。

据悉,银川正积极布局中欧货运班列运行节点城市。“国际班列开通后,我们比兰州、西安、郑州更有条件把京津冀的制造业,甚至韩日制造业,通过太中银铁路集散到银川来。”施永浩表示。

如果说空中和陆上丝路通道的打通奠定了银川向西开放的领先优势,“网上丝绸之路”建设则使得银川与沿海发达城市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2014年1月,银川市成为大陆12个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城市之一。

目前,银川跨境电子商务以面向阿拉伯及穆斯林地区为主,已经实现了进、出口双向业务正式上线,正积极对接杰贝阿里自由区,通过构筑中阿网络大通道,释放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货物集聚效应,助力银川深度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打造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商品集散和商贸物流主中心。

借助宁夏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政策支持和中阿博览会品牌带动,银川市跨境电子商务以iBi育成中心和银川综合保税区为主要平台,近年呈现指数式增长。

银川iBi育成中心,是包括中阿卫星数据应用产业园、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中阿国际青年梦工厂等核心内容的中阿信息港,借助“天基丝路”通道,促进中阿互联互通。目前,入驻园区的中国、阿拉伯和其他海外企业超过380家,2014年实现网络交易额2890亿元,今年上半年,实现网络交易额1800亿元。

银川综合保税区是银川跨境电商推进的主要平台,综保区紧邻银川河东国际机场,具备开展跨境电商业务所需的海关、检验检疫查验条件和公共服务设施;具备保税等功能政策优势,可进行自贸区政策复制推广。

据悉,在宁夏丝路通公司与迪拜最大的

日益便利的航空条件,使得近年来银川从事经贸、旅游等活动的外国人数量呈现井喷之势,银川的国际化氛围随之不断强化。

拉伯国家,比经京沪能节约20%左右的航班费用,节省时间近5个小时。

“以银川为中心,1800公里为半径,几乎覆盖中国所有省会城市。3000公里为半径,覆盖亚洲大部分重要城市。银川国际机场的时刻资源也比北上广丰富。京津冀地区的航空运输物资,完全可以通过公路集散到银川,再飞往迪拜。”施永浩说。

州及霍尔果斯、二连浩特等9个重要口岸的通关协作,构建多式联运、向西出境、向东出海的国际物流大通道。

企业可以根据物流需求,自由选择空运、铁路、陆路等联运方式,对多式联运途中的货物换装、拆拼作业,不再分别进行报关申报,实行物流全程一次性查验,对换装地不改变施封状态的予以直接放行。

电商平台souq.com合作的基础上,综保区正与杰贝阿里自贸区探讨,将阿方清真认证及海关、检验检疫监管等功能前置到银川,为中国产品出口到阿拉伯国家打开便捷通道。

借助中阿跨境贸易电商平台,银川正迅速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和认证、设计、研发、制造、商贸中心。

通道与物流畅通后,银川更大的雄心是建设中阿国际结算中心,推进人民币在对阿经贸投资中的国际化,最终构建迪拜式的世界穆斯林金融中心。

国际医疗之城

你或许不敢相信,有韩国患者放弃在韩国三星医院的治疗,不远万里来到银川做高难度心脏手术。这只是银川市近年发展国际医疗旅游业的一个侧影。

2011年11月,俄罗斯企业家雷萨科·根纳基·伊万诺维奇应银川市委、市政府邀请前来考察,此行达成了雷萨科在银川进行国际医疗投资合作的初步意向。

在银川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下,银川市卫计委与俄罗斯、韩国方面达成三方医疗卫生合作协议,确定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为平台,在俄、韩支持下开展心脏外科手

术。这成为银川市医疗卫生加强对外开放的标志之举。

2013年11月,“银川卡瓦心脏中心”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依托公立医院而设立的中外合资合作机构,也是大陆医疗改革的重要事件。

卡瓦中心采用俄罗斯出资金、韩国宋明根教授团队负责技术支持、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提供场地、人员、设备的三方合作模式运营。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开放床位30张,配备国际一流的诊疗设备、手术室。宋明根教授是国际顶级心脏外科专家,其独创的“卡瓦手术”享誉全球,对心脏多瓣膜病变的手术国际领先。现在,他每月有一周时间在银川做高难度的心脏手术。常年有来自欧洲和北京等地的手术团队,完成各级各类心脏手术。

雷萨科介绍,中心已成功实施280余例高难度心脏手术,复杂的多瓣膜病变联合手术占80%,其中20余例患者使用冷消融技术治疗房颤合并瓣膜病变,开创了先河,在国际属领先水平。手术死亡率仅1.3%,而欧洲医院最好的也在3%。

银川卡瓦中心的高技术水准吸引了大批上海、黑龙江、山东、甘肃、陕西、河南等地患者前来就医,甚至一些韩国患者也前来做手术。据测算,在韩国做一台心脏手术

的价格是9万-12万美元,在银川做同样一台手术的费用是2万-3万美元。

据悉,卡瓦中心正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塞尔维亚等国的医院或医疗旅游公司商洽合作,比如开设体检诊断中心、提供治疗意见、引进国外患者来银川手术、培训当地医生等。

事实上卡瓦中心一直在培养来自中国各省区的本土医生。起初,宋明根教授韩国团队需要十人。而现在,本土团队逐渐成熟,宋明根教授只需要带两名韩国助手。

“虽然卡瓦技术源自韩国,但未来我们会把全球总部放在银川,因为中国与中东、中亚的需求庞大。”宋明根说。

事实上,发展国际医疗旅游是银川市的重要战略方向。银川的优势也非常明显,一流的人居环境、旅游资源丰富、特产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医疗成本低,使其成为全球高端医疗产业转移集聚的理想之地。

借助“一带一路”战略规划,银川市在医疗领域正全面接轨国际,市属多家医院先后与韩国、美国、沙特阿拉伯等国的美容整形、口腔等医疗团队、机构及院校开展合作。

在银川,公立医院合作办医已渐成趋势。比如银川市口腔医院与华盛顿大学口腔医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儿童医院、罗切斯特大学伊斯曼牙科学院等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国际会诊绿色通道和教学研究中心,设置专门的国际国内知名专家坐诊。

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则是向外输出本土回医技术。

2014年9月,沙特患者51岁的阿克拉姆因结石伴输尿管结石来到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回医药脑病科寻求帮助,医生采用回医药放血和制剂疗法,成功对其进行诊疗,6天后患者康复出院。

回医药学是中国回族在继承古代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学的基础上,汲取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精髓形成的。然而目前阿拉伯国家受到西医冲击,在回医药学领域并不突出。中阿博览会的召开,为回医药学走向世界搭建了新的窗口。



银川卡瓦心脏中心手术团队正在进行心脏手术。



2013年9月，IB-HF世界杯马术绕桶赛在银川举办。

回医药脑病科2014年与沙特皇家医学院达成长久合作意向，向沙特患者提供回医药特色诊疗方案，尤其是将中国专利技术回医药药氧技术及回医药滴鼻技术向国际推广，同时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回医药汤瓶八诊技术在临床教学中推广。

据悉，2013年9月开工的银川滨河新区国际医疗城项目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将引进国际一流专家及医疗技术，与世界领先的医疗机构及团队开展广泛合作，搭建国际化医疗服务平台，着力打造集医疗康体、养老养生、美容整形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国际医疗城，加快银川医疗国际化进程。

外企涌聚银川

2015年9月10日-13日，中阿博览会在宁夏银川成功举办。约旦国王、毛里塔尼亚总统等中外领导人，83位中外部长级官员，东盟等86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投资机构代表，17个国家和1个国际组织的30名驻华外交官，93家中外大型商协会、282位大型企业及金融机构高管，近万名嘉宾参会参展。

据统计，本届博览会期间，签约项目共计163个，投资金额1712亿元人民币，其中银川市签订项目40个，投资金额333.05亿元。之前的3届中阿论坛及2013年首届中阿博览会，银川市共签约项目120个，签约总金额2045.86亿元，其中合同项目51个，签约总金额913.93亿元。

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银川已经成为中国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间进行政治对话、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的综合性平台，全球高端生产要素纷纷涌入银川这个曾经的边陲城市。

法国酩悦轩尼诗集团投资的高档起泡葡萄酒项目；泰国正大集团投资的年产30万吨饲料深加工项目；澳洲清真牛羊肉深加工项目等纷纷落户银川。投资国别有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香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领域涉及机械制造、太阳能、农产品、污水处理、葡萄酒、种植、化工及节能等行业。截至2015年8月境外投资项目到位资金比2010年增长375%。

宁夏驻马来西亚经贸联络处主任塞丽

麦·纳惠萍可以说是银川崛起为特色国际经贸中心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2010年，塞丽麦被自治区商务厅派驻到马来西亚，负责中国企业与马来西亚企业的合作对接、商品落地等服务。

塞丽麦介绍，在9月的中阿博览会上，马来西亚官方与多家企业观摩展示中心与综合保税区后，当即提出今年11月将组织500家企业的产品依次落户银川，进行推广和销售。

下一步，塞丽麦的任务是帮助宁夏和中国的清真企业走出去。“因为有了中阿博览会，外商落地宁夏以后，全国的穆斯林企业都到我们这来找商机。宁夏已经成为全国穆斯林企业通往阿拉伯国家的桥头堡了。”

据介绍，她们刚刚帮助浙江金华的一家清真味精企业来宁夏打市场，再借助宁夏走出去。“现在可以跨区域通关，就是在银川接单子，款汇到后，异地就出关了，根本不用把货运到银川。银川真正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

屠呦呦： 我与青蒿素有不解之缘

特约撰稿 / 孟繁勇



2015年10月7日，北京，中国首获诺贝尔医学奖的药学家屠呦呦在家中接受媒体采访。

10月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琳医学院诺贝尔大厅，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与威廉·坎贝尔、大村智共同获此奖项。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

诺贝尔奖评选委员对屠呦呦获奖的评价是，“由寄生虫引发的疾病困扰了人类几千年，构成重大的全球性健康问题。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应用在治疗中，使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降低。”由此，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中国女科学家。

第二天，在北京市东四环附近的一个普通小区里，围聚了许多来祝贺的人群，小区门口设置保安维持秩序，以至于屠呦呦所居住的楼前排起长队。已有85岁高龄的屠呦呦说：“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

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

求学岁月

1930年12月30日，屠呦呦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屠家5个孩子，4个男孩，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屠父爱惜之情自在情理之中，取名之时，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之句，取“呦呦”两字，意为鹿鸣之声。后来，在屠呦呦编著的《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中，第一页就是“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蒿”即为青蒿。研究青蒿素一辈子的屠呦呦曾“开玩笑”说：“从我的名字上，就仿佛注定了与青蒿有不解之缘。”

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26号，是屠呦呦的外婆家所在地，她从小就住在外婆家，

直至长大。1948年，屠呦呦入读宁波效实中学，这是一所私立学校，她在此度过了高一、高二时光，学号为A342。这所学校至今仍然保留着屠呦呦的学籍册和成绩单，成绩单上有90多分的，也有60多分的，某种程度上而言，屠的高中时代学习并非突出。

其后，因效实中学学费昂贵，受此所限，戴着眼镜、梳麻花辫的屠呦呦在高三时，转学至公立学校宁波中学。宁波中学的徐老师谈道对屠呦呦那时的印象：并不是很活跃，话不多，总是在很认真地读书。在班上经常上完课就直接回到家中，并不爱参加娱乐活动。

转入新学校初始，屠呦呦学习成绩仍在中上游。屠的宁波中学同学翁郢康回忆，那时的屠呦呦很普通，穿着朴素的衣服，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属于默默无闻型。但屠呦呦给同学们留下的深刻记忆是“只要她喜欢的事情，就会努力去做。”

或许正因如此，屠呦呦后来在高三时急起直追，学习成绩突飞猛进，并在1951年顺利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后改名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屠呦呦在谈起此事时非常感慨，作为一个女孩儿，在当时能够考入大学就读，是非常幸运的事情。

药学系专业繁多，屠呦呦对植物化学、本草学和植物分类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她选择了生物药学，这是在当时较为偏门的专业。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到卫生部直属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从事生药、炮制入化学等中药研究。



1959年到1962年,屠呦呦参加了为有西医背景的医生准备的中医培训班,这就是卫生部举办的为期两年半的“全国第三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毕业之后,成为中西医药学兼通的医药化学工作者,也为她在以后的日子里发现青蒿素,开启了一扇当时她还不知道的专业大门。

国家任务

上世纪60年代初,美越交战。美国政府当时称,仅在1967—1970年期间,在越美军因疟疾减员达万人之多。为此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最终也未找到抗疟新药。与此同时,疟疾同样困扰越军,不同于美国自行研发,越南向中国提出请求,帮助越南解决因疟疾造成的队伍大量减员问题。

面对越南方面的请求,毛泽东作出指示,“把解决热带地区部队遭受疟疾侵害,严重影响部队战斗力,影响军事行动的问题,作为一项紧急援外、战备重要任务立项。”周恩来随即下令,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研制“抗美援朝”的抗疟新药。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召开了“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由于是涉及到越南战争的紧急军工项目,为保密原因以开会日期命名,于是,“5·23”就成了当时研发防治疟疾新药项目的代号。

中国为此投入巨大,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抽调全国60多个单位、超过500多名科研人员,开始研发抗疟新药。涉及中药部分的研究小组,尝试包括常山、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上万种中药,但均未能对疟疾有效。

屠呦呦此时因“有海外关系,不能参与中央布置的军工项目”。这时多亏了北京广安门医院里的一位参与“5·23”项目的医生,这位医生向“5·23办公室”负责人推荐说:“中医研究院的屠呦呦是个兼通中西医的人才,研发新药应当去找她。”“5·23办公室”正、副两位主任立刻前往中医研究

院,政审之后发现,屠呦呦因在研究上有两项创新成果,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又因抗疟久久没有进展,这才抛开她的“海外关系”问题,决定起用屠呦呦。

1969年,39岁的屠呦呦接到命令,以中医研究院抗疟药科研组组长的身份加入“5·23”项目。她说:“交给你任务,对我们来说,就努力工作,把国家任务完成。只要有任务,孩子一扔,就走了。”

进入课题组之后,上级分配给屠呦呦两个任务,一、寻找新药。二、在中药常山碱上做文章,想办法去掉常山碱的毒性,解决服后呕吐的问题。之前的课题组的研发并未取得有效进展,也使得屠呦呦在进入课题组后,重新思索。她首先做的是走访老中医,并整理古代医学典籍,最终获得了640方中药抗疟单验方。

在组织鼠疟筛选抗疟药物时,200多种中药的380多个提取物对抗疟效果有限。实验几乎陷入停滞,为何历代名医称道的好药,今天却无明显疗效?为解决心中疑惑,她开始重读一本本中医古籍。屠呦呦后来回忆此事时说,“我就系统地查阅古代文献,我在《肘后备急方》看到有这么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用水泡了以后把汁挤出来,从这里我就得到灵感。重新思考提取方法。”

屠呦呦将实验对象锁定在青蒿上,但多次实验下来,仍然不能达到理想状态。她

“

在经过了那么多次的失败之后,当时自己都怀疑路子是不是走对了,当发现青蒿素正是疟疾克星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是难以表述的。

”

觉得,问题可能出现在“水煎”法,高温有可能会破坏青蒿中的有效成分。随后,屠采取了用沸点只有35℃的乙醚来提取青蒿的实验。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买几个大缸,先将青蒿洗干净,然后泡一段时间,再将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事实也证明只有新鲜的叶子里含有抗疟活性成分。

1971年10月4日,这是一个屠呦呦至今仍然记忆犹新的日子,这一天,屠呦呦的课题组在第191次低沸点实验中,发现了抗疟效果为100%的青蒿提取物,该样品对鼠疟、猴疟原虫的抑制率为100%。

无数次失败后的成功,让屠呦呦领导的课题组所有成员都非常兴奋,她回忆当时场景:“在经过了那么多次的失败之后,当时自己都怀疑路子是不是走对了,当发现青蒿素正是疟疾克星的时候,那种激动的心情也是难以表述的。”

以身试药

1972年3月8日,屠呦呦在南京召开的“5·23”项目抗疟药内部会议上,作为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代表,发表了以“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中草药”为题的报告,主要涉及到被称为“191”的中性提取物抗疟效果良好的内容,引起与会者极大关注。随后,她去往“5·23”办公室汇报,上级一听非常高兴,并指令屠呦呦尽快进行临床工作。

临床工作需要将药用于人体,屠呦呦却遇到了蹊跷之事。她的实验室莫名失火,许多设备被烧毁。随后有人贴出大字报,矛头直指屠呦呦,认为她的实验工艺有问题,青蒿提取物有毒,不可用于人类。更发生了为证实屠所提取的药物有毒,将不知名的东西拿给动物吃,并故意让军代表看到食用之后动物不良反应的模样。

可以想象,屠呦呦在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发生上述事端后,背负的巨大压力,非寻常人所能体会。但她并没有放弃,而是直接找到上级说:“有毒?好,我亲身验毒,后果自负。但条件是:一旦证明此药

无毒，临床的事情领导必须立即放行，否则就过了当年疟疾发病的季节。”她又给领导写报告，愿意亲自试服，做探路工作。上级最终同意了，她住进了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以身试药。屠呦呦的举动，也使得其他两名同事一起向上级提出以身试药的请求，与屠呦呦成为“病友”。

在青蒿素动物实验时，曾出现一过性转氨酶升高等现象，那么在人体实验中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研制过程中，屠及同事们先后都得了中毒性肝炎，体质一直较差，肝功能曾经坏到蛋白倒置，满口牙痛，甚至松动脱落。谈及为什么选择以身试药，屠呦呦说：“当时动物试验过了，药走不出去，发病季节就过了，那就耽误一年。”

值得欣慰的是，屠呦呦及同事在试药之后安然无恙，没有人再质疑了，上级终于批准新药临床。不久之后，她带着青蒿素来到海南的疟区，并在海南昌江人民医院进行了半年多的临床试验观察。当年包括屠在内，也有其他人在海南疟区做抗疟临床试验，但只有青蒿素的抗疟效果最佳。当年8月至10月期间，屠呦呦利用青蒿素在昌江地区对当地外来人口治疗间日疟11例，恶性疟9例，混合感染疟1例，疗效明显，其中间日疟平均退热时间为19小时6分。

蔡贤铮就是在此时期与屠呦呦相襄，他在回忆此事时说：“屠呦呦在海南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大约有半年多时间，做了30例临床疟疾病例的实验后，她回到了北京。”在海南的时间虽短，但屠呦呦的临床获得了极大成功，并逐步完善了青蒿在治疗疟疾，尤其是治疗恶性疟的配伍，并逐步发展为青蒿素联用其他药，使疟疾的复燃率降至最低。

屠呦呦在青蒿素发现的关键作用，是她提出了用乙醚提取青蒿中有效成分的方法。之前研究人员所使用的水煮法和乙醇提取都效果低且不稳定，而屠呦呦打破了提取青蒿中抗疟有效成分的瓶颈，并在公开会议上报告。之后，屠呦呦小组的钟裕蓉



2015年10月5日，瑞典斯德哥尔摩，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科学家大村智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了该奖项。

分离提化到了青蒿素的晶体，对确定分子式、晶体结构起到重要作用。并于1984年，终于实现了青蒿素的人工合成。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的统计数据，世界上约有2.5亿人感染疟疾，将近100万人因感染疟原虫而死亡，如果没有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那么2.5亿疟疾感染者中将有更多的人无法幸存下来。这一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国家任务，屠呦呦所带领的团队，将其转化为对抗疾病的武器，拯救了无数生命。

获奖争议

屠呦呦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需要感谢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他自2010年开始，每年都会向诺奖评委会推荐屠呦呦。正是他多次向诺奖委员会推荐屠的科研成果，才最终使得诺奖委员会注意到中国一个名叫屠呦呦的女科学家。

米勒第一次听说屠的名字，是在2007年，当时他来到上海参加一个疟疾与传染媒介会议。米勒问在场的同行：“谁知道青蒿素到底是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但在场的人都不清楚，一个叫苏新专的华人科学家告诉他说，是屠呦呦。随后，在2010

年，米勒向诺奖委员会推荐了屠呦呦，同时推荐了拉斯克奖。2011年，屠获得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时说：

“人类药学史上，像青蒿素这种缓解了数亿人的疼痛和压力、挽救了上百个国家数百万患者生命的科学发现，并不常有。”

米勒和苏新专为配合拉斯克奖，写了一篇介绍屠呦呦的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发表在著名的《细胞》杂志上。其中写道：“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我们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药研究所（中药所）的屠呦呦教授是发现青蒿素的首要贡献者。”

文章的发表，也使得欧美科学界开始关注屠呦呦及她的发现。终于在2015年，屠呦呦接到了来自诺贝尔评委会的电话，祝贺她获得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当晚，她一夜未眠。

一项带有特殊历史背景的科研成果，是否应该由屠呦呦以个人的名义获得诺奖，这也是外界存在的较大争议。事实上，青蒿素自问世之后，获得了诸多荣誉，与此相伴的争议正是荣誉该归屠呦呦个人还是集体。比如说，1978年，青蒿素抗疟研究获得



中国药学家屠呦呦正在实验室工作。

了“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但并无发现者的名字出现，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由此，青蒿素研究被认为是协作攻关的集体成果。

2009年，《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由屠呦呦编写出版，之后便被外界批评为“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批评者指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指责她“不够淡泊名利”。有人指其贪天之功为己有，也有人指其压制他人。屠本人当时对此以沉默回应，并无过多解释。

不久之后，在2011年，屠呦呦以青蒿素的发现成果获得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并以个人身份获奖，在科学界引发巨大争议。当时便有人提出青蒿素的发现属于集体成果。《科学》杂志也曾报道，认为“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了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的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为此，拉斯克评奖委员会解释说，拉斯克奖的设立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发现的发现者。之所以把奖杯颁给屠呦呦，所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

“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

此次屠呦呦获得影响巨大的诺奖，外界再次聚焦究竟青蒿素的发现是个人还是集体的成果争议。但这次屠呦呦没有再沉默，在对外界发表获奖感言之时，屠呦呦特意强调了集体团队的贡献。她说：“我想作为科学工作者，得到诺贝尔奖是一个很大的荣誉。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研制成功，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攻关的成绩。青蒿素的获奖，是中国科学家群体的荣誉。”

家庭温暖

当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屠呦呦获得诺奖这件事情上时，有一个人默默地帮她接待来访者，看到屠呦呦在连续的媒体采访中疲惫的模样，他也默默地将水递到屠呦呦的手中。这就是屠呦呦的爱人李廷钊，结婚50多年以来，无论风雨，相濡以沫，他都陪伴在她的身边。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老乡，同是宁波人，也是高中同学。屠呦呦去北京上大学之时，他则去往苏联留学，专注于冶金研究，学成归国来到北京，机缘巧合之下遇到屠呦呦。几经接触下来，知道屠当时还未曾有对象，

便鼓足勇气向她大胆求爱。1963年，两个人组成了幸福的家庭。

结婚之后，很快家庭便增添了新成员：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儿。当时屠呦呦受国家的召唤进入“5·23”项目组，一时工作繁重，比如买菜、做饭等家务便顾不上了，李廷钊便默默地主动承担了更多的照顾家庭的责任。而当屠呦呦以身试药之时，李本人也在坚定的支持爱人，并为了她服下药物，把自己当成对方事业的“试验品”。工作上支持，生活上照顾，使得屠呦呦并没有分心，可以集中精力做实验，某种程度上，发现青蒿素，其中也有李廷钊的功劳。谈起丈夫，屠呦呦说：“别人还以为我有生活秘书，其实他就是我的‘秘书’。”

虽然退休了，但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85岁的屠呦呦依旧坚持研究工作。年纪大了耳朵不好，她戴上助听器，身体不好，坐得久了会累，她便在床上阅读关于青蒿素的相关科研著作，偶有灵感，也在床上写下来。屠呦呦经常说，在青蒿素的药物研究上做了一辈子，非常希望它能够物尽其用。她说：“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弄懂青蒿素其中的机理，我搞不动了，但是还有人在搞，这个环节只要再弄清楚一点，药品还可以发展。”

获得诺奖之后，外界最感兴趣的则是她的心愿是什么？屠呦呦的回答很淳朴，最大心愿就是希望形成一个新的激励机制。她说：“希望年轻同志发挥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实力，形成新的激励机制，这是我的心愿。”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青春燃沸南京

记者/茶峒 隋淙淙

9月26日至9月28日，首届“南京青年文化周”在南京燃情三日。

这三天，十足一场全球青年的文化体育盛宴，太多国际大咖，太多分享感悟，太多创意活动，太多感人瞬间，“中国梦、世界梦、青春梦”交相辉映。

南京为全球青年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交流的平台，而活力青春也将南京这座城市再度点亮、燃沸。

放肆、澎湃、狠狠爱

“这座城市，热情似火，青春澎湃，青奥精神永不落幕。”作为南京青年文化周主论坛的主持人，凤凰卫视名嘴胡一虎说。

1年前，2014年08月16日，香港凤凰卫视演播室，正是胡一虎播送了南京青奥会的开幕式的新闻，青奥会上的青春闪亮让他印象深刻，当时他就好奇，为什么青奥会带给南京这么高的一个正能量？他想去南京看看。

2015年9月26日，他实现了这个愿望。南京青年文化周——2014南京青年奥运会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之一，让胡一虎亲眼见识到，“青年，是世界的希望，是今天南京的主角。”

青年文化周开幕当晚的青年励志演出“我们正青春”，3000多名中外青年齐聚五台山体育馆，尤其将这股“青春澎湃”推向了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小高潮。

这里有不同肤色的青春故事。

在演出现场，嘉宾之一法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现场采访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代表们，问他们对于青春的看法。回答五彩缤纷。“青春是一道很难的数学题，不断折磨自己，最后无论对错，总有一个属于你的答案。”这是一位韩国青



年的现身说法：“青春是我们最傻的时期，傻才敢于冲动奋斗，傻才敢于做我们长大后不敢做的事情。”这个认真的回答来自一位俄罗斯青年；更有一位德国青年逗趣地说，“青春就是我们曾经追过的女孩，虽然没有追到，但是我们不后悔。”

还有体育精神的互动交流，体育精神正是南京青年文化周诞生的溯源。

受邀参加青年文化周的前世界冠军、百米飞人莫里斯·格林也惊艳亮相，他与来自乌克兰的安娜表演了《摇滚之钟》，格林的矫健身手，引得舞台下尖叫连连。

其实，早在演出两天前，格林就已引发了一波小热潮了。一到南京，他就马不停蹄先专程造访了南京体院，进行了一番现场训练指导。在演出现场，格林直抒胸臆：“青少年一定要参与体育运动，因为这会让你的人生体验更加完美，体育教会你在所有的环境里去如何应对困难，在压力下如何应对……也能让年轻人更加相信自己。”

更有出其不意的爱的表达。

在一曲《我爱你中国》歌曲后，香港杰出青年代表霍启刚温文尔雅地步上舞台，除了讲述自己与体育的故事，以及他与南京这座城市的情感之外，他更向自己的太太——奥运冠军郭晶晶隔空“表白”：“11年前的今天（2004年9月26日）我认识了郭晶晶，并且开始追求她，这么多年来我们一起经历很多，体育对于我的意义更丰富也更重要。”

台上台下的坦诚互动，让现场的年轻人看得新潮澎湃。南京一所高校的大二学生说，“看到这么多激情澎湃的励志演出，真的感觉我们正青春，青春正飞扬，一定要好好珍惜现在的时光。”一位专程从常州赶来看晚会的年轻人，总觉得自己被南京召唤，他极其认同演出中世界青年对“青春”的解读，“放肆吃放肆玩，努力学习，狠狠爱，总而言之不要浪费！”

一场演出成了某种掷地有声的青春宣言。而这样的激情宣言贯穿整个青年文化周全程。

青春对话青春

台下是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庞，台上是一个个历经风雨的大咖——南京青年文化周的一个特别设计是，紧紧围绕“文化、体育、和平”，1个主论坛和文化、和平、公益、创业、体育5个分论坛同时展开。

祖籍南京溧水、62岁的濮存昕依然不服老。在主论坛“建设世界，青年行动起来”上，他幽默地说，按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下都是青年人。“年轻热情、好奇、上进，充满创造力，符合这些特质就永远是个年轻人。”他将人的一生比作长江之水，“现在流到南京，就好像我现在的岁数，再往前就到了吴淞口，但我还想转转，想做年轻人。”

聊起年轻人的担当，濮存昕有一说一，“青年人，你们应该有所担当了，人类地球

的发展、环境是一个大个体，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青年一代保护好我们的自然环境，就是对世界的担当；还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要交给你们去传承和保护。”

定居南京、深爱南京的作家毕飞宇，在“文化引领青年成长”分论坛上，如此诠释他对世界的理解：“世界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她的丰富多彩。如果有一天，世界变成了一团的乌鸦或一团麻雀，相信大家难以接受，一定会进行反抗。”毕飞宇的孩子曾向他抱怨，这个世界文化差异太大，他耐心解释，“这恰恰是种幸福，因为有文化差异，才需要交流。每一种文化之间有着一种柔软、有弹性的物质，这种物质就是爱和尊敬。”

公益分论坛，“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讲述了他作为曾经的慈善“门外汉”，如何一步一步地“逼”着自己摸索到了方向；体育分论坛，奥运冠军仲满坦言北京奥运会前的挫折，以及不轻易放弃，终于在北京奥运积分赛前，找到了自己；创业分论坛，去年刚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途牛旅游网联合创始人于敦德建议年轻人在走上创业路之前，不妨先去一些成功的创业型公司学习经验，省省学费。

尤其让现场年轻人共鸣极大的，是瑞典音乐家协会成员、瑞典青年盲人协会董事吴晶的发言，这位与南京渊源深厚的盲人青年，一番发言让人感触万千，“正是体育和奥运的精神，让我能够以一个盲人完成在

普通学校中的学业；更是因为爱的力量，让我能够做到现在的这一切，让我能够在世界各地穿梭。”

更有国际大师赋予青年的谆谆教诲——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鼓励现场青年人把握现在的自由际遇，“当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有一天人们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用电脑来联系，以光电的速度获取信息，用手机拍照……你们这一代人一定明白，在今日世界，一切都是相连的。”英国考文垂大学信任、和平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心教授艾伦·亨特，基于未来中国的巨大潜力，建议时下中国青年人应该花一两年时间去世界的其它地方走一走、看一看。

……一场青春与青春的对话，实打实，不做虚言。

体育、文化、和平

本届南京青年文化周的LOGO设计轻巧、别致——主色包括荧光绿和城墙灰、由3个大写字母Y组成的LOGO，像极了一棵不断向上生长的南京梧桐树。荧光绿代表青年的激扬活力，城墙灰则直指南京印满历史的城墙；交叠在一起的Y象征南京青年文化周的3个主题：“体育、文化与和平”。

南京青年文化周的子活动数量类型都丰沛之极，“守艺新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2015南京国际青年艺术双年展、中外民

间体育嘉年华、citywalks读城（青年用脚步丈量城市文脉）等等文化、体育类活动之外，和平类主题的子活动，颇让这届青年文化周显得格局不同。

9月28日晚在中山陵音乐台举行的《和平之声》专场音乐会，是2015南京青年文化周“和平板块”的重点活动项目。音乐会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背景，由细腻、诚挚的3个乐章和120名演员联袂演奏，表达出追求和平的心愿。

第一篇章，室内乐《南京组曲》，取自澳大利亚反战电影纪录片《生铁咆哮：1938年达尔富拉姆事件》主题音乐——1938年，澳洲码头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冒着失业和坐牢的风险，拒绝对运往日本的轮船装载战争物资；第二篇章，民族管弦乐《凤凰涅槃》，是澳大利亚著名作曲家朱迪·斯塔布创作的，

“在中国和西方的神话中，凤凰都十分的重要，凤凰作为一种象征，可以将两种文化链接在一起。”她的灵感直接来自南京的战后新生；第三篇章，民族交响音诗《和平颂》，由赵季平的大型民族交响乐作品《和平颂》的第五乐章与李朝润的同名诗作共同构成。

呼唤和平，讨论和平，让青年文化周并不止步于一场青春盛会。

在“维护和平：青年担当中坚力量”分论坛现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成与德国费希塔大学教授埃贡·施皮格尔合作完成的《全球化世界的和平建设——图解和平》一书的发布让人关注。施皮格尔见证了德国对历史从逃避到正视再到反思的过程。“德国花费了30年时间还原真实历史，最终敢于正视历史，反思历史，这一切的基础在于寻找历史的真相。”而人类该如何维护和平？澳大利亚纪录片导演桑德拉·佩雷斯说：“每一个人的努力都会对世界和平有所影响。”

作为2014南京青年奥运会的重要精神文化遗产之一，2015年南京青年文化周圆满完成了它的使命——延续了青奥精神，给青年人搭建了一个平等对话和交流的平台，给南京注满了青春活力。



在中山陵音乐台举办的“和平之声”专场音乐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2日召开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建议稿提请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

正在起草的“十三五”规划是习近平主政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收官规划，还是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第二个35年的规划，其对中国将具有特殊意义。《凤凰周刊》在近期，就“十三五”规划编制的重大问题采访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并根据其授权将采访内容整理成以下文章。

就业应作为“十三五”首要目标

文/宋晓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贸易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这四大目标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应当有所侧重。

“十三五”(2015-2020年)

将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建议用就业替代GDP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不要再在7%上做文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

把经济增长(GDP指标)作为首要目标，这在物质财富十分匮乏的国情下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应看到，GDP指标是有内在缺陷的。审视当下中国面

临的突出经济和社会问题，有许多正是GDP指标的缺陷造成的。它不能反映投资的效益和结构的优劣，也难以反映收入分配状况和资源环境代价。

第一，中国每万元GDP的能

源消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是美欧等发达国家的三倍左右,是日本的四倍以上。

第二,环境污染。典型的例子是雾霾,河北省的年钢产量将近3亿吨,超过美、日、韩的总和。北京人患肺癌的人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增长了4.6倍,钟南山说近10年增长60%。

第三,投资效益不断下降。一些研究证明,一元社会融资量,2005年至2008年可带动4元GDP,2012年只能带动1.93元。新增一元GDP所对应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002年为1.78元、2008年6元左右、2012年8元以上,10年间投资的宏观效益下降近80%。

第四,这种GDP的高速增长是以过分压低劳动力成本来实现的,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大量产生。《21世纪资本论》说美国1%的家庭占有美国20%的社会财富,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说中国1%的精英家庭占有30%的社会财富。

第五,国民财富增长远低于GDP增长。比如河北压缩产能,拆掉一家大型水泥厂,恢复到建厂之前的绿地。建水泥厂是GDP,拆水泥厂也是GDP,但最后留下的还是原来那块地。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到2005年的中国人均GDP增长了54%,而人均国民财富只增长了34%。

GDP指标存在的缺陷原本可以在实际工作中加以适当修正和补充,遗憾的是在前阶段激烈

所谓 GDP 增长 8% 或 7% 才能保就业的“共识”,根本没有经济理论的支撑,也得不到经济史的验证,那只不过是前阶段粗放式增长模式的弊端。



宋晓梧

的地方GDP竞争中却被放大了。

中国经济已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阶段。所以能不能淡化GDP指标,少在论证8%、7%、6%上做文章,能不能转到投资效益、能源消耗、环境改善、公平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方面多下些功夫?如果这些方面得到改善,GDP增速5%、6%又怎样呢?

以就业考核为主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调整产业及技术结构、消化长期积累的过剩产能进入加速期,结构性就业问题十分凸显。因此,在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应明确把促进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这有利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

有人可能质疑,当前中国老龄化加快,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在减少,连农民工的增量也在减少,就业还是突出问题吗?

其实,就业不仅有总量问题,还有就业结构、就业质量、

就业保障等问题。

从就业总量看,要让近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市民化,大量农村转移人口真正成为市民,必须以相应的就业岗位为支撑。当前急需大力发展就业弹性高的第三产业和中小微企业。

从优化就业结构看,急需打破各类行政性分割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阻碍,特别需要下大力气解决过剩产能行业职工再就业和大学生群体的初次就业问题。

从提高就业质量看,急需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建立合理的薪酬制度,同时高度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职业培训,提高就业者技能,促进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从构建就业保障看,急需完善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及失业保险制度,解除就业者的后顾之忧。

可见,就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家事、国事、天下事。新的发展路径应当以增加就业为主要调控目标。这样做,地方政

府不是工作没抓手了,而是工作视野更开阔、更贴近民生了。

当然,这绝不是简单以失业率取代GDP增长率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更不能说是为了保就业就要保GDP,转来转去又变成了GDP第一。所谓GDP增长8%或7%才能保就业的“共识”,根本没有经济理论的支撑,也得不到经济史的验证,那只不过是前阶段粗放式增长模式的弊端。在具体工作中,很重要的是完善统计调查,真实反映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的变动情况,绝不允许虚报瞒报。那种“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积弊,必须坚决铲除。

至于GDP,依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宏观调控指标,因为增加就业本身就要求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合理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

关键是,工作的出发点不一样,最终结局就会有很大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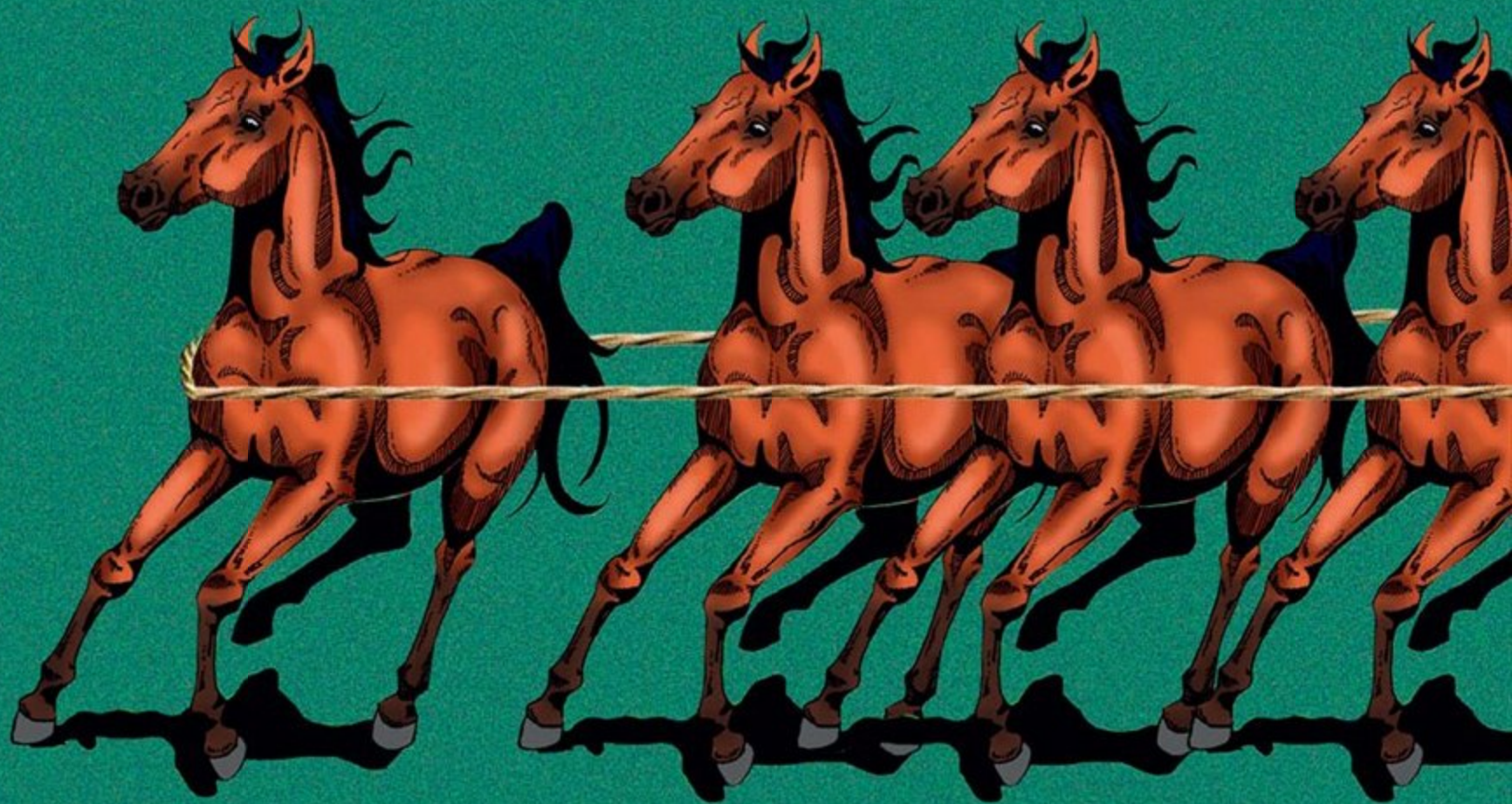
(记者赵福帅采访整理。)

□ 编辑 王华强 □ 美编 虎妹

受制传统银行 民营银行发展遇阻

9月29日，大陆首批五家民营银行获准筹建一周年，市场期望的颠覆传统、大展拳脚并未上演，相反，因传统银行的掣肘，初入的不适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

文 / 曹蓓



最后一个到任，第一个离开，9月，前海微众银行行长曹彤被媒体爆出在任职不满一年即已离职。

前海微众银行是大陆首家开业的民营银行，也是大陆第一家营业的互联网银行，其大股东为互联网巨头腾讯。微众银行与稍后开业的以阿里巴巴为大股东的浙江网商银行，是大陆目前仅有的两家互联网银行，被寄予打破银行业垄断以及开拓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厚望，因而一举一动均备受各界关注。

就在此消息传出的前几天，招商银行终止了与微众银行的一项合作，导致持有招商银行借记卡的用户无法在微众银行APP上绑卡开户。

接连的消息，似乎让市场对民营银行积蓄的情绪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对微众的质疑似乎盖过了此前所有的正面消息。

“这些都是必经的阵痛。”匿名民营银行人士称。“微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并没有经历什么坎坷。现在的问题，迟早要面对。”

有猜测称，微众银行的股东方腾讯或会出面协调与招行的“摩擦”，但微众内部人士对《凤凰周刊》称，“对此并不知情。”

2014年7月，中国银监会陆续批准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上海华瑞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五家民营银行。当年9月，五家民营银行全部获准筹建。

时至今日，五家民营银行已满周岁，但其在业务上尚未出现市场预期的重大改革创新，此

前宣布的工作时间表也多有延后，不免让各界颇为失望。

接近网商银行的人士告诉本刊，原本计划推出的个人贷款产品，因为业务进展的原因，出现了变化，该人士并未透露变化的原因，但否认是与传统银行的合作有关。

微众的“内忧外患”

5月首款产品微粒贷在手机QQ上线，8月APP上线，9月微粒贷在微信上线。然而，一系列的好消息都不如坏消息传的快：9



月初，招商银行突然关闭微众银行通过深圳人民银行金融结算中心的核身接口。

核身接口即验证身份系统的接口。此前，众多机构一直力主推进，也被视为纯网络银行政策阻碍的远程开户问题，终于显现。

对于未在银行柜台与个人见面认证开立的电子账户，央行界定为弱实名电子账户，功能仅购买本行理财产品。账户中的留存资金，按活期存款计息，资金进出都只能通过绑定的银行结算账户。微众银行开户就属

此类。

按照央行现行的政策，银行为个人开立电子账户必须绑定同名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该账户必须为该人通过银行柜面开立的银行结算账户，不得为第三方支付机构开立的支付账户，也不得为其他银行开立的电子账户。同时，姓名实行实名制，必须与身份证的姓名和绑定银行账户的姓名完全一致。

据此分析，招行此举意味着持有招行借记卡的用户无法在微众银行上开立账户。

公开消息称，双方正在就此事进行商谈，但截至记者发稿并未有最新进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乎是在同时，曹彤辞职的消息又把微众推到舆论风口。微众银行至今并未公布曹彤离职的确切时间，对其离职原因也不愿多谈。这引发了外界对于曹彤离职原因的猜测，大多为内部不和、民营银行难有大作为种种。

不久后，曹彤去向尘埃落定，出任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投身资产证券化。不知是否有意辟谣，9月21日，在曹彤新任公司开业仪式上，微众银行董事长顾敏到场演讲，“两个星期之前曹彤是微众的合作伙伴，现在仍然是，我们之间会有各种各样的合作。”

在近期一次小型的媒体见面会上，顾敏对媒体称，在创业阶段，团队互补很重要，团队里面过于偏同样的能力，或者同样的风格，反而会比较容易让整个团队走偏。但他强调，“这个不是曹彤要走的原因”。而新行长人选李南青，则被顾敏认

为是能力，或者性格方面更加互补的人。

微众银行内部人士向《凤凰周刊》表示，目前微众高层并没有被这一系列的障碍打乱节奏，一切还在按部就班的进行。

来自传统银行的阻力

不愿具名的民营银行管理人士称，微众银行之所以会相继面临问题，与自身的模式有关。此次遭遇招行的问题，可能仅仅是开始。

微众银行董事长顾敏曾在接受本刊采访时称，微众银行的模式是与传统银行合作，通过他们的资金向目标客户群，主要是大众的消费者和微型或者是小型的企业放款。

虽然短期内，一些中小银行会看重合作带来的红利，不错的收益和较低的成本，但客户流失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此次招行关闭核身接口，深圳某银行相关人士对媒体推测，“应该是微众银行导致招行客户流失。”

即便是此次微众和招行能够顺利和解，更理想的是远程开户问题解决，传统银行是不是会一直与低姿态的互联网背景民营银行走下去，很难保证。虽然现在看似资本少、规模小，但是如果把视线放的足够远，传统银行中绝对不乏养虎为患的担忧。

所以问题不出现在开户，也会出现在其他地方。不在此时，也在不远处。

与传统银行合作的当然不只是微众银行。网商银行成立之初称，没有柜台，完全依托互联网，将技术、系统、风险控制

等多方面能力进行输出，在业务比较成熟的情况下，再开放给金融机构。这种“自营+平台模式”，也需要跟传统银行合作。

“他们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某民营互联网银行人士坦言。

这样的推测并非毫无依据。今年6月网商银行开业时，行长俞胜法曾透露，网商银行的第一款产品为个人贷款产品，将在7月面世，并称利率将低于微众银行首款产品“微粒贷”利率。但截至目前，这款产品并未出现。先于个人贷款产品出现的是一款面向中小规模的创业型网站推出的流量贷。

8月25日，网商银行宣布与中文网站流量统计机构CNZZ合作，根据CNZZ平台上网站的流量统计数据，综合考量网站的经营状况、网站经营者的个人信用等因素，向网站提供单笔最高100万元的贷款，首批授信总体额度为100亿元。

从本质上来看，这更多是此前被整合入网商银行的蚂蚁小贷的业务内容。

接近网商银行的人士对《凤凰周刊》称，此前的率先推出个人贷款产品的计划，由于业务进展的变化，未能实现。在被问及是否是源于传统银行的压力时，该人士否认了这一说法。

互联网银行即便平台的性质再浓烈，也无法回避本质是银行的事实，在这个前提下，选择与传统银行合作的障碍要克服并不容易。支付宝就是摆在眼前的例子。

2004年成立后的很长一段

时间,支付宝并未引起传统银行的过分关注。理由或许与现在的民营银行相似,“不足以构成威胁”。直到支付宝的成长速度在余额宝中的体现,传统银行才开始回神。2014工农中建四大行相继单方面下调了网上快捷支付的额度,随后引发了双方的口水战,最后事情以一番博弈后双方各自抛出橄榄枝结尾。

不适不仅仅来源于竞争者。几乎在当年的同一时期,央行接连下发文件暂停支付宝、腾讯虚拟信用卡产品、暂停条码(二维码)支付服务、对第三方支付转账和消费金额进行限制。在今年7月,又推出被称为史上最严厉的第三方支付新规,一旦通过,目前免费且便利的银行与支付宝账户间转账,将仅限于本人同名银行借记卡。


按照监管层的说法,对第三方支付的规范和监管,是出于对防范风险的考量。然而对于支付宝这个被规范的对象来讲,在政策红线内才能更好发展固然不错,但这就意味着必须经历砍掉游离在灰色地带“枝杈”的剧痛。

这些,也许都是互联网背景的民营银行未来可能面对的。

对民营银行应降低期望

对于民营银行,最普遍的负面评价是,“没有起色”、“进度太慢”、“未达预期”。

事实似乎也的确如此。微众银行原本计划不会晚于8月份在微信上线的微粒贷推迟了一个月,网商银行计划7月面世的第一款个人贷款产品至今尚未推出。




网商银行
MYbank

浙江网商银行

主要发起人:
◆ 阿里系蚂蚁金服 ◆ 复星集团 ◆ 万向三农

主要业务模式: 小存小贷。将以纯互联网+方式运营,不设物理网点,不做现金业务,也不会涉足传统银行的线下业务,如支票、汇票等。客户群为小微网商、个人创业者和普通消费者,特别是其中的农村消费群体。不会做500万元以上的贷款业务。

一周年主要业务: 累计服务160万小微企业和网络创业者,累计放贷超4000亿元。




WeBank

深圳前海微众银行

主要发起人:
◆ 腾讯 ◆ 深圳百业源 ◆ 立业集团

主要业务模式: 个存小贷。向合作的银行提供客户、渠道、科技和数据分析、产品设计和推广,而合作银行为双方的产品提供资金。

一周年主要业务: 推出首款贷款产品“微粒贷”,定位于互联网小额信贷产品,可通过QQ钱包实现7×24小时服务,且从审批到放款仅需几分钟,支持客户在最高审批额度内随借随还、按日计息。




温州民商银行
WUZHOU BANK OF WENZHOU

温州民商银行

主要发起人:
◆ 正泰集团 ◆ 浙江华峰氨纶

主要业务模式: 特定区域贷款模式,即限于做温州当地业务。目前只有一家营业网点,实行存款利率上浮30%的政策以吸引存款。

一周年主要业务: 推出“旺商贷”和“商人贷”产品,主要服务股东企业所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以及温州小微企业园等,贷款主要针对小微企业,目前贷款规模约1.6亿元,单笔最小15万元,最高200万元,年利率7%至8%。




上海华瑞银行
SHRB

上海华瑞银行

主要发起人:
◆ 均瑶集团 ◆ 美特斯邦威

主要业务模式: 服务自贸区,立足自贸区,提出服务小微大众、科技创新、自贸创新。

一周年主要业务: 为自贸区内企业办理了首笔保函项下的“内保外贷”业务,并启动了“FT自贸区分账核算系统”的研发工作。截至5月末总资产达到55亿元,总负债25亿元,其中对公存款余额1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8.7亿元。



KCB

天津金城银行

主要发起人:
◆ 天津华北集团 ◆ 麦购(天津)集团

主要业务模式: “公存公贷”为主营业务,也就是对公业务为主,占比在七成左右,零售业务占比在三成。

一周年主要业务: 财政金融、汽车金融、医疗卫生、旅游养老、节能环保、航空航天六大细分市场是其重点的业务领域。在区域定位上,先立足北方门户天津直辖市,辐射京津冀、环渤海。

来源: 据公开资料整理

在远程开户未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双方上线的APP仅仅只有简单的存款、理财和同名账户的转账等基础功能。当然,这也是其他三家银行(聚焦自贸区的华瑞银行、主打对公业务的天津金城银行、定位温州区域小微企业的温州民商银行)都已经正常开展业务,而只有微众和网商两家银行显得踟躇不前的原因,远程开户没有解决是最大的政策制约。

不仅如此,顾敏对媒体坦言,市场的预期需要调整,“我们的困难和障碍有很多方面。”

回顾整个民营银行从酝酿到诞生,再到一周年的过程,似乎全部是一边倒的情绪,市场

的热情和这五家参与者的低调始终是强烈的对比。天津金城银行行长吴小平在接受媒体专访时称,“获批以来,我深感其中的不容易。一是恢复(金城银行的)老字号不容易。二是定位不容易。三是做出自己的特色不容易。”

类似的感触,其他几家银行想必不会相差太远。

另一家民营银行的相关负责人在谈到“低调”这一态度时反问,“还没做好,怎么高调?”

也正是外界的高度关注,让民营银行更加谨慎和低调。事实上,各自的计划正在一步步进行。9月23日,微众银行在深圳与优信二手车举行发布会,内容是

“互联网+”的汽车金融服务。

这被微众银行定义为平台金融,特点是嵌入在腾讯以外的场景。与针对个人的微粒贷平行,平台金融主要针对小微企业,这意味着此前还没准备好的对小微企业业务也已经出发。据悉,除车贷外,微粒贷接下来将拓展至衣食住行等领域。

网商银行也在继续铺向阿里系的各个分支,除了流量贷以外,该行近期相继推出60亿资金支持备战“双十一”的小微商家,并面向阿里系外卖平台“口碑”的商户提供“口碑贷”。

链接

1-9月中国制造业官方和财新(汇丰)PMI指数



50%

PMI通常以50%作为经济强弱的分界点,PMI高于50%时,反映制造业经济扩张;低于50%,则反映制造业经济收缩。财新制造业PMI(即原汇丰PMI指数)由财新赞助,调查样本相对小得多,调查对象为民营中小企业,数字往往比官方PMI读数的波动性更大。中国官方的PMI调查,聚焦于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财新、汇丰

解读

西方谨慎看待中国经济数据

【本刊综合】有外媒评论称,在美欧各国,拒绝信任中国的数据,宁愿自己估计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得出的中国增长率估值往往更低。中国的经济正在放缓,其数据收集需要改善。中国此前显然过于依赖于工业,中国的数据分析也依然停留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尤其是,比起工业产出和发电量这样更简单的衡量指标,其消费者数据质量不佳。然而,在某些与消费者相关的数据方面,中国的情况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糟糕。8月份,零售销售额同比上涨11%,航空公司客运量增长10%,电影票房收入上升45%。同时,房价上升的大城市数量触及12个月高点。中国的4G手机合约销售增长了100%,曾经超越过这个数字的只有移动互联网普及率居世界之首的韩国。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增长并非远低于官方公布(但是受到质疑)的7%。想要看懂中国的投资者们或许最好更近距离地观察它,并记住并非每一组数据都指向下行的方向。

7%经济增速是可信的

【本刊综合】国家发改委官网近期发布题为《我国7%的经济增速是可信的》的文章。文章称,上半年7%经济增速数据发布后,由于超出了部分国际机构和一些专家的预测,由此引发了对中国统计数据真实性的习惯性怀疑。这些怀疑大多没有基于严谨、扎实的研究,更多是基于片面的论据来质疑全局:第一类质疑是认为中国GDP平减指数没有扣除进口价格下降的影响,从而导致实际经济增速被高估1-2个百分点。但现价GDP和不变价GDP的核算数据决定了GDP平减指数,而不变价GDP核算与GDP平减指数无关。第二类是从用电量、运输量等实物指数的增长速度推断得出中国经济增速应远低于7%。但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实物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随之改变。第三类是通过调查问卷得到所谓真实的增长数据,未免太过武断。经过深入分析可知,中国的经济增速既符合普遍预期,也具有基本面支撑。

焦点

中国制造业复苏仍然遥远

【本刊综合】中国制造业复苏前景仍然遥远。中国9月财新制造业PMI终值47.2,创2009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不及预期的47.5,也不及47.3的前值。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何帆博士解释称:“数据表明,制造业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基本面总体良好,前期的外需冲击和价格因素是制造业下滑主要原因。”

数据公布后,民生宏观点评称,整体而言,经济仍不见底:从微观层面来看,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继续下行,基建投资小幅回升,但仍独木难支;工业耗煤量、利润等数据来看依旧泥潭挣扎;经济托底压力大。长期来看,以房地产与制造业为核心的信用创造与产能扩张的黄金时代已经落幕;短期来看,上半年所依靠的金融业贡献也是难以为继。一句话,下半年经济破7几成定局。德国商业银行也表示,中国9月制造业PMI初值显示,经济增长势头可能已经恶化,加大了全年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7%的风险。

要想完成年初目标,稳增长将继续加码,下阶段货币政策将继续宽松,汇率政策继续求稳,财政政策继续加码。

针对制造业分项数据,民生宏观分析称:内外需双萎缩:新订单与新出口订单加剧萎缩,表明内外需求端疲弱。内需来看,长期增长动力青黄不接的趋势不变,短期来看,阅兵过后工业会加速补产,但是考虑财新PMI样本集中为中小企业,未有反弹效果;外需来看,贸易总量裹足不前与发达国家贸易再平衡的长期压力仍未变,虽人民币自“8·11”汇改调整已贬值2.7%,但受欧美近期复苏放缓所影响,短期内外需依然靠不住。鉴于稳增长的压力增大,预计四季度会有更多的改革具体措施出台,财政政策会有力度,货币政策在10月下旬以后会有继续宽松的可能。多项政策目标叠加来看,年底前仍有降准降息的机会。

7%

□ 编辑 王毕强 □ 制图 美编 虎妹



孔子文化公园 摄影：戴建星

衢州：让南孔文化重重落地

以文化产业试验区激活儒学经脉

文 / 章乐一 通讯员 / 章卫平 蓝晨

“匹夫不可夺志”、“富而不骄”……这些刻印着论语佳句的20多万支铅笔，即将分送给浙江省衢州市所有刚入学的小学新生。这是衢州孔氏南宗家庙管委会持续了5年的“送儒”活动。守护衢州孔庙的孔子第75代嫡长孙孔祥楷先生说：“在人生的第一课上，我们要告诉少年，什么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儒学文化，“沁”城而来。在南孔圣地，有形与无形中，处处能感受到衢州儒学文化已深入民间，浸润城市的角落。

衢州市为浙江省地级市，是一座具有1800多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一直是闽浙赣皖四省边际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自古素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东南阙里、南孔圣地”的美誉，是孔氏南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在浙江的历史文脉中具有独特优势。

近年来，衢州市非常注重文化空间和文化内涵的拓展，在建设“现代田园城市”和“全国首个休闲区”过程中，全面启动建设浙江省首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儒学文化区。

护旧建新 古城焕新颜

散步衢州儒学文化区，夜色中的阁式天王塔，古朴秀丽，玲珑剔透。天王塔是古城衢州的地标性建筑，1952年被拆，2014年复建完工。塔底之下，是水亭门历史文化街区，也是衢州儒学文化园区的核心区域。建筑是城市文化的符号，以前说南孔文化，可去之处只有孔庙。但从2014年9月开始，占地40万平方米的儒学文化区出现在人们眼前。

衢州市委书记陈新表示：“衢州之所以建设儒学文化区，就是要创设有效载体，复

兴历史文脉，把儒学真谛在现实转化，将南孔文化创新发展。”

“看得见摸得着”的“南孔”越来越多，文化区内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中国儒学馆就是一大亮点。儒学馆着墨儒学研究，馆内收集了国内最丰富的儒学典籍与文献资料，将定期邀请儒学专家学者相聚交流。

作为衢州城池的起源地，府山从唐至清便是衢州的府治所在。现在，府山公园被注入新内涵，孔子雕像巍峨耸立在公园内，论语碑林点缀公园之中，碑上的《论语》名句均出自著名书法家之笔。在水亭门历史街区，沿街马头墙角，50多幅形态各异的孔子圣迹图，让人轻松地读懂了一个有泪有笑、有血有肉的孔子。整体修缮后的门楼、砖雕、古道、老房等，无处不透着儒学气息，勾勒出衢州的历史脉络。

脚踏铺装规整的方弹石,眼观气派精致的门楼,手触古朴厚重的铜雕,在中国儒学馆里学习儒家道义,在改造一新的孔庙里虔诚祭拜一回孔圣人,如今在衢州,儒家文化可看、可听、可触摸,化无形为有形了。

见贤思齐 儒学沁人心

这几年,衢州大地涌现许多至善大爱:公交司机毛志浩行车途中被倒下的路灯杆击伤,忍住剧痛安全停车,保证了26位乘客的安全;农妇徐萌仙忍受着失去17岁爱女的悲痛,无偿捐献女儿所有有用器官;龙游农民傅志霄用尽最后力气把落水少年推出漩涡,自己却沉入了江底……

无数人探寻衢州“最美”现象,最终都落点儒家思想。衢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诸葛慧艳认为:“儒学是衢州文化核心竞争力,我们不仅要文化人,更要物载文,在‘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中永续儒学经典。”以文化人,传承精神血脉。早在1992年,衢州就颁布制定了《市民守则》,倡导市民爱国爱乡,诚实守信……在浙江省第一个设立了“见义勇为专项基金”。

2003年春,衢州恢复了业已中断半个多世纪的祭孔大典,并将衢州祭孔大典定位为“以当代人的方式纪念孔夫子”,连续举办“国际孔子文化节”和“国际儒学论坛”,整理编纂了一批史料、专著。

从2009年起,每年举办全民读书周,以“人文大讲堂”“百姓讲坛”等方式,提升城市品位和市民文明素质。南孔恢复祭奠,每次都让新的青年教师、新入学的孩子成为学祭主体。富有时代现实意义的祭奠新模式,受到社会一片好评。

近年来衢州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公民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大力弘扬儒学文化精华,将儒学文化列入部分中小学生必修课。连续十年开展建设学习型城市活动,以“读书周”、“全面学习日”活动、人文大讲堂、百姓讲坛等活动为载体,力促全民学习,形成“人人爱读书、满城飘书香”的氛围。

伴随着《大同颂》祭孔乐章悠远飘扬,衢州的儒学走出庙堂、走向大众。衢州市委、市政府坚持不懈地抓道德建设,将“仁爱、民本、诚信、正义、和合、大同”儒家学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相通,教化

于民,“最美”逐渐成为衢州人共同的价值选择。

在这里,“最美”故事登在报纸最显眼的版面上、播在电视最好的时段里,还登上了街头灯箱广告、乡村年画挂历。在火车站、汽车站、公交站以及各大商场,通过LED广告,你可领略“最美衢州人”的风采。在手机上,市民会收到开展“最美”活动的短信邀约;在餐馆用餐,在公园休憩,在校园漫步,在街头走过……你都能感受到文明之风的熏陶,都会不由自主地成为建设“最美之城”的光荣一员。

在这里,140多个最美志愿者家园活跃着15万名志愿者,每年累计服务7万多小时。在志愿者家园内还放着一棵棵心愿树,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市民将心愿写在卡片上,挂上心愿树,志愿者们自愿认领。近四年,衢州已累计成功无偿捐献器官20例,挽救了50多位重症患者生命;还有135位爱心人士登记身后捐献器官志愿,数量在全省名列前茅。

集聚“最美”,传递“最美”。逐渐衍化,衢州最美现象从“盆景”到“风景”再到“风尚”。通过连续三届的“最美衢州人”评选,全市各行各业共评选出数百名最美人物。

2014年3月20日,在第二个“国际幸福日”,清华大学心理学系行为与大数据实验室,发布了“幸福中国大数据”。在幸福城市指数排名中,衢州成为中国最幸福的5座城市之一。

增添活力,儒学成产业

如今,通过视频、音频、立体呈现等先进技术,坐上了“春秋”的马车和孔子一道周游列国,已不是难事。走进中国儒学馆,体验穿越孔庙新建的“时空隧道”,从华丽古装贯穿至现代正装,南孔800多年弘儒史历历在目。

以中国儒学馆的体验游为依托,衢州积极策划一些特色文化项目,以更好地延伸衢州儒学文化产业:其中有对接国家汉办,力争建立世界汉学大会、孔子学院师资培训、汉学理事会大会和“汉语桥”夏令营等基地。与国际国内高校、机构合作,开展国际国内交流研究项目。

衢州当下正在谋划衢州儒商学院、衢州

儒学国际当代艺术季(儒学)、大型现代音乐话剧《孔子》、衢州国标柑橘文化节等重点项目,以重点项目为引领,带动园区实现健康快速发展。让大众触摸到生动的儒学精髓,这衍生出的文化产业正扩展到各个县(市、区),形成彼此紧密相连又各有侧重的文化产业带:以儒学文化为主题,以孔氏南宗家庙周边区域为核心区,以北门、水亭门两大历史古街区为延伸区,以开化根雕产业集群、常山奇石产业集群、龙游孝福文化博览园、开化甲壳虫动漫文化产业园为拓展区。

占地1500亩,总投资额30亿元,在龙游的紫檀孝福文化博览园,是一个融艺术观赏、文化研究、工艺制作于一体的大型文化、休闲、旅游项目,以国学文化为基础,以紫檀文化为背景,通过国学文化的实景展现和教育培训,培养游人“爱国、爱家、爱自己、爱他人”的高尚情操。在紫檀国学博览园内供奉100位中国古代圣贤,太母殿、育恩堂、志诚楼、万姓宗祠等项目的土建工程目前已完成,并正式对外开放。预计2018年,这里将实现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年培训国学爱好者5万人次,年生产各种旅游产品、家具等20亿元。

在开化的甲壳虫动漫文化产业园就能通过先进的全息3D投影技术,让游人们和圣贤孔子同台相遇,一同唱响《大同歌》。

“甲壳虫”拥有全球第二家、国内首家未来音全息科技馆。为了让现代人更直观地了解儒学文化,“甲壳虫”动漫文化产业园预备在8月份再上一个2000平方米的儒学和国学结合的多媒体互动项目,增加游客儒学文化体验。

目前,衢州正在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建设重大项目,打造文化品牌,构建了包括文化产业、文化展示、文化旅游、古民居、古玩收藏品专业市场、工艺美术、休闲娱乐等在内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文旅结合打下良好基础。

衢州市力争到2020年,将衢州儒学文化区建设成为儒学文化走向世界的展示体验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先行先试区、四省边际文化产业的核心引领区。通过护旧创新、生态立市,衢州儒学文化区将走出一条文化与城市的融合发展之路,最终打造出现代化与田园安居宜人相交融的中国最美城市。

“他们的政治，我们的岛”



国后岛海岸附近的船只残骸，露出在海面上的部分锈迹斑斑。这可能是被俄方扣留的日本渔船。曾经登岛的凤凰卫视记者卢宇光描述，坐着摆渡轮进入国后岛港区的时候，有黑压压一片的船“尸体”区域——全是被扣留的渔船，小驱动的铁壳船烂到海里，天线都被卸掉。



从中国的最东北再向东,跨越日本海大约1000公里,穿过外形似鱼的库页岛(俄语名为萨哈林岛)和日本东北边的北海道地区,继续向东一点,就到了俄罗斯所称的“南千岛群岛”,日本把这里称为“北方四岛”。日俄已经争议这里的领土主权数十年,围绕此地的风波常常加剧两国的紧张关系。

这些岛屿屡屡登上国际新闻版面——俄罗斯巡逻艇2006年在这里射杀日本渔民的事件,梅德韦杰夫先后两次以俄总统和总理身份登岛引发日方抗议,这些风波过去后,岛上外人罕至,宁静依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些岛屿一直处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争议岛屿由国后岛(俄称库纳施尔岛)、择捉岛(俄称伊土鲁朴岛)、齿舞群岛及色丹岛(俄称施科坦岛)组成。它们几乎紧挨日本领土。天气好的时候,站在争议岛屿中最靠南端的

库纳施尔岛(日方称为“国后岛”),隔海相望就能瞧见日方北海道地区。近些年来,日本一直强烈主张拥有四岛主权,并要求俄方归还。

由于涉及外交争议,属于两国敏感地区,境外媒体更是难以登上这些岛屿。2010年,凤凰卫视驻俄记者卢宇光曾历尽艰难登岛采访。据他描述,这些岛屿是俄罗斯边防特殊管区,进入需要特殊通行证。他光是整个采访申请过程就持续了一年,而且恰好赶在当时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登岛之前,俄方才批准他们进入。“这是65年以来首家媒体登上这个岛采访”,卢宇光说,采访还招来了日方的抗议。

特殊的气候地理也令登岛变得非常不便。从俄南萨哈林岛过去,登岛的最佳时间通常只有短暂的夏季,卢宇光说,岛民外出都要提前一个月订票。这里处于西北太平

洋,暖寒交汇,岛上还有很多活火山,有时早晨突然下雪,接着又是雾又是雨,时而夏天时而秋天,起伏不定。从南萨哈林过去的俄罗斯航班会因为天气不好长期停飞,乘坐海轮过去,则要整整18个小时。

四座争议岛屿之一、面积第二大的国后岛上,除了驻扎的俄罗斯部队,还生活有6000多名民众。此前,1994年一次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袭击,曾使约三分之一的岛民离开。仍然生活在这里的岛民大多以捕鱼为生,这里物产丰饶,岛上能看到棕熊走来走去,下河拿着树杈就能捕捉到数斤重的大马哈鱼。

2015年,路透社摄影记者Thomas Peter也登上了这座岛屿。他用镜头记录下了岛上的自然风景、捕鱼场面和岛上居民的生活。这是在外交、政治的喧嚣中,难得曝光的岛上日常写真。(曾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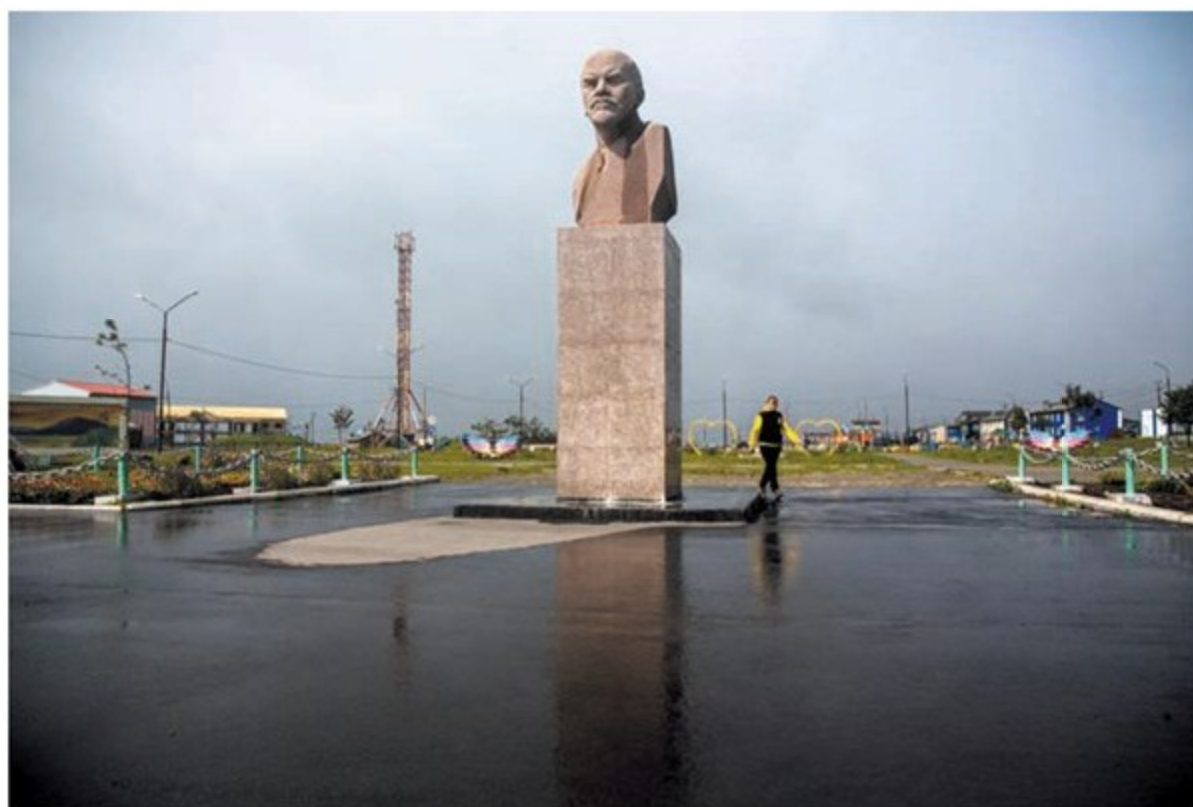
2015年9月16日,修理渔网的渔民。四岛附近是南北暖流寒流交汇之处,形成了暖寒流鱼类相聚的场所,有“鱼类宝库”之称,是世界上三大渔场之一,当地人形容这里“海胆乱滚,螃蟹重叠”。岛上俄罗斯政府对生态保护极其严格,规定有偷捕猎者,可以用机关枪直接扫射。俄方经常指控日本和韩国的渔船来此“盗猎”。



国后岛上自然保护部门 (Kurile Nature Reserve) 的主管、俄罗斯人 Alexander Kisleiko 在海边瞭望。他认为全世界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这样独特的岛屿，主张俄罗斯政府应该与日本合作，取得国际社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支持，一起来保护这里的自然生态资源。这些岛屿南北跨度很大，植物分布多样，生活着各种鸟类及野生动物。海鸥、鹈鹕、信天翁等鸟类在此栖息繁衍，还能见到憨态可掬的棕熊。



岛上居民、俄罗斯人 Grigory Andreevich 站在自家的花园里。与表态强硬的日俄政府相比，这里的居民对外界更为和缓。岛上的很多居民都希望此地能得到进一步的开放，吸引更多游客。在 Grigory Andreevich 看来：“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这些岛屿到底是日本人还是俄罗斯人的。只要拥有和平的环境，我们就能在岛上生活下去。库纳施尔岛（日方称“国后岛”）之所以令人瞩目，是因为它的美景和生活在的人们。”



2015年9月17日，四座争议岛屿之一的国后岛（俄方称“库纳施尔岛”），岛上最主要的定居点南古里斯克（Yuzhno-Kurilsk），一名妇女走过岛上的列宁头像。此岛仅有数千人口，18世纪时，国后岛是日本人与当地原住民阿伊努人的贸易地点，1855年日俄签订《日俄和亲通好条约》后划为日本所有。1945年9月1日，苏联军队占领了该岛，并驱逐了成千上万日本人，苏联解体后该岛同其他争议岛屿一样为俄罗斯所管。



2015年9月14日，夕阳在墓碑上洒下阳光，这是国后岛上的—处日本人墓地遗迹。来往俄日争议岛屿的日本人寥寥无几，每年日本的“北方四岛”协会都有一定数目的人还乡扫墓，但是人员被严格限制。自1965年以来，日本人大规模有组织的登岛只有两次，一次是南古里斯克岛大地震以后；另外一次是，日本民间还乡团。但此举后来被日本外交部起诉，日本政府认为，如果日本民众登岛，就变相承认了俄罗斯对岛的主权。





背包客在岛上火山口附近行走。岛上坐落着数十座火山，不少火山处于活跃期，还常有巨大的海啸及地震发生。一般来说地质活动多的地方也往往有资源宝藏，这些岛屿及周边地区现已探明的天然气、石油、有色金属和商业矿石的储备相当丰富。一项不完全统计数据指出，四座日俄争议岛屿及大陆架总资源价值达458亿美元。



2015年9月13日，“北极星(Polaris)”号渡船接近国后岛，人们站在甲板上随意交流，眺望远方的海域和岛屿。国后岛和其他三座日俄争议岛屿北接鄂霍次克海，东北面濒择捉海峡，西南隔根室海峡与北海道相望，虽称弹丸之地，却是名副其实的寸土寸金。国后岛上一位64岁的居民Nicolay说，俄方曾希望在此设立经济特区，邀请日本人来投资开发该岛，但遭到日方的拒绝。

□ 图片编辑 丁大伟
□ 文字编辑 路琰
□ 美编 虎妹



最美东部湾

“找一个平台，承载创新梦想”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力打造“东部人才港”

文 / 章乐一

在2014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大会上，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大学的工程硕士、MBA魏力群带来的基于云计算的移动服务平台项目，受到了与会各地区、各单位的追捧。经过多方比较，魏力群最终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了协议，决定在开发区落户。

魏力群在开发区落户的项目，将依托云计算领域世界排名第一的思杰公司的云计算结构，研发一个高实时互动的移动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无论是传统的台式电脑，还是任意的移动设备，都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实现高清实时视频、音频以及屏幕互动。

这是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的又一个高层次人才和高新技术项目，而像这样

的高层次人才和高新技术项目在开发区并不在少数。

留学美国20多年的方向明博士，两年前回到家乡杭州创业。几经选择，她最终也将公司注册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两年来，作为美中生物医学与制药专业协会理事长的她，凡碰到海外留学人员，开口必讲开发区的创业环境如何优越，动员他们来开发区创新创业。

正因为众多像魏力群、方向明这样的高层次创业者通过亲身感受给开发区做了大量的义务宣传，使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中的口碑极佳。目前，区内已集聚了国家“千人计划”、省“千人计划”等各类人才695名，高层次人才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130多家。

高层次人才为何如此青睐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她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近年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要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重要部署，围绕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实施大引擎驱动、大平台构筑、大产业培育、大环境优化“四大工程”。不断创新引才、育才、用才机制，全力打造“东部人才港”，充分发挥人才在经济发展和核心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作用，在全球性的人才竞争中占得了先机。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引才、育才、用才机制上的创新实践，为各地区，特别是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人才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以品牌建设提升 人才工作科学化水平

自2012年起,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就正式提出打造“东部人才港”工作品牌,加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大力推进转型发展。

加强顶层设计、科学布局。人才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盘布局,精心设计,科学规划。为此,开发区专门委托浙江大学人才研究院,制定了将产业升级、人才发展融为一体的人才发展规划,将人才发展规划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体系,确立了依托产业优势打造人才优势、依靠人才优势支撑产业发展的战略布局,明确了人才队伍建设重点思路、重点举措和重点工程。对引才、育才、用才等方面,开发区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聚焦智慧经济、民生科技,计划用5年时间,引进和培育领军型人才100名以上、销售收入超过1000万元的高层次人才创办企业累计达到100家以上。

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政策体系。开发区设立3亿元人才专项资金、6亿元科技创新资金,从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扶持人才创新创业、推动科技创新、鼓励做大做强等多个角度,制定出台人才创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金融扶持等政策,形成了人才与科技、引进与培育、创业成功与做强做大互相衔接、相互支撑的政策体系。

推行部门联动、“三招并举”的工作模式。为切实提高项目对接效率,加速带技术、带团队、带资金的项目落地开花,开发区推行人才、科技、招商部门联动机制,按照市场供需要求,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产业引进与科技引进相结合,引进与培养相结合,汇聚各方力量,实行招才引智、招商引资、科技招商合力推进,基本形成部门资源共享、部门联动推进的工作局面。

以渠道建设完善 引才育才工作体系

人才工作也是一项综合性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资源和力量。因此,近年来,开发区非常注重整合政府、高校、企业、社会资源,加大引才、育才力度,逐步实现由政府主导向以政府引导、企业 and 市场主导转变。

载体引才。通过与海外机构合作举办北

浙江省海外留学人员创业园



高科技企业孵化器



美创业大赛、全法创业大赛等竞赛吸引100多个优胜项目来开发区参观考察。同时,支持全球多肽协会、百华协会、亚洲生物会举办年会、论坛等活动,邀请近千名世界高端人才齐聚下沙,共议产业发展大计,有效提升了下沙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以才引才。这两年,开发区相继在海外人才集聚地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等地建立引才联络站,依靠协会组织的影响力

和号召力,推介人才回国创新创业。同时,聘请科学家、企业家、创投机构合伙人等知名人物担任开发区“引才顾问”,帮助开发区引荐、甄别人才层次和项目优劣度。

以资引才。充分发挥开发区创业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与新加坡毅鸣基金、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海邦基金、浙大创投、如山创投等资本机构合作,借助资本优势,招引一批有资本投资意向的项目。



以平台建设加大引才、育才力度

建立“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模式。“找一个平台，承载创新梦想”。开发区早已亮出了“东部人才港”的名片。从孵化加速到产业化，开发区构建起一套支持人才创业创新的产业生态系统。

“开发区将突出市场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等三大导向，聚焦智慧经济、民生科技，发挥人才创业、科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打造产业集群生态系统，加快建设成为高端人才集聚区、人才体制创新园和高新产业孵化区。”开发区人才办负责人表示，为了引进人才“能落地”，开发区力求精准建设，在构建创业创新平台上下工夫。按照“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标准和“特色鲜明、品质一流、作用突出”的要求，以“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建设模式，努力构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多元整合、互补互助”的平台体系。

依托大院名所引才聚才。开发区积极与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推进中科院理化所杭州分所、斯坦福医学研究中心、精准医药研发中心、长三角大数据研究院、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中心等一批高端平台建设。今年开发区将通过中科院理化所杭州分所引进激光显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预计10年总投资超过150亿元，引育高端人才将达到1000名以上。

发挥企业引才主体作用。围绕企业发展，发挥政策杠杆作用，开发区通过政策引导，专项扶持，积极鼓励支持企业加大引才育才力度，服务企业持续发展。比如，由国家“千人计划”人才李湘所创办的中肽生化公司，通过引进和培养高端人才，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成功与生物医药界的国际知名公司礼来公司开展合作，成为了世界各知名研究机构和药厂的多肽首选供应商。目前，公司已拥有国家“千人计划”人才1名、省“千人计划”人才5名，2013年销售产值已突破亿元，打响了“中肽”品牌。再如三花控股集团，一直坚持“管理之花、科技之

花、人才之花”的经营理念，成立中央研究院，大力引进国际顶尖人才，积极培养国内优秀人才，共同开发国际领先技术。通过努力，已打造成为全球气候智能控制王国，成为世界行业发展潮流的引领者。

“两园”合作引才。开发区与园区内的浙江高教园区早已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这几年，开发区紧紧围绕开发区、高教园区“两园”战略合作，积极推进政产学研一体化，通过成立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海洋工程中心、浙江财经大学大数据研究院等机构，鼓励高校人才来开发区创新创业。实施一年来，已引进创新创业项目20多个，各类高层次人才50多名。

以机制建设加速人才作用发挥

推行“一站式”服务机制。毫无疑问，要使高层次人才安心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创新创业中去，必须为他们创造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生活环境，需要尽可能地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全力助推他们成功创业。为

此,开发区紧紧围绕促成人才创业成功,建立健全领导联系人才、部门服务人才、人才服务专员等制度,快速有效解决人才创业创新在工商注册、专项投保、职称评定、医疗保障和子女入学就业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搭建“活动式”服务机制。创新创业需要各种平台和载体。为此,开发区为人才搭建综合、实效、多元、个性的创业和交流平台。开发区协调区内创业创新人才、高教园区各高校科技产业处、进区配套机构(金融)、风险投资机构等,成立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层次人才创业促进会,分行业领域、分活动主题、分类分时,定期组织开展沙龙、培训、联谊等活动,加强交流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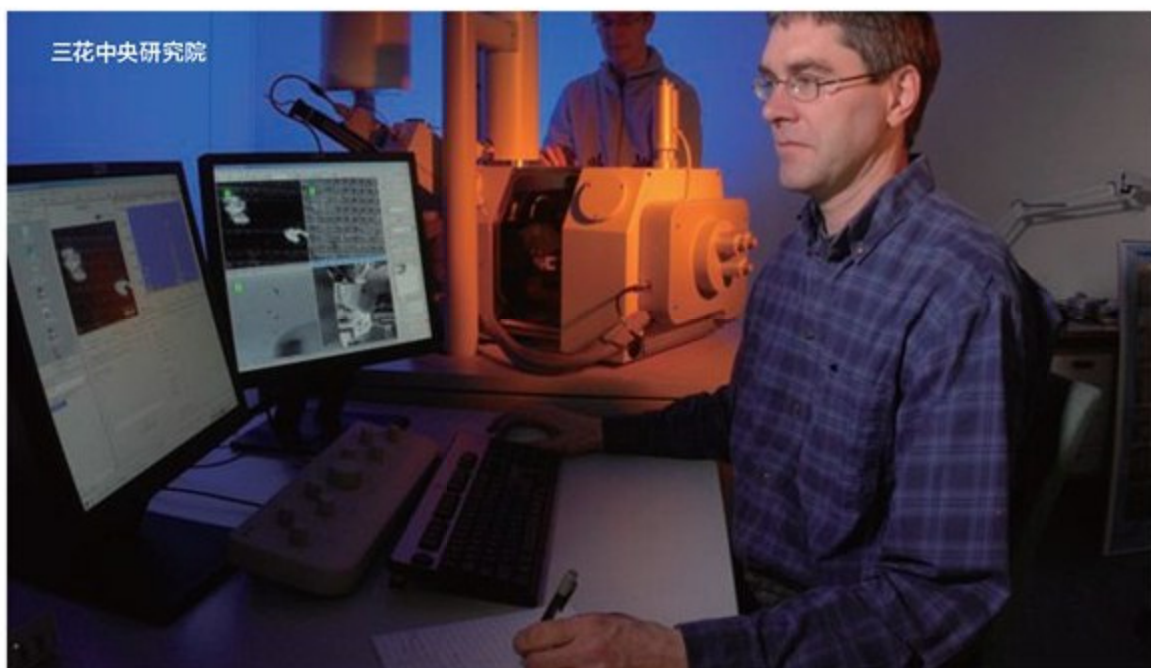
尝试“订单式”服务机制。按照服务市场化导向,开发区还根据人才项目的个性需求,借助政府行政力和市场力双重力量,给予项目在高端人才招聘、阶段性融资、行业专业培训等个性化服务。

下沙推出20个众创平台 启动“烽火计划” 集聚创客精英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拥有产业与人才优势的下沙正成为年轻创业者的热土。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烽火计划”,推出20个众创平台,发展“众创空间”,并统一启动20个平台的征名活动。

“创客”一词源于英文,指出于兴趣和爱好、努力把各种创意变成现实的人。这次开发区统一推出的20个众创平台,里面既有国家级的孵化器、科技园,也有省级、市级的孵化器。20个创业空间总面积加起来达到了130万平方米,能为6000—10000家企业提供创业平台和一流的服务环境。

如总面积超过15万平方米的杭州市高科技孵化器,为国家级孵化器,可入驻企业近800家,重点面向生物医药健康产业、服务外包产业;中国计量学院大学科技园,被新认定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以及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可入驻企业约100家,主要发展计量检测技术类产业;海外留学生创业园,面向海外人才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可入驻企业400多家;下沙电子商务园面积2.8万平方米,可入驻电子商务企业140家……在这里,已诞生了下沙的一大批优秀创业企业和创客精英。如联川生物、领业医药、



诺泰制药、乐途、培瑞、路格科技,崭露头角,正成长为能够影响未来人们生活的高科技研发企业。还有百草味、网仓、杰拉网咖、悠可、杭州网创等一个个知名的网络品牌电商,从这里孵化并迅速崛起。

开发区创新平台建设不断得到扩充。围绕建设“东部人才港”,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开发区已累计建成投用达72万平方米,扩大了“众创”平台空间。海外高层次人才创办企业数达到124家,产值上千万企业40家,产值上亿元企业7家,平台建设运营水平不断提高。

今年,开发区全力做优创新平台,招引科技项目。围绕产业发展导向,结合平台定位,大力招引技术水平高、成长性好的科技型企业入驻创新平台,积极推动研发项目在开发区实现产业化,力争全年新增科技型企业200家以上,并鼓励和引导各类平台加快完善商务、信息、创业导师以及合作交流等配套服务,切实提升平台管理水平和服务品质,真正发挥平台的集聚功能和载体作用,加快形成集孵化、加速、产业化于一体的创新产业支撑体系。

专访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杜赞奇 现代性危机的东方救赎

记者 / 刘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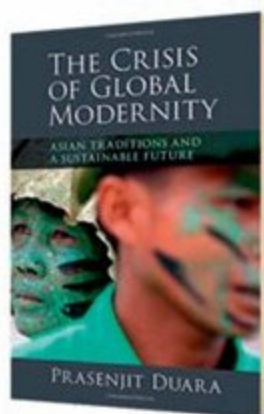
9月15-16日,当代著名印度裔汉学家杜赞奇访问中国,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就其新书《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作主题演讲,并与汪晖、杨念群、赵汀阳、吴飞等大陆学者展开对话。这部作品于今年5月在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将在2016年推出中文译本。

早在1973年,还在德里大学读书的杜赞奇,就被中国正在进行的文革所吸引和疑惑,认为“它似乎展现了一种可能改变历史的路径。”接着赴美深造,遇到恩师——温和派的汉学家孔飞力,四十余年来,杜赞奇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成就,都伴随着他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他早期密切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史,思考近代中国如何实现西方现代性的问题。

首部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运用真实史料,探讨了中国基层乡村的政权组织、文化形态和社会建构等问题,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国家政权内卷化”两个重要概念;他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突破了传统历史仅仅是政治史、经济史的局限。

人类历史的变迁,被放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视野扩大到了社会史,尤其是“民间社会史”。也正因如此,本书在上世纪80年代末刚出版不久,就获得1989年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和1990年美国汉学界最高荣誉“列文森奖”。

2002年,在第二部专著《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



《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究》中,他又提出了历史思考和历史叙事的另一种方式——“复线历史”,对近代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这种单一历史叙事方式进行了质疑,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中国民间口述历史的发展。2011年,他再次访华,参与“西天中土”计划,并带来了中文译著《历史意识与国族认同:杜赞奇读本》。

在今年的新著中,杜赞奇将个人兴趣放在了全球现代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上,他提出了“循环历史”这一核心概念,这是对“复线历史”的一次发展。杜赞奇认为,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和以叙述为中心的历史,共同构成了历史。简言之,不仅是由历史事件构成历史,对历史的记述和理解也同样构成了历史。

通过这样的历史观,可以跨越过去民族国家的限制,用“亚洲传统”来反思如何应对现代性带来的生态危机。杜赞奇探讨了“人与自然”这一亘古有之的命题,他认为,现代西方的文明国家,往往把自然视为与人类生活对立的事物,因此在全球引发了以生态危机为代表的可持续性发展危机。而亚洲传统和古老智慧中,人与自然往往被视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人类有可能从这些传统资源中获得解决问题的钥匙。

针对环境问题,在一些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基础上,有可能建立“全球性主权”。简言之,他认为,把环境问题纳入全球性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是必要的,全球性公共事务不再仅仅是指政治和经济事务。

不过,与会的中国学者并不完全认同解决环境问题与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之间

的必然关系。也不愿意彻底脱离解决本国具体问题的现实,在两次会议讨论上,赵汀阳、吴飞和汪晖等学者,对环境问题的理解,更多的是和全球资本主义、财富分配与不平等、金融垄断与技术统御等更现实紧迫的问题放在一起的。

杜赞奇强调了自己的理论并非孤立而不切实际,却并未对此给出具体的解答。不同于前几本书的写作中,他以翔实的历史史料分析了很多具体的中国问题,本书中他似乎更愿意先在理论架构上做一个探索,涉及历史理论、文明传统和宗教哲学等领域。此书为亚洲和中国理解自身古老文明传统的巨大潜力,或许能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杜赞奇在公开讲座中未能直接解答的相关猜测和疑问,书中或许能够找到答案。

可持续的未来

记者: 你的新作《全球现代性危机:亚洲传统与可持续的未来》将研究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危机上,这是否表示你认为,亚洲尤其是东亚最大的危机是可持续性发展危机?事实上,国际金融和信用危机、地区军备冲突、国际恐怖主义和非法移民等问题,也同样影响着世界的未来。

杜赞奇: 之所以重点放在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上,是基于一个客观现实——生态危机对于地球上所有物种的影响,比目前人类任何其他危机的危害都要大。你所提到的这些危机,有的是暂时性的,有的是局部性的。而生态危机和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局性危机,它会广泛影响人类社会所在的全部或大部分国家,并有可能加剧其他危机。

此外,由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备受关注,它有可能诞生出一些最基本的普适原则,调动人们解决其他相关问题的积极性,比如,在资源获取上的不平等问题。

记者: 你所说的“亚洲传统”是一种什么样的传统?是基于地缘意义上的,还是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你提出,以中国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来拯救生态危机,而

事实上,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仅是亚洲的传统,同样也是欧美和非洲等一切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

杜赞奇: 任何宗教的宇宙观和世界观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方对自然、宇宙和精神信仰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宗教和学说。我这里主要讲两种情况,激进的超越性(比如“一神论”宗教)和可以“对话”的超越性(比如中国的“天人感应说”)。

在亚伯拉罕传统中,超越性的理想是比较激进的,这种理想通常只认可唯一的“真理”或“神”,它凌驾于一切之上,人无法直接与之沟通,只能聆听“神的启示”。

而在一些拥有亚洲文化传统的国家和社会里,这种超越性的理想(比如天或涅槃)并不是完全被一个“绝对的神”控制,人和神可以平等地交流对话。所以,在东方传统中,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而且这种宝贵的传统不是孤立的。

记者: 从现代性危机和可持续性发展间的关系来看,亚洲传统中的一些思想,比如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印度的甘地思想,是否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方现代性产生的一些糟糕结果,比如生态恶化和道德堕落?赵汀阳教授表示,解决环境问题不一定能解决更重要的贫困问题。你是否认为一旦建立起环境公共主权,这些问题有可能一起解决?

杜赞奇: 没有一种思想体系可以抵制另一种思想体系本身。我认为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改善工具理性带来的生态恶化,但这不是静态哲学之间的“比赛”,而是要靠人的具体行动去实现。

生态危机和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全局性危机,它会广泛影响人类社会所在的全部或大部分国家,并有可能加剧其他危机。

首先,它必须要能够动员足够多的人;其次,这个体系必须既适应现代社会,又不丢失原来的理想 and 传统。我在书中用了一定的篇幅去谈论这个问题:为了实现自己的事业,弱势群体是如何在奋斗过程中加入他们神圣的传统观念,以及使用新的社交媒体作为催化剂。第七章和结语部分就讲述了一种思想体系是如何产生动员作用的。

此外,我们需要建立起“环境公共主权”的意识,所谓“公共主权”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主权。众所周知,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其他地区,全球性的财富和权力总有办法去获得有限的自然资源。这就意味着,必须制定相应的规则,以限制对资源的获取和使用。考虑到人类共同利益,就需要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那些使用资源的人,占有了多少资源,就必须在相应程度上进行价值补偿或交换。当然,这个模型必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实施。

复线历史与循环历史

记者: 你的“复线历史”观曾影响一时,在中国,私人叙述史的兴起,已成为一种和国家宏大叙事并存的力量。“复线历史”将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

杜赞奇: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知道口述史在中国已经发展起来,我认为,历史事件和历史叙事必须要产生某种作用于现实的合力。对于历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历史叙事本身会影响历史的发展。但是,除非这些零散的个人叙事能够汇聚在一起,产生足够的合力,导致某些实实在在的方向上的变化,才会有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复线历史”对中国的未来是很重要的,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打破历史的单一叙事,比如国家的“宏大叙事”,通常需要有两种或三种以上的历史观并存,这样才可能有不一样的未来。

记者: 你在新书中所提出的“循环历史观”认为,历史不仅仅是由事件构成的,也是由对历史的叙述构成的。从过去“复线历史”到如今“循环历史”,你个人的学术视野

和观察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杜赞奇:“复线历史”是“循环历史”的第一步,两者其实都是为了说明一个相似的问题:历史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事件或进程。人们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历史事件,也可能怀着不同目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记住它们。

“循环历史”是一个更大的概念。以马克思主义为例,马克思主义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目的是为了实现“工业无产阶级革命”,而毛泽东将它变成了一场农民革命——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中国,而毛泽东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就有可能反过来影响由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其他国家的革命,这就体现出了“循环历史”的作用。在中国以外,毛泽东主义也产生了“历史循环”般的影响,它所引导的民族革命出现在恰帕斯、尼泊尔、印度中部等地区,然后再循环回到苏维埃马克思主义革命的中心——古巴和中国。

正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从印度教和佛教的传说中借用“阿凡达”(Avatars)一词,创造了深入人心的现代性抵抗者的阿凡达形象,这一形象又反过来被柬埔寨的生态抗议者们当作符号来利用——他们将自己命名为“柬埔寨的阿凡达”。

民族主义的悖论

记者:你经常造访中国,据你的观察,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在发展现代性方面,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它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是否随之改变?

杜赞奇:自2005年以来,我频繁访问中国,确实看到了一些变化。当然,这些富于戏剧性的变化不仅来自物理结构上,还有很多来自社会心理方面。改革前二十年的中国,因为社会竞争,社会中的个体担心落于人后,(更多是为了生存)产生了很多不安全感 and 恐惧感。每个人似乎都进入了某种商业关系中,容易产生绝望和沮丧的感觉。

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财富的增加还是社会稳定性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的心理环境。所以,外界对中国的国



2014年,复旦中华文明国际暑假研修班第二期“中华文化与中国宗教研究”上,杜赞奇主讲。

际造访和国际交流也增多了。在过去十年,整个亚洲越来越依赖中国经济和市场的增长。随着对中国情况的了解和熟悉,对于它取得的成就,我是敬佩的,但是也同样担心它未来的某些不确定性。

记者:你对民族主义问题有长期研究。上世纪中叶,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民族主义曾起到重要的凝聚作用,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民族国家该如何看待与化解文化殖民与技术、资本垄断带来的挑战和威胁?

杜赞奇:一旦面临全球性的问题或者状况,民族主义总是显得非常尴尬。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相比于过去,国家与国家之间更相互趋同,且相互需要。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民族主义在民族国家内部产生的凝聚力量,是抵制英国和日本等现代帝国主义入侵的唯一方法,而英国和日本等现代帝国主义的形成本身也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原则和国家主义基础上的。所以,这看上去像是一个模仿与被模仿的行为,同时又是对这种行为的抵抗。

今天的全球化,意味着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在对资源的控制上有更多平等参与的机会,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资源配置是

不平等的,而且这种不平等还在加剧。全球化确实会产生所谓的文化殖民和经济霸权,而在民族国家内部,那些深受其害的普通民众对此的反应,主要是受到国家宣传的影响。在民众中,这种民族主义往往表现得有点精神分裂。一方面,他们做一些亡羊补牢的事情来抵制外国资本;另一方面,因为抵制全球化而失去更多的工作机会,但大规模的移民又在悄然进行。

记者:在五年前“西天中土”计划开展时,你曾经说过,在东亚地区,民族主义更多来自民间,国家主义则可视作政府民族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有执政党的参与。为何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五年后的中国,这一结论是否依然成立?

杜赞奇:是的,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东亚的强势政府在宣传民族主义上不遗余力。尽管我认为,相比于许多其他国家,中国政府更善于管理它的国民,但民族主义似乎成为化解各种内部矛盾的方式,特别是当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外国人的时候。今日的南海、钓鱼岛等问题,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继续关注这些外部矛盾,这一现象比五年前表现得更为突出。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隐秘的美国“总统俱乐部”

战后的历任美国总统们，形成了一个不为外人道的秘密“俱乐部”，即便选举战争非常激烈，总统们往往也能相逢一笑泯恩仇。

文 / 孙兴杰

毫无疑问，美国总统是当今世界上最受关注的政治人物，而那些已经卸任的前总统们在离开白宫之后，也就离开了公众的视野，人们所能期待的基本就是他们的回忆录了。通过总统回忆录，能够窥见白宫内外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然而，卸任总统们是不是因为离开白宫就远离了权力场呢？事实并非如此。

由美国《时代》杂志的南希·吉布斯和迈克尔·达菲合著的《总统俱乐部》，正是揭示了卸任总统们与白宫主人之间隐秘的权力关系。进而言之，战后的历任总统们形成了一个不为外人道的秘密“俱乐部”，即便选举战争非常激烈，这些总统们往往也能相逢一笑泯恩仇。白宫的新主人需要前任们的智慧和经验，但是权力却未必能够分享，卸任总统们也只有在跟白宫搞好关系，才可以介入决策过程，扮演幕后智囊的角色。

隐秘的权力关系意味着它无法形成一种制度，因为它不能在阳光之下，就难免波动无常，“总统俱乐部”并非一个实体机构，而是美国总统制度一种非常态的组成部分。

孤独总统需要有个伴

二战之后，美国总统成为世界权力的中心，权力与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权力越大，就要承担越多的责任。对于这一点，杜鲁门总统最有体会，他以副总统之位直接“升迁”为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病逝让杜鲁门不得不成为白宫的主人，但他完全没有为当总统做好准备。

在接任总统之后的第一时间，杜鲁门开始求助前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在过去的



《总统俱乐部》

南希·吉布斯、迈克尔·达菲（美）著
吴颖、贾大海译
重庆出版社



十几年中，胡佛一直承受着大危机的重责，因为他的对手罗斯福一口气当了四届总统，胡佛就变成了罗斯福的对立面。这位优秀的公关管理专家，一直没有从罗斯福的阴影中走出来，直到杜鲁门上任之后，胡佛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杜鲁门的政治经验尚浅，而美国总统这个位子却是那么重要，面临的每个问题几乎都是棘手的，总统每天都需要做决断，而每次决定都会影响成千上万人的生活与生死。

美国领导的反法西斯同盟取得了胜利，但是欧洲却成了一片废墟，数百万人濒临饥荒，如何拯救欧洲就变成了杜鲁门必须面对的任务。而美国国民在战争之后也需要提高生活水平，毕竟在战争期间节衣缩食，现在需要过好日子了。

在战争期间，依靠爱国主义可以将国民团结起来，但是在和平年代，孤立主义又让美国远离旧大陆。杜鲁门所面临的压力可想

而知，他内心深处是孤独的，独自一人步行到教堂并坐在了最后一排，周围没有人认出这就是美国总统，当看着人们离开教堂的身影时，杜鲁门感到了莫名的孤独。

他在日记中写道：“当家人离开时，我总是感到很孤独，没有人再关心我戴什么领带，理什么发型，穿什么鞋和衣服。”胡佛在一战之后曾经在欧洲组织了大规模的赈灾，这一次，胡佛成为杜鲁门的代理人，冲在了拯救欧洲的第一线，胡佛访问了欧洲和拉美，成为杜鲁门在海外的情报员和国内公共关系管理人。

对于杜鲁门的“器重”，胡佛激动不已，其实他一直在等待着，但是罗斯福执政的时间太久了。而杜鲁门给了胡佛新生，赋予了他新的政治使命，在胡佛的帮助下，杜鲁门改革了战后美国的权力架构，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情局等，组建了更加适应冷战需求的政府体系。杜鲁门能够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可以说胡佛功不可没。杜鲁门与胡佛之间密切的合作，不但共同应对了美国战后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形成了一种总统与前任之间良性互动的范例，开启了战后“总统俱乐部”的大幕。

总统的孤独感不但与其性格有关，也与时势联系在一起，如果新任总统为履行职责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且国内外形势比较稳定，那他就不会急于寻求前任的支持和帮助。而战后有好几位总统是由副总统“升任”，副总统听上去很不错，但“其重要性还不如马桶”，所以，这些转正的副总统们在上任之初难免陷于焦虑。

跟杜鲁门一样,约翰逊是在现任总统死后接任的,肯尼迪遇刺之后,约翰逊当上了总统,他还没到椭圆形办公室就给卸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打电话,艾森豪威尔说:我的心和您在一起。事实证明,整个约翰逊的任期中,艾森豪威尔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

高大的约翰逊缺乏决断力,而艾森豪威尔在卸任之后却变得强硬起来,他在任期间结束了朝鲜战争,也没有深度介入越南问题,反倒是提醒国民要对军工复合体保持戒备。但在艾森豪威尔的支持和鼓励下,约翰逊带着美国一步步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为了避人耳目,艾森豪威尔作客白宫的事情也在公众视野之外。

身在高位的孤独感,只有当事者才能体会,尤其是在面对必须做出的重大决策时,总统的压力可想而知。比如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约翰逊扩大越南战争,这个时候,总统掌握了国家的命运,他们需要为国家、也要为历史负责任,这个时候,前任们,包括昔日选举战场上的对手就变成了知心人。

总统之间的恩怨与底线

虽然总统们形成了一个隐形的“俱乐部”,他们也有共同的体验和经历,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关系就非常和谐,在很多时候,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在掐架。

虽然这些大佬们的关系反复无常,但是这个俱乐部能够维持下去的底线就是爱国主义、捍卫美国总统制度。他们彼此可以互相攻讦,甚至谩骂,但是共同维护着总统的权威。

1972年尼克松赢得第二个任期的胜利之后,他身后已经没有前任总统了,因为他们都去世了。“总统俱乐部”也就名存实亡,而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总统俱乐部则成员众多。能够成为白宫主人的那些人都不是一般人,都具有非常强烈的权力欲望,虽然总统是个非

常累的职业,但是谁都不愿意离开白宫。两个强势的人物在一起,就像刺猬一样会彼此刺痛对方,因此,总统俱乐部所发挥的作用依赖于总统们之间的关系。

杜鲁门和胡佛的关系好,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就非常波折。在杜鲁门当总统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是一位出色的将军。杜鲁门希望艾森豪威尔能够参与政治,竞选总统,当然,杜鲁门希望他当民主党的总统。后来,艾森豪威尔的确参加了竞选,不过他却是共和党的候选人。出于选举政治的需要,艾森豪威尔不断攻击民主党及其杜鲁门,但杜鲁门并不以为意,他了解选举的游戏。

真正让杜鲁门恼火的是,艾森豪威尔屈从于国内极右的麦卡锡主义,没有为乔治·马歇尔辩护,最终导致两个人分道扬镳。直到1960年大选之后,两个人还没有完全和解,在肯尼迪这位民主党总统赢得大选之后,杜鲁门鼓动胡佛成立总统俱乐部,他还对外宣称,艾森豪威尔不是俱乐部成员。

两任总统之间很难相处好,因为选举政治就必须制造出一个对立面、一个攻击对象,尤其是面对重大决策失误的时候,就需要将责任推给前任。越南战争不仅撕裂了美国社会,还有总统俱乐部,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尼克松总统身上。

1968年的大选,约翰逊已经宣布不再参选,但是他并没有帮助本党候选人汉弗莱,而

香梅转告南越的阮文绍拒绝参加和谈,结果这个协议就泡汤了。

尼克松如愿当选,而他的行为却被约翰逊知悉,但为了避免国内政局震荡,约翰逊选择了沉默,但这也成为尼克松留在约翰逊手中的小辫子。后来,五角大楼文件泄露,越南战争的真相被暴露出来,尼克松及其政府就将责任推到约翰逊头上,越南战争变成了“肯尼迪-约翰逊战争”,尼克松希望约翰逊出面来承担,但是约翰逊选择了沉默,尼克松也没有办法,因为自己还有把柄在约翰逊手中。两个人从跨党的隐秘盟友,变成了对手,而且两人之间的关系简直堪比“纸牌屋”。

尼克松虽然因“水门事件”被迫下台,但他并不甘于沉寂,里根上台之后,他又扮演了艾森豪威尔在约翰逊政府时期的角色,不断向里根“递折子”,直到两人在对苏联政策上难以合作,尼克松拒绝支持里根的对苏缓和政策。而里根与福特之间的关系更是值得玩味,1980年大选,里根成为共和党候选人,但福特不甘于失败,福特的幕僚们更是异想天开,要搞出一个“双总统制”,福特不但是副总统,还要管理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核心权力部门。最终,里根提名老布什当副总统。

虽然这些大佬们的关系反复无常,但是这个俱乐部能够维持下去的底线就是爱国主义、捍卫美国总统制度。他们彼此可以互相攻讦,甚至谩骂,但是共同维护着总统的权威。布什父子同是俱乐部成员,虽然老布什未必能够同意儿子的决断,但是在公共场合也不会以“老子”的身份发表意见。每当美国遇到重大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前任总统们几乎无条件地支持现任总统,这种支持已经超越了个人恩怨。

除此之外,美国的公共舆论也是总统们“团结”的无形压力,能在白宫做主人的这些人,都希望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因此,即便彼此有很多怨恨,也会在公共场合表现得大度,时间久了,这种意识就变成了仪式,维护了其他总统,也就维护了自己。